

中國的眼子

胡平 著



钟海源



李九莲

目 次

序

楔 子： 作者自白

第一章： 漂泊之途

第二章： 风雨赣南

第三章： 铁窗铮骨

第四章： 松林喋血

第五章： 忠贞谁羁

尾 声： 她们注视

后 记

楔子 作者自白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若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鲁迅：《论睁了眼看》

从在洁白的稿纸上落下第一个字起，我的笔就沉重而又迟疑。

这是一个无比悲壮又无比惨烈的故事：两位身处最基层的女性，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锒铛入狱。她们遭受的残酷折磨和恶劣境遇，却并没有随历史黑暗的那一幕落下而结束。以中国之大，容纳下了昔日如山的苦难和冤狱，也容纳下了那两年举世几乎摇动天地的欢呼与憧憬——“粉碎四人帮，人民得解放！”却容纳不下她们，甚至没能让跌扑于松林之下的她们有一具完尸……对此，在江西，除了孩子和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们，凡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大抵都有风闻。

1986年秋天，我与大学同窗张胜友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稿时，似神

呼鬼唤，又似电石火花，这风闻樵头般一下扎进稿里，来得及斟酌的只是地名与人名，地名为江南某省，人为黎莲，因为这毕竟只是风闻……

此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悉了这风闻的不确。不确之处并不在于内容，而且内容比起前者来更加细微因而要更加惊心，弄错的是主人公，犹如把一丛带血的铁荆从另一位主人公头上戴到了她的头上，可她身上披的也从来不是锦缎裘皮。因之，我有了发掘并写出这个故事的打算，一来为了摒弃不确，正本还原，二来也为着让自己每每念及此事便难以平静的心能有稍许的平静……

虎年岁末，我去北京开建国三十八年里的第三个“青创会”。那年，北京寒冷而又多雪，会议开得乱糟糟的，偌大的一座京丰宾馆，往日里与大门口日夜设岗的解放军战士一样严肃，那个星期却恍如大风雪来时炸了营的羊厩。我的心在宾馆之外，我的脚也不时在北京城里。一夜，我造访了一位我所尊重的老编辑，在她暖意融融的家里坐的，还有一家颇有影响的大型刊物的副主编。也许是眼下涉及到文学界的众多话题都是那么敏感，也令人茫然，在一阵寒暄过后，大家都陷于沉默。不知为什么，此刻我有了强烈的冲动，讲了这个故事里另一位女主人公的遭际。他们认真地听着，房间里静得几乎能听见一瓣瓣的雪花洒落在窗棂上的微音……约讲了近两个钟头吧，老编辑的眼里晶晶润润，象在压抑着什么，而副主编则直愣愣地看着我，恍如我是一部历

史，一部异常苦涩的历史。尔后，他讲了几句话，几句字字铁靴般踩在我心上的话，以至于今天它们仍在我耳边回响：

“胡平，你刚才讲的这一些，已经远非文学所能包容。应该告诉读者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这一切。可我又没有勇气将这一些推给读者……。”

暖气开得足足的，心却冷得发紧。我告辞了，北国的冬夜，苍凉、寥寂。走在雪冻得发出幽蓝光泽的路面上，犹如走在极地的冻土层。我想，也许不该再提这些了，刨开历史的冻土层，哪里没有屈死的骨架呢？

去年菊香蟹肥时节，我去苏州开一个报告文学笔会。在会上发言里，我谈到了自己在井冈山金丝面附近的山峰上寻觅红卫兵墓地的情况。1966年冬天的一场流脑，再加上为探寻红军作战遗址而迷路未归的，一场大串连下来，井冈山上大约新添了十几座红卫兵的坟墓。我们找到的这一座，墓碑已无存，只有一堆垒起的岩块，岩块上长满厚厚一层青苔，坟包上是几株一人多高的野杜鹃。年深月久，风剥水蚀，岩石有的裂了缝，有的碎成片，坟包上好几个洞眼，隐约可见那棺木已烂成了铜锈色……

我还谈起了如血残阳之下，瑟瑟秋风之中，伫立于墓前，我心里所漫起的一股痛彻全身的悲怆感……

就此，一位写了不少颇有新意文章的年轻的评论家评论道：

“刚才胡平讲了报告文学应该有的‘历史意味’，和他站在井冈山上当年死去的红卫兵墓前的那种感受。可能当时是深深地感动过他，但我认为这种判断已经过时了。今天再来谈这些感受，心态就如当年的抗日英雄作报告，在报告里对抗战岁月不自觉地留恋和怀念。我以为这种心态可以概括为‘红卫兵情结’。他始终认为红卫兵的事迹十分悲壮，还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致受的是苏联文化的影响，不管是系统还是不系统。所以在你们的思想里就有如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心态。拿责任感来说，如写小说，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小说形式的完美，这算不算责任感，是不是非要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才算责任感？另一方面，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如金观涛写过的一句话：‘我们是残留的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说你们的责任感无论如何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这一批知识分子却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并没有为中国这艘古船艰难地驶进一条新航道做些什么的我都能被划归于“理想主义者”之列，那么我打算写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更是“理想主义者”了。我与他们是同一代人，似水流年之中，不觉我们的价值判断已经蒙上了条条皱纹，并不为新的一代人所认同了。

我思忖良久。眼下中国人的心态曾被刘再复归纳为一种“世纪末心态”。应该是历史的进步，对于那些僵

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样糊住国家的教条，中国人终于不买账了，终于懂得人必须有人的生活，必须有个人利益；又象是该生的未下地，该死的却回光返照：熙熙人海，皆冲利来，芸芸众生，皆奔禄往。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不拿白不拿，不玩白不玩……

在眼下仿佛是灯红酒绿，轻歌漫舞的年代，再要讲“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故事，也许真犹如要从今天的少男少女手里夺过琼瑶、亦舒、金庸等人的作品，而代之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不是过于天真，就是显得迂腐，抑或是表现一下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责任感”？再说，“红卫兵情结”一词挺吓人的，它远没有抗战干部的“情结”那般自豪，那份光荣。沧海桑田，“红卫兵”这三个字，一度是举国仰慕欢呼的对象，是远征归来的凯撒、拿破仑；曾几何时，它又成了魔鬼、动乱、打砸抢的代名词。这些年来，当年戴过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泪糊了眼帘的人们，象躲避麻风病、艾滋病一样地躲避它；而当年梦寐以求想戴上红袖章，终究未能戴上的我，今天何必沾上它呢，何况还加上“情结”两字，这能够给人以多少复杂的联想……

于是，我又一次剿杀了发掘、写出这个故事的念头。

然而，这念头却如春日里沿一棵伟岸的大树迤邐而上的青藤，你掐一寸，它长一尺，你掐一尺，它长一米。被剿杀的不是它，相反，它似长了一排细碎、密集

的利齿，趁着外界的什么响动，或是无需外界什么干脆长驱直入，将我的心撕咬得一回回剧痛……

《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在《中国作家》1987年第一期发表后，《文汇报》驻京记者，也是复旦同窗的陈可雄告诉我，他的一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朋友，读完拙作后竟彻夜抱头痛哭！他简单地讲了个中缘由，我仍不甚清楚，直到《收获》1988年第四期上发出署名“唯明”，并写于1987年初春的一篇散文《寻觅回来的哀痛》我才知晓——

“……其中的一段文字，竟解答了一个我十余年来一直思之念之、难以解怀的悬案。曾经深深地印入心田，为之惦念，为之动情的一位女子的命运，在这里意外地得知了。这么些年，只要我想起这件悬案，想起这位女子，我的内心便难以平静。是同情，是忧郁，更多的是良好的想象，在那腥风血雨的昨天过去之后，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一悬案，不应有那公正的、已经在我们今日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结局——平反吗？这一位受冤屈的女性，不应该在明媚的春日里重开美丽的笑唇，洗却心灵沉重混浊的泪么？这么些年来，我时时刻刻这般想象着，也曾经向许多人打探着，然而，都不见回音。久而久之，我也就释然了。是啊，在恶梦已经消散的时候，为什么我还要时时怀疑它的存在呢？那一位女子的恶梦般的昔日，

早该结束了，有如浩渺大海中的一滴水，繁花茂林中的一片绿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过着今天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人们怎么还会记得呢？历史毕竟大步前进了呵……”

“可是，这篇报告文学的下面这段文字，却令我震惊了，我无意中寻觅到了她的生命的终结，我无意中寻觅回来了无边的哀痛……”

“不知何故，作者隐去了当年这位女中学生的真名实姓。然而，我却要写出她的真名实姓。为了她，为了我的深沉的哀痛，为了我这么些年的思念和想象。她叫李九莲，江西省赣州人，六六届高中生。”

“没有想到，今天从这一篇报告文学中得知她的踪迹，得知在她生命终结之前，曾经经受了这般惨烈的残忍。”

“李九莲在九泉之下永远美丽、温柔。我这样相信着。李九莲那双流露出无边忧郁的善良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我这样想象着……”

火，衬出了冰。挚情，衬出了冷漠。在坦荡的镜子前我看到了自己的琐屑。从作者写这一篇散文，到文坛泰斗巴金任主编的《收获》发这篇散文，我感觉到了在审视历史、观照现实时，“残留的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们，内心有着怎样的波谲浪跌，风撕云裂……

去年国庆节前，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读

者来信，全文如下——

胡平同志：

近日拜读大作《世界大串连》一书（作者注：此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有《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描述了那时的我们和我们国家的情形，给人以启迪。我想，这无疑符合您的“筑起一座崭新的心理框架……”之初衷。

在此向您请教一点：

书中第三章十六节“最悲哀莫过于此了”的一位红卫兵司令黎莲，因其“恶毒”，被活杀取肾一节，阅后令人毛骨悚然！其惨状令人发指！以至本人难以置信，成为一件心理负担久久不能释去。请回答：

1、此事实是否准确？

2、如是事实，那几位“活杀”的屠手们是否被追究处置？

3、如不准确，也请作个解释。因为本人近日闲逛时翻了几本类似《世界大串连》的书籍，也参与过清算“文革”账的事，使我感到：我们有些作者，为了表示自己著书的良好愿望，而在引用“文革”史实时，有渲染夸张之嫌，以至读者难以置信，也有悖于作者初

· 表。

但愿您不是对读者不太负责的作者。

敬请答复

《世界大事连》读者张增华

1988年9月24日

此信稍加琢磨，便无异于一份哀的美教书了。若不回信，我便成了“对读者不太负责的作者”，而张同志将会由此论定此文，也许还不仅仅是此文，必有“渲染夸张”之处。为了捍卫报告文学的声誉，我得回信。可若要回信，我必须告诉这位读者朋友，第三章十六节是有不确，但它决不是“渲染夸张”，此节只是悬浮于海洋之中的巨大冰山的一只角，而要简要地勾勒出这座冰山，也决非几千字所能穷尽……

发掘、写出这个故事的念头，一回回青藤般辐射、生长了。而且，不仅仅是我有这棵青藤，我听说打算采访这个故事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就有三位，而一位近年一炮走红的青年小说家，去年十月间也为此千里迢迢地来了江西……我想，与其他人写，不如我来写。这绝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才高几斗，而是因为毕竟我与故里的两位女主人公是同一代人，我与她们一起经历了江西“文革”的风风雨雨，我比较容易体察围绕这个故事的错综复杂的方方面面，以及江西这块土地的历史积淀，和它由昨天走向今天与明天的艰难步履……

何况，她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1年得

到了平反，平反的经过虽不无曲折，直到惊动了当时的党的总书记；

何况，我并不打算写一篇檄文，我并不苟同“那几位‘活杀’的屠手们”应该被“追究处置”。在一场举国疯狂的动乱里，要一概追究起个人的责任，便无异于在风暴肆虐的大海里要追究起泡沫的责任，这是一笔请上帝来也算不清楚的糊涂账。我若写出这个故事，希冀的是日后人血不再是胭脂，耳朵边不再有如是的对话——

我的外甥女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次她问老师：

“什么是‘文化革命’？”老师回答说：“‘文化革命’就是学生斗老师，坏人打好人”。一回如此简短的回答，便把一场足以让中华民族千世百代里伫立于秋野之上长又感喟的浩劫给轻轻松松打发了！

这念头春藤般不可扼杀地辐射开来，生长起来，更因为——

1988年，在中国的改革进程里是难以忘怀的一年。犹如一道汤，面上的悬浮物捞尽了，那汤也冷了，也好似两名商贾，一涉及价码，刚刚的亲热寒暄，便被一只无形的手揭了去。这一年中，在火车上、餐馆里，在街头巷尾，在茶余饭后，我感觉到一股愈来愈浓的怀旧情绪，犹如歌坛上的“西北风”一样四处蔓延，比如说怀念毛泽东同志。相当多的中国人，是在如是的思想层次上怀念他老人家的，“毛主席的平价，华国锋的议价，邓小平的高价”。“毛主席给了我们铁饭碗，邓小平钻了一只眼，赵紫阳给踩了一个扁……”

我们的民族真象是个酷爱神话的民族。当十年前，冷峻有如锋利的历史已经挑落了一幅蒙满尘灰的现代神话之后，仍有人在不断地拣起它的破片残屑，并不断地拼凑起乍看有了新色的神话。神话是什么？当古代人不能征服大自然的时候，幻想便孕育了神话；当当代人不敢正视正蜕变的现实，回避一场也许连骨头里都感到痛意的改革时，那懦怯便催生了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中国进程，就是不加伪饰的历史与不断被修复出来的现代神话斗争的进程。

然而得承认，今天的大厦高楼，并不是在一块彻底得到清理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因此，总有人伺机去那废墟上找出…、两件兵戟，或是长矛，以抵挡一阵今日的改革；也总有人神游或是梦绕那废墟上，翻点出当年贾宝玉须臾不得离身的那块玉片，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寄托某种早该凋落的精神……因此，每当我领教那股怀旧情绪犹如冷风一样嗖嗖扑面之时，我便为中国改革的吉凶未卜而感到强烈不安。也深感大抵让世人嗤之以鼻的“忆苦思甜”并没有过时，当今的中国人必须了解，或者必须重温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是在怎样的生存状态下生活……

去年十月份以后，我开始了采访。采访过程中，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赣州的江西冶金学院，有一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了改正的老教授。他对中国共产党向往久之，鉴于他的多次申请和众口称道的卓著工作，组织上酝酿吸收他入党。党委领导同志

亲自登门，一番深入地谈话后，领导同志更了解他了，感动之余，不禁问起他有没有什么个人的要求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老教授说：

“一个希望入党的人，应该向党交上一颗完整的心，而不应该有什么隐瞒。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多年来却有一个强烈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自己能看到党为李九莲平反！”

1979年，那是雪融冰消、百川奔涌的年代。可思想解放猎猎高扬的旗帜，要走到赣南，犹如当年红军的旗帜要从赣南的瑞金，走到延安的宝塔山上一样艰难。李九莲一案，依然板上钉钉，铁案难翻。为李九莲申张正义的一批群众，正在铁窗里送走了南国的第三个春天。更多的几百名群众，虽未被判刑，可开除者有之，撤职者有之，警告者有之……李九莲问题仍象一场梦魇一样在赣南大地上徘徊。对于老教授这番沥胆之言，领导同志始而惊呆，俄尔疑惑，转而恐惧了，不由得把座椅向后挪了一下，两眼瞪圆了。盯着老教授，仿佛是在琢磨满头银丝、颇有仙风道骨的这位老先生，怎么会提出现实生活里一个敏感、危险的话题？莫不是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

“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李九莲绝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一个忧国忧党、渴求真理的好青年！这样的青年被杀害真可惜，应该为她平反昭雪……”

领导同志终于认定他的脑子没出问题。他的每一根神经，都与他的每一根白发一样清晰分明。老教授入党

的美好愿望，被他自己这番话给子弹般击得粉碎……

老教授是比50年代更早的知识分子，按照那位年轻评论家的判断，他该大致没有受苏联文化的影响，他该没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心态，他也该不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可凭他的这番话，我发现了：对于我们这片国土上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如果不予以关注，民族的良心就彻夜不宁、改革的前途便蒙昧不清的事情，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非理想主义者”，都是必须关注的。如果说这便是“责任感”的话，那么这就是当今中国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责任感”。

在采访过程中，我终于获得了两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李九莲的，另一张则是这个故事里另一位女主人公的，她叫钟海源，江西省赣县人，被捕前系赣州市景凤山小学的教师。

前面提到的那篇散文作者唯明在想象中，“李九莲那双流露出无边忧郁的善良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

我无需想象，案前玻璃板下的照片，李九莲、钟海源那双流着无边忧郁的、善良的、明亮的、流露思忖之色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如此真实，如此铭心刻骨！

冥河之畔，她们能平静吗？

九泉之下，她们能安眠吗？

目光里仿佛有那么多话在涌流。即使台灯熄去，在万籁俱静的黑暗里，我也总感到她们两人在喁喁细语

……

她们要对终于决定写出这个故事的我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今天已四十岁上下，正处于人生和事业鼎盛期的同代人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今夜在“卡拉OK”酒吧里自由地挥洒歌声、也自由地挥洒青春的少男少女们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当代改革唯有前行、别无后退可能的中国说些什么呢？

第一章 飘泊之途

“曼纳庄园”里的动物们认为：人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家伙，他们产不了奶，下不了蛋，拉不动犁，却贵为庄园的主宰，使动物们受尽奴役。于是，经过一番抗争，动物们赶走了主人琼斯先生，建立了在猪带领下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但在事后不久，猪却搬进了从前主人琼斯先生住着的院里……从此演出了一部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

——乔治·奥威尔《动物
庄园》简介

1967年6月29日。

赣州发生了全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武斗。不愧是老区，以农民为主体的保守派，实行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同的是，今天有了机械化，卡车、拖拉机，由各县而来的公路、土路上，一时间马达轰隆，黄尘蔽天，成串的车灯在黄尘里迷离扑

朔，好似一对对什么巨兽昏蒙的眼珠，在那里上下、左右探索……武器也不同了，不再是梭标、大刀、土枪、土炮，农民们，还有一部分保守派的工人，手里拿的大都是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最次的也是三八大盖。一个个黑脸秋风，眼里溢满肃杀之气，只是腮帮、手臂上那一道道鼓起的棱子肉在不停地颤抖，透露出他们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兴奋……

一早，赣州市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便被炒豆般的枪声告之；到昨天为止，双方慷慨激昂，你喊“保卫”、我嚷“誓死”的那一套，业已成了隔夜黄花。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精神批判，代替不了物质的批判，此刻物质的批判已经蝗群般涌向了赣州城的四个进口！

一切都发生在猝然之中。一切都仅仅是在战斗英雄的报告里听过。疑惑，凄惶，茫然，……然而，小城很快便有了自己坚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冶金学院的一幢楼里，几个红卫兵头头作出了紧急决定。墙上身着军装、神色奕奕的红司令像微笑地看着这几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他老人家的微笑仿佛是一张全国通用粮票；保守派从这微笑里，看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造反派和红卫兵则从这微笑里，看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三中的西门附近，该兵团与冶金学院的红卫兵，负责保卫西门。她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之前还

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的职务决定了此刻必须和几个红卫兵头头一起，义不容辞地拼凑起一个小小的“作战部”来……

她不懂作战，她只会读书。在学校里，一般女同学课后爱打毛衣什么的，她却总是读书，尤其是爱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和有关志士仁人的传记。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名列前茅；

她不会残忍，她素来谦和。出身工人家庭的她，很早便对给人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不以为然。她打心眼里看不起某些处处颐指气使、却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女，相反对班上几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别人也多少被自己粽子般捆得紧紧的同学，她倒挺佩服，她佩服他们绵里藏针，知识丰富，生存能力强。她甚至这样想：当我们这些“红五类子女”掌握了国家命运之时，若他们要离心离德，我们大概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为此，她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在大小山头林立的兵团里，她也是各派都能认同、服膺的“领袖”，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她被中学红卫兵们一致推选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李九莲的麾下也没有武器。毛主席一声令下，号召各派夺了枪的交枪，红卫兵、造卫派都将枪上交了，赣州全城只剩下两挺机枪、几只手枪，那是几个单位原先就配发了的，再有就是体委的几把小口径步枪。在西门，还只有梭标。就凭这等原始的武器，和米包、盐包筑起的简易工事，还有几百名红卫兵火热的身躯，西门的被冲决，小小“作战部”及其麾下的溃散，便只能

几乎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这一天，赣州城里浓烟密布，火走龙蛇，日月无光，腥风血雨，宛如那位气魄恢宏的电影导演，正在这里拍摄一部战争巨片……

由这一天至7月4日，赣州城里丢下了一百六十八具尸体。其中大部分是保守派冲进城后给杀死的。

6月30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赣州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朱毅，领着李九莲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到街上认尸体，有名有姓才好向中央紧急电告。他们走在死尸堆里，扒开一个个倒卧的死尸面孔，那是一张张怎样的面孔呵：年轻，露珠般年轻。洁净的额头没有一丝皱折，线条生动的鼻子恍如玉石雕成，或是下巴刚刚生出几根茸茸软须，让你想起原野上轻扬的芊芊春草，或是脸上几颗深紫色的青春痘，让你觉得里面深藏了多少青春骚动期的秘密……

几乎找不到一张脸上留有恐怖走过的痕迹。也许他们刚刚还在对战友倒下的愤慨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悲壮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能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考验自己对红司令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心的豪迈之中……死神钢青色的巨大利喙，便骤然降临了，这利喙犹如万千条蜂涌而至的蚂蝗。在贪婪地吸血，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失血后的惨白，而留给生者的则是一片无论怎样联想也填补不了的广袤空白……

李九莲跌跌撞撞地走着，腿好似麦秸秆编的，愈走

愈软。额头沁出的汗珠，将一绺头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想用手抹开，可一提手，她看到了手上淋淋漓漓、欲滴未滴的血水。一股强烈的恶心，一阵恍惚。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好象是来自一个屠宰房，又走向了炼狱。她停下不走了。朱毅回过头来看她，她象是喃喃自语：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

她抬起失神的眼睛，又问朱毅：

“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

几天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朱毅头脑里来回拉锯，他想得头都痛了。他与李九莲同是1946年生，却比她早几年上学，“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江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了，可他和李九莲一样，不会打仗，只会读书，也许是文学的熏陶，他性格外露，富有激情，这激情是拥抱五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同样与残忍无缘。

若打，对面站着的是工人、农民，他们不是自己的父辈，便是自己的兄长辈。机器是他们开的，粮食是他们种的，自己在大学里享受的助学金，也是他们提供的。在金色的齿轮与稻穗组成的庄严国徽上，有他们神圣的位置。在平时，不要说将他们视为敌人，就是有半点忤逆他们汗水的行为，比如说扔掉吃剩下的半个馒头，或是袜子破了不愿再补，想买双新的，心里都常常会有一种犯罪般的感觉……

若不打，他们将会如潮般压过来，滚滚烽烟里，那一排排拨浪鼓般晃动的脸膛上所呈现的，不是昔日农

忙季节我们去农村支援时所领受的那份欢迎，不是过去我们去工厂接受阶级教育时所感到的殷殷期待，更不是童年时，光着腚从河里湿淋淋地爬上来，或是溜进果园捉知了、偷梨吃，被他们撞上时的那份对于童心的亲热和款待……此刻，那一排排被烟尘染得熏黑的脸膛上，眼珠充血，青筋暴绽。因为仇视，因为狂热，也许还因为击中目标时所窜上来的某种快意，它们的轮廓都有些变形，皮肉都遭扭曲了，恍如一截截被雷电击中，正在撕裂、燃烧的枯木……

朱毅也被扭曲了。善良愿望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良知与路线斗争觉悟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我们民族传统中所看重的人际关系、情感联系与对红司令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态度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

红卫兵运动看似愚昧，看似迷狂，仿佛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它的每一个非理性举动，几乎都经过了理论的筛选，得到了某种理论的批准。他们之所以能很快丢弃过去在校园里熟悉的学生生活，又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当起“天兵天将”的角色，其动力与源泉正在于此。因此，他们一度有过的正义感、豪迈感、悲壮感，决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的年龄，还有60年代初期要求他们象雷锋叔叔一样纯洁的水晶瓶式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是演员，而大人物们才往往是政治舞台上得心应手的演员呢！

朱毅铁青着脸，回答了李九莲：

“没有退却的余地！不打，原则丢了，赣州城里红卫兵的性命也难保……”

打到赣州城被攻克，红卫兵死的死、伤的伤、溃散的溃散，冶金学院的四个红卫兵头头，就死了二个。朱毅成了“最高司令官”，他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七十八个人。在一条小巷里，他下令把一挺机枪连子弹带丢到井里，另一挺机枪已被对方缴去了，为了夺回它，一下丢掉三条命……

巷子外的喊杀声，劝降声，犹如七月蝉雨一样鼓噪着耳膜。朱毅看了看大家，一个个蓬头墨面，衣衫槛褛，象是刚从 上甘岭 上下来。有红卫兵的眼里划过惊恐之光。在残兵前，他该是个败将，他仍拼凑起全部威严，发出了最后一道训戒：

“你们整好衣服，一起冲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爬阴沟、钻狗洞都不是耻辱。只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住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如果你的手粘上了战友的血，我朱毅死了就算了，我活了下来就决不会饶过你！”

此时，李九莲不在。上次去街上认领尸体时，她的那副梦游般的神态，与脚下成堆的尸体同样给朱毅以深深地震动。他对后者无能为力，可对李九莲，他陡然涌起一股要保护她、保护她那颗少女纯真的心的强烈冲动，他要她不再参战了，她和部分红卫兵躲了起来。当支左部队开来赣州并稳定住局势之后，李九莲才摆脱了鼯鼠似的生活，走到了阳光下……

街上，工事已经拆去，商店又已营业。夜里，又有了乘凉的小桌竹椅，和摇落一串串故事的蒲扇。百姓们犹如刚啄破蛋壳将头伸出来的雏鸡，探了探，又一下缩了回去，照旧过起千百年来有着既定心态、既定行为的传统生活。而红卫兵、造反派们，一边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在鼓乐喧天、红旗招展之中，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六条决定下达了，保守派们业已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另一边又开始安排盛大的丧事，在低回、沉缓的哀乐声中，一道道写有“为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巨幅挽幛，牵来了长街上一辆辆素裹的卡车。车上是“烈士”灵柩，“英雄”的父亲母亲，还有持枪肃立的红卫兵战士……

一边看着的李儿莲对朱毅说：

“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参加！朱毅，你呢？”

“我比你更坚决……”

二

1968年3月，江西开始了“三查”运动。

中国人普遍尝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滋味，是在“三查”。在此之前，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是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过几个月的事情。接下来，“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矛头仿佛是对

坐小车、住深院、使电话的官儿们，在以往的运动中，他们都是鉴定和打发别人政治生命的主儿。权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可使个拌子让你摔跤，张条袋儿将你收进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极热烈地动员你给提意见，而你不过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且又极委婉、谦恭地提了几点意见，他也可能给你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因此对于这类官儿们的被冲击，遭屈辱，百姓们当时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觉得有什么唐突，尽管许多人急于表白式地诉说：“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可那是在一幕六亿人皆为角色的大戏结束之后……

但“三查”运动一来，风向变了。中南海的书斋里，毛泽东主席收回了一张打了多时的“民意牌”，俯视因他的号召如今各种旗号、各种思潮洪水般泛滥的中国，在刚刚有了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感之后，他又看到了某种隐隐约约的危险……他发话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历来是两个硕大无比的魔筐，有什么不能装进去呢？一介书生，还是鲁迅的战友，胡风不是装进去成了“特务”，几十万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上高三的准知识分子，不是统统装进去成了“右派”？

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

李九莲的父亲李忠华，一个老工人、老党员，只因

为与别人同名，被当成了“特嫌”，列为三查对象而遭揪斗。

一个多少年里粗茶淡饭、但过得安宁和睦的家庭，顷刻间瓦解了。父亲的痛苦、母亲的憔悴，妹妹们的阴郁，还有远在青海一个国防工厂做科研工作的哥哥的屡屡来信、屡屡问及父亲的问题是否解决，他担心自己因此而被调离……使几间小小斗室的空气，也结实得象一块厚重的铅板，李九莲没有一刻不感觉到压抑。

她永远忘不了眼前的这一幕：“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几乎倾城出动了，观看“牛鬼蛇神”化妆大游街。铁定自己不会有什么被揪出来的问题而感到幸运的人们，掂量自己会被揪出来而急于表现自己不该揪出来的人们，象驱赶牲口一样驱赶已经揪出来的人们，她的父亲也在其列。每人脖子上扣有一块写有各自“罪名”的牌子外，剃阴阳头有之，画大花脸有之，顶个字纸篓有之，拿“青天白日”旗有之，上下浇满淋漓墨汁有之，胸前挂一串破鞋有之……仿佛在举行诗歌大赛，或是元宵灯会，每个单位都尽力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打扮得特别些，醒目些，刺激些。仿佛只有凭着这份刺激，精神生活已经瘦土般贫脊的人们，才能得到某种满足，某种渲泄，也使这被灰蒙蒙色调笼罩的城市，略略显出了几分生气……

如果说李九莲震惊，中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但表现在诸如“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上，也表现在对人格与自尊蹂躏的种种花招上，那么，她更是震惊这种

蹂躏何以如此强大，有时竟简直不象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

她父亲本是莫须有的问题，他却总是写莫须有的检查。肚里没喝过几滴墨水，别人代他写了，他嫌不深刻，要李九莲重写。平时他话并不多，象许多老工人一样，那话大抵停留于感性层次。可现在他却有了凭空给自己上纲上线、搜罗“罪名”的能力，而且，这能力每过几天都几乎提高几寸。象有了鸦片瘾的人，离开了那杆枪不行，他则每天离开了那几寸不行，仿佛这不是在给自己编织政治上的死刑，而是给自己编织一件温暖的毛衣……

于是，他一次次要女儿代写检查。李九莲怜悯父亲，鄙视父亲，他的肉体虽在，灵魂早就死了，她不肯写，他猛然跪倒在地，一个劲地向她叩头。她躲开父亲，走到窗口边，泪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厨房里的母亲被外屋捣蒜般的响动惊动了，走进屋来，怔怔地看了一会，又走到女儿身边，叹了口气。

“九莲啊，他是做爹的，你是做女儿的。他要写，你就给他写吧。你要不写，不怕他把你拜死？”

“三查”运动，随着夏季的来临，急剧升温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自称“脚板下走出了马列主义”。在全省境内，他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湖北红安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

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形势确实是大好，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四九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教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这回事件出在七中，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的……

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A，也仆仆风尘，冒酷暑去瑞金、兴国走了一遭。他回到赣州后，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的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李九莲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报告里首先讲到瑞金的情况：

“……通过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对领导上的右倾解决得比较好，一般都能积极认真地去抓阶级斗争，对三查领导决心大，抓得紧，效果明显。能亲临第一线指挥。亲自把关，很快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因此发动了群众，出现了抵自己父亲、抵自己母亲，和攻下瑞金以刘辉山为首的刘少奇‘租长黑线’叛徒集团的顽固堡垒，揭露了‘老革命’假面目，教育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

在A看来，这个昔日的“红都”现在已成为小台湾了——“目前，瑞金全县共抵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1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

不仅是瑞金，整个赣南，恍如回到三十年代红军被迫北上，国民党打回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时被称为“白色恐怖”，而现在的恐怖则是“红色”的。

李九莲几乎走到哪里，那里便见到惊恐不定的眼睛，每一天都能听到来自各地的毛骨悚然的风闻，她总

觉得空气里有一股血腥味——

在杀了三百多人的瑞金：

有一个小理发店，店里有三个师傅。两个师傅组织起“革命群众法庭”，摇起语录本向另一个宣布，根据《毛主席语录》某某页某某条，你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将他杀了后，还在理发店门口贴了布告，以示郑重与磊落。

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稀稀疏疏，以致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内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

在杀了二百七十余人的兴国：

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被打成“反共救国军司令”，家里被视为“黑窝”。经公社“三查”领导小组核准，全家满门抄斩。根据上峰“一不能开枪，二不能白天执行，三不要贴布告”的指示，行刑队夜里开到了前武装部长的家里，从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到其老婆、孩子，全被一个个绑在户外的几棵老树上。不知怎的，这时，厩里的猪，笼里的鸡，全炸了营。一个队员嚷道：“叫，叫个屁，杀了主人后就收拾你们！”不料这一嚷，引出了不同意见，一个已经有些累乏的队员，想到等会儿还

要用梭标将这家人一个个插死，便提出：“杀了人，满身血污滴嗒，哪能吃得进酒肉？不如先将畜牲们杀了，吃了，咱们杀起人来也有力气。”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拔鸡毛、剖猪膛的当口，县里来人通知，说是省革委会紧急电告各地，必须制止愈演愈炽的杀人风。行刑队头头自觉保持了与上级的一致，说停就停了。临走前，前武装部长噙着豆大的泪花，紧摇提出先吃酒肉的队员平说：“不是你，我一家都去阴曹地府了，你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在另一个公社，公社“三查”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却闹起了“自由化”。县里来人通知时，十几个“五类分子”子女，还有“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已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下面人正要松绑，此公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于是，这一行人没能赶上“落实政策”……

真乃是“红色恐怖”，“三查”运动的那段日子，李九崖做的梦也常常是红色的，冲天的火光。淌血的梭标。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的海洋。响尾蛇般嘶嘶奔窜的机枪火舌。苍蝇兴高采烈地发现了几朵艳丽的罂粟花，它们开在一个年轻人的尸体上。嶙峋的野狗懒洋洋逡巡，猛然折进一个空门，精神顿时竖起在尾巴上，它吮吸地上从未喝过的高贵液浆。语录本，森林般挥起的语录

本。幸福时挥，批判时挥，武斗时挥，宣判时挥。被别人推上首页的毛主席老人家，您不觉得累吆……

李九莲从梦里惊醒过来，连梦里都无法逃避，她觉得眼前的世界真是没有一块净土！

她不知道别人怎么能生活下去，照旧吃饭、排泄、上班、生孩子，照旧议论别人的劫难和庆幸自个的平安……眼前，她看到的不是人在生活，如同她认为她父亲的灵魂已经死了一样，她看到满街上走的只是没有思想、也无需自由呼吸的幢幢影子。一种犹如冰水侵透骨髓般的孤独感，常常驱使她在街头看那一张又一张军管小组的判刑布告。一个二十四岁、名叫熊辉的青年，公开刷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因此类原因被判酷刑的还有不少。她觉得这才是人的世界，响彻的才是人的声音！

此外，李九莲只有梦醒之后，披衣而坐，在自己的日记里汨汨地宣泄着孤独……

三

毛泽东主席犹如一位气魄宏伟的魔术师，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可终究，他又是位力不从心的魔术师，未能把放出来的“魔鬼”又收回到自己的瓶子里。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了以下内容——

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现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是期待着……

文化大革命后，对干部阶层，对知识分子阶层，对青年学生阶层，有着特别深重的影响。

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

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

又是何其多？

知识分子们呢？不干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都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灭自己。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地方？既然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逐渐陷入痛苦和贫困，难道这是所谓的“共产”吗？

我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道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新的道路罢了。

世上是浑浊的，人们是麻木愚昧的……

我厌世。

厌世者是愚蠢的无能的自私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观了吧？

国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

自“三查”运动伊始，毛泽东不打“民意牌”了。但是，千千万万青少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动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理想主义，因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

“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虽然未在理论上提出，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里触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问题。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具有的权利。“炮打司令部”后，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走了工作组，号召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1967年夏天，又是在他的批示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将那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里被关进监狱的“反革命分子”接了出来，并给他们以拿破仑凯旋法国似的欢迎……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何曾有过？

因此，从来只接过别人检查的“当权派”，今天交出了极诚恳、极深刻的检查；那些有关你却一辈子不与你见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里化为了灰烬；还有几个人也可组成一个《井冈山兵团》，乃至一个人也可拉起一个《一小撮战斗队》的自由，还有无需再顾忌谁的权势和脸色，即时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氛围……这一切，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好象灰沉沉色调的梅雨

季节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束明丽霞光，令人新鲜，令人痴醉，令人鼓舞。

毛泽东主席是精通兵家韬略的。他“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民意牌”，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慨，引导到了对他本人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上去。

他却疏忽了这一点，这个问题，一经在实践中触及，“反革命”原来有假反革命，公仆里原来混有要主人抬轿子的“公仆”，“社会主义”原来并不是一把不会生锈的金钥匙，或许正因为它金光闪闪的门面，它若闹起溃瘍，其速度和面积才不易被人察觉；而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需要自由地思索和呼吸。……于是，中国权力政治的神秘性便不复存在了。一个金字塔般庞大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权威，也开始了动摇……

1972年底，李九莲出狱后，她中学时的挚友丁成华问她：

“为什么你当时敢怀疑林彪呢？你是从哪方面想到他的头上去的？”

她说：

“还不是因为看到当时那样一系列的事情，才使我最终想到了他头上。你们下到乡下去了，不晓得当时的赣州的情况，那时候根本就不管政策。‘三查’一来，查出那么多坏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几乎没有。我就想，毛主席早就讲过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95%，这样一搞，不等于是拆自己的台？似乎干什

么事都宁左勿右，有些干部明晓得这样对国家不利，可就偏要这样做，生怕自己犯错误，我觉得这只会败掉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人，下面有，中央会不会有呢？

“我对林彪早有想法，早有警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老讲这一套呢？他讲其实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但这个话只能在国内讲，在国外不要讲。我想，按你的讲话，既然毛比他们高，为什么又不可在国外讲？想来想去，就觉得不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是吹斯大林，贬低马、恩、列、斯，大林死了，他连斯大林的坟都挖了……这些疑虑天天在脑子里转，我的担心也就越多。

“搞红海洋运动，我很反感。这哪里是尊敬毛主席？是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后来又看过《二月逆流三十大罪状》，看到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他们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不满。叶剑英用手拍桌子，那么大的怒气，我就担心林彪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宗派集团，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老前辈对林彪如此反感，说明林彪在中央不得人心啊！

“后来下放，城市居民下放，小商小贩下放……弄得我更悲观。下放时，在体育场送行，许多人落泪了。造反派不想下。老保也不想下。毛主席讲老弱病残者除外，而那时候就不管这些，要你下，你就得下。上头有斗争，有不满，下面又人心惶惶，我就担心。那时候快要开‘九大’，都公认林彪是最好的接班人，又要当党的副主席，我就担心这个国家就要收在他手里了……”

回顾历史，与李九莲一样，当年那代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很多成分上，正是从毛泽东的这一疏忽里痛苦地钻出来的。当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一疏忽时，也撤回了这张“民意牌”，依傍起政治新贵与一小撮军中的野心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打算通过“三·五”运动迅疾收拾这块国土已经出现的“异端组织”、“异端思潮”，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中去，「为时已晚。

一方面，某种事物一旦从谁的怀抱里脱颖而出，它很快便会有自己的独立走向。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代人由多少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信仰危机”，这是必然的了！

李九莲在最终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一封信里，作了充分地坦露。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

××：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

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鲁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

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另一方面，正由于新的动乱，由于支持造反到扑灭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变化，使那一代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它决不是一场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革命，而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主义，选择在地球东方的一次回光返照！真正的民主，与权力斗争无关，与暴力无关，与洪水滔天、水银泻地般的“群众运动”无涉。它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力，由人民来进行统治与治理。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它是一种人民可以通过预定程序修正错误机制的政治。

在1969年时，李九莲自然还不会有如许的认识。但是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那座辉煌的大厦业已倒塌，她将要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尔后，她将在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也许简陋如茅蓬却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大地上暗暗涌动、汇聚的星星野火吗？

中国啊，在那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发现了那正走去高加索山上、将任凭鹰隼啄去自己血肉与眼珠的志士吗？

四

曾××，此人是驻山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85分队的战士。他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年4月，主动要求分配去赣南某偏远县份一个“共大”当教师的朱毅，为处理妹妹的婚事，回到赣州家里。一天，他突然在街上碰见穿便装的曾××。他奇怪了：

“××，你怎么回来了？当兵一年就有探亲假？”

“不，我得了一场肝炎，身体不好，从部队上退伍下来。我正想去找你哩，你在赣州市朋友多，影响大，看在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你得帮忙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

朱毅仍有点奇怪，这小子参军前是市革委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怎么今天看矮了自己，还要我这个过路客给他找个工作？想归想，一向待人热诚的朱毅还是去跑腿了，很快，曾××被安排进了抽水机厂工作。

那段日子，曾××几乎天天来朱毅家，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眉眼转悠的样子，朱毅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要对自己说。他却天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直到4月27日这一夜，他住在了朱毅家，才露“真言”：

“李九莲这样的人，文笔又来得，嘴巴又厉害，思想又纯洁。如果一个人搞政治，有她在身边当助手，了不得。朱毅，你看她怎么样？”

此时，他蕴含复杂的目光，好似汽车前窗上的刮雨刷子，在朱毅的脸上扫了又扫……

朱毅自以为是敏感的，这小子十有八九在打李九莲的主意，纠缠这么些日子，显山露水了，原来是来试探我的。自己是与九莲关系不错，赣州的原红卫兵头头大概都是知道的。这种关系一是因为彼此在“文革”中相知较深，观点常常一致；也因为在省城上大学时，也在江西大学读书的九莲姐姐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自己，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九莲视如自己的妹妹。彼此的关系仅此而已。

朱毅答道：“什么怎么样，在赣州，除了×××外，还有谁能比得过她的？”

曾××注意地听着，脸上泛起了几分失望之色，似乎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朱毅内心看来，在气质、性格、学识上，曾××与九莲并不是很匹配的。出于对九莲的关心，他想证实一下，对方流露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属于一厢情愿，还是业已有了进展？

他也试探着问：“怎么，××，她不理你呀？她真不理你，我去带你把她从家里叫出来就是了……”

“不是，我有一件事……”

曾××欲言不止。又是那种雨刷般的眼光在打量着朱毅。也许是被对方异常的专注给震慑了，终于，他不说了。

五年以后，朱毅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个眼下与自己砥足而眠的年轻人。

曾××接到李九莲的第一封信后，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如同任何事物都能从两面去看一样，此举也是如此。曾××交出这样一封信，自然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风口浪尖上涌现出来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怎样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自然也展露他与写信人关系不是一般，如此嚣张气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才交出来，以前你的革命警惕性喂了狗？这样不是思想上的共鸣者，便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战士，怎么还能在解放军里呆下去？遗憾的是，部队领导偏偏采用了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被很快退伍了，这结果大抵是当初他没有料到的。

那段时间，曾××几乎天天来找朱毅，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在感情上试探对方，若真与李九莲无什瓜葛，自己已经背上“黑锅”，那就干脆“黑”对“黑”，力争与李九莲结婚，并请朱毅帮忙；要么，在政治上试探对方，在众人里李九莲应该受他的影响最大，既然已经把李九莲抛出去了，那就干脆抛彻底，连她的“同党”也一起抛出去，以改变自己的逆境……

人是复杂的，又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年代，至今也难品味出曾××当时究竟是出于何种心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伺机而动？

能明确的只有交出信的后果——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在她房里，抄去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5月1日，李九莲被带走的几小时后，曾××气喘吁吁地来到朱毅家。

“李九莲被抓走了……”

朱毅一惊：“她干了什么事？”

“我在部队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些反动。我不知是谁写的，便将信交给了部队。昨晚李九莲来找我，我才知道是她写的……”

朱毅吼道：“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曾××无言以答。

他并不是个寡语少言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赣州地区革委会主任A与他谈了一次话后，他竟使得同样戴领章、帽徽的A在对待同一件事上，与6586部队的领导们有了相异的想法。作者无缘采访A，但有事实为证：很快，曾××被任命为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

第二章 风雨赣南

你一生清白，在黑夜照亮了一切
你一生清白，我却看不见你
看不见月里的玉兔、神仙和广寒宫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岁月将洗去我眼中的白翳
让我真的见一见你呵
你会奇怪，一个盲人
怎会知道你的清白
不怪，不怪，那是希冀呵
求索呵，求索，向往呵，向往

——李九莲：《月亮——
一个盲人的诗》

五

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0484部队

B副师长由南昌回到赣州，不同意此意见，即携李案材料，重返南昌，向正在南昌的A主任作了汇报。然而，这回A重申了地委常委意见。

固执己见的B副师长，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了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并查阅案卷后说：

“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象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程当即批示：

“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B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传达完程世清的指示说：

“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

判 决 书

（71）精刑字第3号

现行反革命犯李九莲，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工人，个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家住本市陈家巷七号。拘留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

李犯思想极为反动，政治野心勃勃，于1969年2月2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曹××同志投寄一份全长约七百字、署名为“你明白的人”的反动匿名信。信中大肆攻击党中央、

林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1969年又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内容十分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李犯表面伪装积极，骨子里反动透顶，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自1969年5月15日——1974年5月1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1年元月5日

想是惧怕程世清的“威势”，这个显然没有“从严处理”的判决，未敢宣布执行。

“九·一三事件”以后，以判决书里反林彪为主罪的李九莲并没有得到开释。直到次年程世清被当成“林彪死党”押解赴京，李九莲问题才迟迟得到重新处理。显然，昔日认为李九莲不够“从严处理”的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此时也认为她并不是无罪的一一

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

你厂报来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多次调查审理后，于1972年6月10日我部党委讨论

认为，李九莲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本应依法处理，但因交代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本人年轻，家庭出身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此复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2年6月20日

李九莲政治结论：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

三、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性质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

处理意见：

性质虽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代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重新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中共赣州地委

1972年7月18日

1972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李九莲获得释放。

六

我问了李九莲在监狱里的情况。有时她讲得很连贯，有时又时断时续，仿佛人虽自由了，可那回忆还在泥淖里挣扎……

“虽然我看错了人，但我是天真无邪的，即使跳到火坑里，会悲苦，也会大笑和歌唱。你们是不晓得那里面的生活。在那里，善良正直的女性是要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折磨的，要求未遂，就要被毒打，这种男人的心理你是晓得的吧。眉来眼去反受优待。我没有什么资本，只有一个气节，名节。我晓得转眼之间我就会化为粪土，但人得有正气，邪气就近不了身。”

“我刚进去的时候，心里很苦，也想早日出来，日子久了，慢慢静下心来，我是准备坐二十年牢，准备林彪有二十年的命。真想不到，他垮台了。我出狱前，有看守告诉我现在国际上发生了大事，中美建交了；国内也发生了大事，林彪反党了；你家里也发生了大事，你父亲死了。我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父亲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喜的是料不到林彪这么快就垮台了！我是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过了三年呵，哪一天不是怀着希望起床，又怀着希望躺下睡觉，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怀疑赣南就有林彪的人。1971年七、八、九三个月，看守全部都调换了。在这三个月，我几乎经常挨打，有时候随便一个借口就毒打一顿。他们那么高大，围着我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子，真是亏得他们下得了

手。那时候，我就事事小心，免得无谓挨打，可还是免不了。有一次，他们讲我拿了一根针，缝衣针往常都是用后插在门上，现在门上没有了，我又根本没有拿，结果就限我一定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到。我东找西找也找不到，我说我实在没拿，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有天晚上，不准我睡，要我跪，还要头上顶着床棉被。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就向他们要求，今天不跪了，明天再补跪，同号子的人也帮助我求情，这样才让我睡了。第二天劳动休息时，大家都在休息，我也想躺一下，舒展一下疲倦的身体。他们看到了，又要我跪在太阳底下，虚汗流了一地，七、八月的天气那么滚热，我都觉得冷得发抖。他们对我说：‘你以为坐牢那么容易，我们不仅要你在政治上头破血流，还要在你身体上头破血流！’”

“打人的方法也是奇怪的：有时候叫犯人打犯人。有次叫我去打一个犯人。我说：‘我是个政治犯，没有打人的权利。’他们说：‘你不打，就打你。’结果又是挨了一顿打。再有一次，要我把手伸到牢门的小窗外，他们就用枪通条隔着门抽，抽得两只手和臂膀弯不过来，穿衣服都困难。第二天，我劳动时一定要我穿长袖衣服，我心想：你们打都打得，还怕人家看见？我就偏穿了短袖衣服去劳动……”

“他们这样地折磨我，我心理、身上虽然难受到了极点，可是还是尽量做出开朗的样子，他们也觉得无可奈何。有一次就问：‘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李九莲在牢

房里的编号)，要怎样才能使你老实些？’我就说：

‘你们拿纸、笔来’。我就写了一份上诉材料，说明：我哪里是反对革命？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父亲以前是受苦人家出身，三十多岁才结婚，那么穷苦，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我有什么好处？我不为工人阶级设想，为谁设想呢？打我成反革命，我一生一世想不通！可进了牢房，我还是真诚地改造自己，现在你们这样三天一打、五天一跪，我无论精神上、肉体上都吃不消，即使我真是敌人，无产阶级的改造政策也不是这样的改造政策，你们如果把我折磨死了，你们要负责任……”

“他们这样打我，连同牢的人都奇怪。他们问：

‘你年纪轻轻，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说：‘你们犯的是反毛主席的罪，我犯的是反林彪的罪。毛主席的政策不会这样对待犯人，林彪就容不下我。’七、八、九三个月以后，挨打就少了，可是看守又经常威胁我：‘不准你翻案，不准你翻案！’我心里还琢磨不出这是个什么意思，当时我还不晓得林彪垮台了，总以为是我写了那份上诉书的缘故。”

“出狱那天，看守长问道：‘怎么样？年轻人在此度过了三年美妙的青春，有什么感想？’我讲：‘不怎么样。’他又问：‘好不好受？’我讲：‘不好受。’他讲：‘你反林彪是这样，我不反林彪还不是照样吃饭穿衣。’我顶了一句：‘跟你们一样？是副主席就举旗子，不是副主席就踩一脚。’他好气，又正告我：‘不准你以后到群众中去讲！’那时，可惜我记不得《红灯

记》中‘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的台词，要记得，我就要再顶他一句。他们讲话都是这样的刻薄，恨不得每一句都血淋淋地刺到我的心里去，好象总要和我较量精神力量一样……”

我有一次问李九莲，在牢里有没有想死？她讲：

“想过，有一次，那些折磨实在受不住了，我就想活着受罪没什么意思，想寻死，想找把小刀挑开胸来，让人家看一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这念头很强烈，有好几天晚上我就觉得死神在我身边……可是想到一死之后，许多事情都讲不清楚了，才慢慢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只要不枪毙我，我就要活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也就是这样熬过来了……”

我记得李九莲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面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李九莲生前挚友丁成华的回忆

七

李九莲获释后，被安排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选矿厂当徒工。

她对自己的政治结论不服，于1972年11月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提出申诉，又到南昌、北京，向有关部门上访，要求纠正。处处的台阶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处处的面孔都像北方的冬天那么冷。不过，将她的申诉材料转了又转，将她的政

治性命踢了又踢。最后，还是在赣州有了点反应。次年二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致函给画眉坳钨矿革委会，内称：

“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她，对李九莲在政治上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把她当敌人看待。在生活待遇上，应与一般职工相同，不要有所歧视，并请你们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宣布。至于她的工资问题，也请你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规定，与劳动工资部门联系，予以合理解决。”

画眉坳钨矿党委向李九莲本人宣读了此函，并给她定为二级工，由原来的学徒工资十六元增加到每月工资三十七元。

函件中对于李九莲问题的“现行反革命”性质仍没有松口。算了，算了。在北京街头，她曾碰见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寒风中乞讨，李九莲不自禁地和她聊了一会儿。原来她也是来北京上访的，她丈夫参加过新四军，“三查”运动时却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头头，关进了监狱，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五、六张嘴全凭她领着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为别人洗衣服、拾煤核……最近听说丈夫由于刑讯逼供，在监狱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在当地告状无门，一急，从没去过县城的她便抱着个最小的孩子来了北京。已经来了半个月，也是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未等她走完那些迷宫般的高楼，口袋也空了，可问题还是八字没有一撇。妇女说着，说着，围有黑晕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早知这样，还不如去南普陀求观音娘娘。去那儿上山顶，就是一级一叩头，级级叩出血来，也没有这样难啊。”

李九莲囊中也艰涩，一个只工作了半年的学徒工，能有几个钱？除了留下回去的车票钱，她却全掏给了这位妇女，她本来还想添一句：大嫂，面对这冤狱遍地的中国大地，那些高楼上悬挂的国徽，已经麻木了，你就快回去吧。

此时，李九莲自己也决定算了，权当是林彪还在台上，权当自己还关在牢里！

说是说“不要将她当敌人看待”，可周围的人们打量她的神色，大抵总是异样的。上班时，人们不能不貌合神离地与她在一起，下了班，她总是茕然一人。日记不能写了，排泄深深寂寞的唯有歌声，她特地带了一管笛子到画眉坳来，或是向隅而吹，或是坐在山岗上，让笛声随松风悠悠飘散。她能吹的曲子并不多，只能吹《红头绳》这一类当年流行的、且又多少带有抒情性的曲子，她吹得也并不怎么好，有时节奏吹乱了，她就索性唱起来：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家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喜儿唱这只歌的时候，才十八岁。而她，姑娘虽然

还是姑娘，可再过二年就二十八了。人世哪个角落里，也总会有好心的人们，有人听出了姑娘笛声里的哀伤与幽怨，便想起给她介绍对象。那男的在矿上当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三十六、七岁了，仍是一个王老五。经这一撩拨，李九莲顿时也听懂了自己的笛声，自己象花盆里一株缺水的水仙，太需要有人爱了……

她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父母，爱兄妹，爱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生存能力却极强的同学，爱在“6.29”武斗中倒于血泊的红卫兵战友，爱在北京街头碰到的那位抱着孩子乞讨的妇女……自然过去也打算爱曾××。可结果呢？一个人若情感上的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便如经济上的支大于收将导致拮据、破产一样，也将会导致枯萎、凋落。何况李九莲也是血肉之躯，她的中学同学现在大抵都成了家，有的正在将自己这一代人因“文革”而破碎的梦，通过热乎乎的奶瓶兴冲冲地灌输在孩子的身体上……

她默许了。不可能没有几缕悲哀，自己的婚事竟得通过媒妁之言，可心里也萌生了如是的念头：想必他也是一颗受了伤的心灵，两人若结合了，说不定能相濡以沫，互慰终生……

介绍人去找了技术员。那人嫌李九莲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且拿在别人手里。不同意倒罢了，仿佛此事还为他脚下垫了一块什么，工人里去说，科室里去说：

“李九莲想找我，笑话！难道搞起政治运动来，要拉我去当陪斗不成？！”

李九莲听说了，不可能没有一点气恼。可转念一想：彼此“知根知底”的曹××，为那封信都能将自己卖掉，何况这个对自己并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的技术员？他这样想，这样说并不奇怪，说的也是真话。她对介绍人说：

“我们国家里运动多，运动一来，象我这样受过处理的人便是当然的运动员了。谁做了我的丈夫，到时候也真是要跟着陪斗的。我谢谢你了，可以以后千万不要再为我提这种事了……”

此后不久，矿上传得沸沸扬扬，那个脚下垫了什么本来形象应该会高大一点的技术员，竟和一个远近闻名的“破鞋”拉扯上了……李九莲听说了，当着众人的面，随一声撕肝裂胆般的喊叫，人几乎昏厥过去。

“人家宁愿找个‘破鞋’，也不要我这样的人啊……”

她又当了电焊工。这是她在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干的本行。领导上调动她的工作，也许是出于那份函件精神的考虑，可领导上却不清楚三年的监狱生活，给她的身心留下了多少创伤。今非昔比，身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上下几个长长的陡坡，好不容易到了工作点，又蹲不住，干上一会儿，她就晕晕晃晃，觉得人要倒下来……有人向她透露：

“矿上的子弟学校正缺英语老师，你身子不好，要是懂英文，你不妨去找领导讲讲。”

李九莲在中学六年里学的是英语，自信找来课本温习几遍，教初中学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和纯洁的

孩子们朝夕相处，将自己的爱洒向他们，同时也接受他们的爱，对于久遭厄运，终生将呆在这僻远山沟的自己来说，不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她想，先得和子弟学校说说，如他们不同意接受，领导上同意了也是白搭。

过了几天，李九莲在食堂吃饭，正碰上矿上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她鼓足勇气，来了个毛遂自荐，未料到那老师如获至宝：“哎呀，太好了，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打听矿上职工中有谁能教英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回去向我们校长说一说，你等着啊，笃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位老师前脚刚走，一位领导就一堵墙似地横在了她的面前——

“李九莲，你想调去子弟学校？”

“我干电焊工身体吃不消，让我去子弟学校当老师吧……”

领导的脸色一下阴了下来：

“你别听他的，他懂什么事，嘴上有几根毛？教师队伍刚刚清理过，校长宁肯少开一门课，也不敢让你教书啊！不然，运动一来，又是一顶网罗牛鬼蛇神的帽子，校长担戴不起，我也得跟着倒霉！”

李九莲拿起桌上的饭盒，扭头就走了……

这年，李九莲才二十七岁，她本是一条普通却又自由的鱼儿，一条向往壮丽大海和辉煌日出的鱼儿，结果却游到一堵墙里来了，即使是出了狱，可心儿也始终在那堵墙里被嵌得牢牢的。猫儿般的现实在玩弄一条濒死

的鱼儿；她想得到几掬水露般的爱，可她想将自己以血膏熬出来的爱奉献出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想更有效、更尽职地为国家服务，却愈加使她被这个国家所不承认……

而这些无不缘于她的政治结论，无不缘于犹如一把以发丝悬在人们心灵上的克利达摩斯剑——运动。运动呵，运动，“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运动！

李九莲的小小斗室里，宿舍附近的山岗上，再也难听到那哀伤、幽怨的笛声了。牵着长长流苏的笛子，默默地挂在她的床头上，只见她常常向着那面墙而肃然长坐。也许她在想：

这不只是一管与松风天籁为伴的笛子，也应该是一柄搅动山河、划过昏夜的长剑……

八

1973年末，李九莲在报纸、广播里注意到一个越来越频繁的提法：“批林批孔的斗争”。

能将林彪和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夫子拴在一起，这的确是需要巨大的想象力的，其中也一定深藏了什么难测的玄机。而此时处于中国的最低层、政治上也处于绝境的李九莲，她则是务必现实的，她有了一股愈来愈强烈的冲动：既然是全国公开批林了，林彪路线的实质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巨大祸害，将有可能被上上下下所认识。大气候变了，小气候也会变的，自己何不借此机会，澄清自己的问题，洗刷自己的耻辱？

李九莲回到了赣州，打听了朱毅也正在家休假。她去找了他，想听听他的看法。俩人坐在八景台公园假山后的石椅上，朱毅看着她，身上依然是学生时代的穿着，不同的是眼角处有了几丝鱼尾纹，脸庞清瘦了，也黑了些，那是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的痕迹，那是亚热带的阳光与电焊弧光留下的痕迹……

他敬重她。“文革”中，他自以为了解了她，可以后的事证明自己并未能真正了解她。他想：不是想自己，而是想国家，不是谈私情，而是谈革命；不仅把个人打算和国家前途血肉相连，而且使生活命运和祖国命运不可分离；不仅赋予自己的人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而且希望未来生活伴侣的生命有社会价值……仅仅地生一般的意义上说她是革命者，已经不足以概括眼前这个同龄姑娘的本质了。想起她曾告诉自己的，在出狱那天一个原地区革委会保卫部的专案人员这样对她说：

“你在1969年反林彪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反动的！”他也觉得现在也许到了一扫“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尘埃，以还她白玉般的本质的时候了……

他说：“九莲，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去找曾××，事情是从他那里闹起来的，由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样更有利。”

李九莲嘴角一咬：“不，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她嘴唇皮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又终于没有说，在朱毅看来，她这是凭意气用事。他站起来，颇为冲动地

说：

“不想去也得去！你别光考虑自己，你得考虑一下我，我还要做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将来我若要为你在社会上大喊大叫，先不让他知道，肯定是要伤害他的！我们打了招呼，他不肯站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九莲的眼里泛起了莹莹泪光，她似乎想压抑住，可没一会儿，还是哭出了声来……

朱毅呵，难道你没有从这泪光里，从这哭声中，发现姑婆那缕情愫在蝉翼般地颤动？是由于你的粗心，抑或是你发现了，却由于你的正直，正直到面对一堵曾××已造成斗大窟窿的情感之墙，你也不愿就此探进脑袋。因为你宁可把人往好里想，也不愿把人想得太坏，你曾怪过李九莲，那封信上，她不该不写名字……

次日，李九莲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个熟人，要他转交曾××：

“你要他表个态：如果他愿意帮我翻案，就翻，不愿意帮我翻，就把信当场交你退还给我。”

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信送到了地区工代会。办公室里，除曾××外，还有几个人在。如今的曾××，已非当年从部队上退伍下来的模样了，如果说过去他象一个四处飘零的破落户子弟，而今朝这个破落户子弟，已经穿上了一件崭新的长衫，油亮的小分头下，不仅有了满面的红光，而且有了矜持之色……

他接过信，以展读公文的姿态看了起来——

曾××：

自1969年分别到现在，不觉已四年了。四年来，一直没有时间和勇气再见面。我知道，你是并不愿为我负什么责任的，但是我也并不希罕这个。四年来，我和祖国一同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和性格比以前深沉得多了。今天，历史证明：曾经爱过你的李九莲是没有错的。我能够有幸看到林彪的灭亡，是我一生的幸福。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年前那个我落难的晚上。你送我回家，我站在陈家巷口的台阶上，看着你满腹忧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同样的忧疑满腹。回到家里，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我检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毁掉它们。夜深了，人们都睡了，我熄了灯，在漆黑的屋子里独自坐着沉思……几个小时之后，不速之客来临了，我措手不及，痛苦、难受、无法言状地折磨我……我翻滚在床上号啕大哭。之所以哭，想到的不是我，而是你，当时我只知道说：“我是不愿意连累人家的啊！”妹妹她们劝说道：“不要哭了，说不连累也连累了”，幸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我的被害，原告就是你。我庆幸你用自己的手解脱了自己的为难。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无所谓，因为……（作者注：原信如此）有机会清理思想我是

乐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一个这样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什么客气可言的？

我不愿多说这三年艰辛的生活，社会经验的知识会告诉你那里面的恐怖和可怕。三年中，我那一天不在盼望历史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洗刷一个中华儿女爱自己的祖国而又被蒙上罪恶的耻辱！我当时认为没有二十年的艰苦备尝，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估计林彪还有二十年的命。我就在那里熬了一天又一天，渡过了三年岁月，才于1972年7月20日获得释放。出来之后，我从没有放弃过学习，尽力克服自己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心理上受过的创伤，身体上的痛苦折磨，努力要求自己赶上人民群众前进的脚步。当我想到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已被人民识破其面目时，我就一阵阵庆幸，一阵阵无可言状的内心的喜悦。然而，我必须同样坦率地告诉你，我是被关在革命的门外，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被驱出境。林彪早都倒了，因为林彪而坐了三牢房的青年却仍然蒙受着耻辱。我必须告诉你：我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现在我有病也不能去治，要通过段长、矿长批准，在被驱出境到兴围之后，仍要受到这种与林彪未倒台时一样的待遇，也常常使我感到寒心。

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今天，亿万人民又跟



着毛主席反潮流，英勇斗争了。我写这封信给你，就是希望你给以帮助：一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二来通过你更好地澄清路线是非。两年来未想到再来麻烦你，而为什么这次又求你？这件事为什么要你做而不自己做？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更好地揭露他们对人民的欺骗，（他们还诬蔑我反毛主席）还事情以本来面目。我想你在运动中对情况的了解是较全面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是大字报还是宣讲，你都可酌情考虑。下面我再把我的情况向你讲一下……

（作者注：以下部分省略）

办公室的人都听说是李九莲写来的信，众人的目光也就始终充斥着复杂的前味：警觉，怀疑，挑衅，猜忌……犹如考古学家考察一具木乃伊般地盯牢了曾××。室内的空气显得沉滞起来……

曾××看完信，果断地向众人发布了自己的读后感：

“你们看看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想跳，一有缝隙她就想钻，也不想想什么叫‘反潮流’？！”

室内的空气一下又如小夜曲般流畅起来……

又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将信送回到李九莲手里。她听说了曾××的那番话，一股血直往脑门上冲，未顾及多想，就跑去找他。

李九莲“咚咚”地进了曾××的办公室，他架起条二郎腿，桌上一杯清茶，正坐那里看报。听到有人进

来，从报上抬起头，一看是李九莲，颇是吃惊。

彼此打量着。这是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李九莲想起红卫兵这代人，这时不是离乡背井，在风沙雨石里耕耘地球，就是在工厂里一手茧花，一身油花，不久前才爬到了一个可怜的一级工，或者二级工，自己的遭际就更不必说了，可也有眼前曹××这样的，灵魂抵给了魔鬼，却披起一件干部服，有模有样地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悠闲，自在，而且对无所事事的日子特别有耐心。因为年轻，也因为在“文革”中所学会的一套韬晦，他们坚信：眼下坐坐小板凳，或是冷板凳，都不要紧，老家伙们，还有陈阿大这等愚氓，终将被踢下台去，取而代之的将是自己……

李九莲不禁脱口而出：

“你不要做涂烈式的人物！”

涂烈，原是江西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另一造反派头头万里浪于“三查”运动中被打下去之后，他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此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不久，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列举诸多事例，建议结合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实际，来开展“批林批孔”。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转了此信，并作为中共中央(74)七号文件发到全党、全国。至此，“批林批孔”正式成为一场运动而喧嚣全国。

毕竟人不在场是一回事，人在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在李九莲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曹××还多少有点内

疚，有些困窘，脑子里正在上了油的轴承般转动，如何讲几句既表示自己帮不了忙，而又不再伤害她自尊心的话，尽快结束掉这众目睽睽的场面；那么，在她掷出这句话后，他的内疚和困窘一下灰飞烟灭了，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股浸透了恶毒意味的庆幸：这样也好，快刀斩乱麻，心软非丈夫！

曾××跳起来：

“你不要放屁，涂烈同志是什么人物，你李九莲是什么人？你是反革命！”

李九莲的手，几乎戳着了她的鼻子：

“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

他躲到门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

“你这个反革命给我滚出去！”

李九莲走到门口，最后斜睨他一眼：

“告诉你，这个案没有你曾××，我也要翻，翻定了！”

曾××一脸血红，恍如颤抖着的是一块硕大的猪肝：

“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

回来后，李九莲将情况告诉了朱毅。他强自镇静地听完，咬咬牙：

“既然他这副样子……那好，我回全南了，你也得回兴国去抓紧写材料。材料写好后，我们再来赣州见面。”

俩人紧紧地握了手，滋味万千的目光里能准确识别出的都只有四个字：“祝君保重！”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面……

九

1974年4月20日，朱毅回到了赣州。

他没有料到李九莲已经扔下了一根火柴，在章水、贡水汇合处的这座古城，烧起了一把火……

李九莲在向矿山领导请假之后，就携自己的申诉材料回来了。她首先寄希望于那个“小气候”，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材料，寄给了地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要求在解决路线问题的同时，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无端地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的良好愿望。此信似泥牛入海，黄鹤杳然。她又去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妇联，——当面申诉，真是面孔一律，舆论一律，她无处不被斥责为“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

终于忍无可忍了，经与几个关心自己的中学同学商量、斟酌之后，从3月19日开始，李九莲运用大字报的形式，在赣州公园贴出《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辟谣》、《我的态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六份公开申诉。在公开申诉之前张贴的是她1969年写给曾××的那封信。在中国，一封情书竟以五年的血泪、五年的青春作为代价，这是罕见的，一封情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街头，昭告世人，这也是罕见的……

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申诉，她抨击了“三查”运动^①和“一打三反”在江西造成的人人自危、哀鸿遍野的恐怖局面。她揭露了知识青年插队、干部走“五七道路”、城市小商小贩被驱赶下乡等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她指出了程世清在江西不遗余力推行的工农业“两个突破”，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人民的生活贫困，其实质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物质准备……这一切，无不使深受“林彪反革命极左路线”其害的赣南人民，脑灌醍醐，胸浇块垒。又因为紧扣着一个清白女子的坎坷厄运，更让万千群众为之情感跌宕，喟之叹之……

公开申诉贴出后，陆续出现了七、八份个人署名的的大字报，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九莲，十几个单位也通过声明和标语的形式，表示坚决声援李九莲的“翻案”。一场“红色恐怖”之后惊骇未定的群众，更多的是未加表态，但李九莲一案，在一个多月里，已成了赣州市民们议论的热点，关注的焦点。

朱毅也没有料到，曾××那天对李九莲讲的“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并不仅仅是一句气头上的话。

3月下旬以后，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赖愈梁，去了南昌开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工代会由曾××主持工作。权力，犹如吸烟一样，是很能让人上瘾的。若运用起它来，既能显示自己的革命敏感性与主动性，又能借

此将自己的对手于山不显水不露中置于死地，那么它就更象注射了海洛英一样，让人陷于迷狂。这一生中，曾××还没有如此觉得自己重要过，也没有如此不分白天夜晚忙过：他布置下面人去赣州公园抄录大字报，搜集反映。他找地区红代会头头交换看法，酝酿对策。他去地区法院、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串连，与他们共同编辑出《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他起草紧急通知，以地区工代会名义，要地市各单位“组织适当力量，针对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有关材料，分专题写出大批判文章，抄成大字报，迅速张贴到大街上去”……

4月13日，一纸铅印的《联合声明》，恍如大雪过后的满树银花，撒遍了赣州街头和大大小小的单位——

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工人代表大会

联 合 声 明

最近，画局勘矿机修厂李九莲先后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一评反林彪有罪》、《二评反林彪有罪》三份大字报。她的大字报迷惑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特发表如下联合声明：

一、在李九莲一案的罪证中，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定她的案并非冤枉，她根本谈不上什么反林彪的英雄。她现在出来表演，说明她还坚持反动立场，是不会有什好下场的。

二、在此事件中，地委、地区公安局、法院某些领导人，采取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三、少数群众由于不明真相，对李九莲的大字报轻易表态，予以支持，是没有责任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应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受骗上当。

四、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求全区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两个95%，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

1974年4月13日

4月17日，曾××又以地区工代会的名义，起草报告，强烈要求地委对李九莲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

权力就是这样被使用着，而且似乎还天经地义：一旦他进了工代会，他就有了代表工人的权利，哪怕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工人的气味；他就有了操纵工人的权利，哪怕他是在操纵他们去扼杀工人阶级里最优秀、

最具有远大目光的先进分子。没有谁能制约他。没有谁去怀疑他凭什么与权力划等号，而只有等到上面的权力结构在某次运动、某项转折中崩溃了，他才得以被迫告退。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只是马克思、列宁所描绘的工人阶级的羞辱。

朱毅更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回来，导致了李九莲迅速地被拘押。

他在经过地区公安局时，和一位负责人打了声招呼。“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要揪患有高血压的此人批斗，朱毅做起了阿庆嫂，将“胡司令”藏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由此，此人领略了这个年轻人的仁义，以后也领略过这位年轻人的影响与组织能力。1967年8月，赣州市一个名叫舒北斗的中学红卫兵头头，被打成“反革命”，朱毅一下发动起几千红卫兵静坐绝食，硬是坐到舒北斗给当成英雄放了出来，直到同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还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变成了李败”（作者注：李胜系当时的赣州军分区司令员）。也许他觉得报答昔日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局面扑朔迷离的1967年，政治舞台上红卫兵们的鼓噪早已成了绝响；而赣州地委已于4月16日、19日两次开常委会，讨论李九莲问题，最终决定将其重新收审。他知道这一个来月与李九莲有过接触的人已经记录在案，他不想让朱毅再卷进这个案子里去了……

从岿然不动的“小气候”里，李九莲仿佛察觉到了“大气候”里驱散的不是什么妖氛鬼雾，而是在祖国的

天空上聚拢了更密集、厚重的乌云。在公开申诉的最后，她这样宣告：

“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

“人民兴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翻阅历史，多少志士仁人发出过此等气壮山河的声音。可实现起来，后面那条犹如小径上裹了脚的老太太，总是斗折蛇行，姗姗迟来，而前面一条，则似追踪着白天鹅的枪口，它们降临在哪个梳洗羽毛，滋润嗓子，那里便总会响起罪恶的枪声！

当天深夜，一辆警车幢幢鬼影般伏在了陈家巷口。

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密索”的罪名秘密拘捕了李九莲，并连夜押往兴国县看守所。

据赣州市公安局1974年4月21日贴在门头的《郑重声明》称，拘捕李九莲的拘票未通过市公安局，是擅自直接动用的，因而是“非法”的。

有目击者称，地区工代会的几个人，参与了这一秘密拘捕。被捕时，李九莲口鼻流血，显然，在挣扎反抗时惨遭毒打。那几个人还揪住她的头发往警车上拽，造成了李九莲休克。

十

也许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走进苍茫暮色的小女子，终于使赣州二十多万老老少少在春日里感到了惭愧；也许是专制对于民心的践踏，同样适用于物理学上的“虎克

定律”，你拉动一条弹簧，在一定的限度内，你一松手，它总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然而，只要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弹簧就再也回不去了。专制常常忽视的是，在其主宰对象的麻木与抗争之间，几乎只隔着一张纸……

4月22日，朱毅、曾传华等数十名干部群众贴出了一份大字报《众手掀翻独霸天》开头就是：

深夜的警车引起了公愤，李九莲的失踪激起了风暴！只许你们血口喷人，不许我们开口说话吗？办不到。

现在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4月24日夜，赣州地、市259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集会，签署了关于李九莲问题的《联合声明》，鲜明表达了对她的崇高评价：

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

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会后，二千多名群众潮水般涌往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请愿通宵达旦。凌晨，数百名群众又分乘近二十辆卡车，赴兴国呼吁，要求县委、武装部、公安局支持群众释放李九莲的正义要求。同时，还派出代表赴省城

请愿。

连日来，赣州市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发表声明，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签署了地区农林口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声明，地、市许多单位的领导参加了群众集会，兴国县公安局长也发表了讲话，无一不对广大群众营救李九莲的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

连日来，“怒潮悲海不夜天，万头攒动女墙前。”赣州公园里，多少人站在李九莲墨迹犹在的公开申诉前，为她在篇末的预言，为她的预言已经被证实而一掬热泪。仿佛在眼前的这些大字报里就能寻找到这位失踪了的姑娘一样，还未看过的挤来涌去，已经看过的读了又读。夜晚，电源被故意切断，人们就燃起了打火机，甚至点亮火把照着读。字里行间，写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签字：

向反林彪的女英雄致敬！

我们同情您，我们支持您，李九莲！

放心吧，狂啸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和您在一起！

4月25日上午，正当地、市干部群众即将召开三万人大会强烈要求释放李九莲的同时，在南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还兼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R，省委常委涂烈，还有十届中共中央委员潘某，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樊某，一起听取了刚下飞机的赣州地区工代会、三代

会及公安局的紧急汇报。

当时偌大的一个江西省，几乎就由他们几个人说了算。R是老红军，枪林弹雨，鏖战半生，还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人代劳的，他因《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一度全国蜚声遐迩。涂烈算是“文化革命新生力量”的代表了，原先只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团委书记，仪表端庄、简朴，逢人总带几分谦恭的微笑。潘某和樊某，一个原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和煤疙瘩打了十几年交道，一个则是修水县×××人民公社的农民，猪养得好，据说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可毛主席著作也学得好，曾被《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文章誉为“最新最美的人”……工、农、兵都齐全了，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巴黎公社”。真不知在这个小小的“公社”里，他们是以怎样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的，他们又是按怎样的程序来议决诸多重大事务的。中国不比美国，在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尼克松，每个人在位时的档案材料都被完整地保留着；而在我们这里，此时，只见一批批官员走马灯似地上去，又走马灯似地下来，他们的政绩，却从没有人研究，也从不见有专著评价。因此，这个对研究中国“文革”时期政权很有价值的小小“公社”，对后来人说大抵只能是个谜了，还好在李九莲的问题上，当事者们则保留了不少材料。

当日上午，R司令员匆匆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

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当天下午，这五点指示在赣州地、市大大小小几百个单位、数十万干部、群众中传达完毕。

此时，一行人还在去南昌的路上，一行人还在去兴国的路上，人尚未到达目的地，可性质已经在五点指示中定下了。尤其是去兴国的，罪名再加一顶“冲击监狱”，为了使你钻进这顶帽子，象是抛出了诱饵，在兴国，五点指示就是到了晚上也没有宣布……

空气恍如气化了了的干柴，几乎能听见欲裂时的“劈劈拍拍”声，连逡巡的风儿也象在酝酿着什么密谋……朱毅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觉得唯有抗争，而抗争必须握成一个拳头！当晚，由朱毅出面牵头，留在赣州的干部、群众，宣布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仿佛是水到渠成，没有谁觉得与堂堂的R司令员对着干有什么唐突。这勇气，既来自于李九莲所追求的真理，也来自于“文化革命”里“大民主”的习惯，它正是毛泽东主席在打“民意牌”时一再倡导的结果……

然而，谁都清楚，眼下毕竟不是“炮打司令部”的岁月了，在调委会发出的第一个声明中，它就宣判了自

己的命运——

“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十一

次日，调委会便在赣州公园设立了接待站，公园的阅览室被用来写材料，印传单。公园的上空还架设了高音喇叭，这里正处市中心。此后七个月里，赣州公园，恍如成了伦敦的海德公园，那些挂在高楼大院前象征着种种权力的牌子暗淡无光了，而没有一颗印章、一个编制、一分钱经费的这里，却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晨无鸟啼，夜无雾覆，成了赣州人民的麦加圣地！

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公园门口，看到他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在忙着贴大字报，他拉住她的手说：“你也参加了调委会？好，你们为李九^⑤辩护得对！别被 R 给唬住，我和你父亲也是参加过长征的，长征干部不都是象他那样的，回去告诉大家千万要顶住！”

两名中年女工来到接待站再三要求：“我们一不会写，二不会讲，我们天天下班后来帮你们熬浆糊、印材料，要不要？”

一个新华书店营业员，听说正开万人大会和地委书记辩论李九^⑥问题，便带着一个小热水瓶赶来听。同伴纳闷，她说：“这是药茶，吃了清凉。要是朱毅^⑦辩到中途，嗓子哑了，就给他喝！”

纺织厂一位在“文革”里受到严重迫害的女干部，找到调委会负责人，掏出五十元钱：“听说你们上访正

缺钱，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解放，只发生活费，不能多帮点忙。这五十元钱，你们就收下吧，它也许够一个人去北京的路费……”

人民群众用自己拿来的一张张纸，一枝枝笔，一瓶瓶墨汁，还有每一分钱，每一张邮票，每一桶浆糊……支持了调委会。而调委会又用它们，勾勒出民族业已骚动的灵魂，发出了中国早该发出的声音：

三查、一打三反的大方向就是错了！

我们就是要为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翻案！

朝廷里就是有指鹿为马的奸党！

虎彪狼挡道，血泪斑斑的李九莲何其多！

上山下乡血泪何其多，知识青年插队血泪何其多！

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来保卫领袖！

李九莲之所以坐牢，只不过说了真话而已！调委会之所以被禁，只不过是为说了真话的人说了真话而已！

三个月以来，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被省委四次五点错误指示的汹汹气势吓倒，并没有被地委的三令五申和封锁围剿压垮，并没有在公安部凛然的批示面前颤抖，也并没有在地区工代会、红代会投枪的呼啸和匕首的寒光之中退却……调查委员会这个“怪物”始终屹立着，

在层层高压之下，在声声犬吠之中！

在血与火中前行的人类历史，哪一步前进不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呢？一天也是活，一生也是死。而不耻于最后的人们，是宁愿做死了的活人，也不愿做活着的死人的……

一边是斗士，一边是应声虫。一边是政治家，一边是政客。应声虫永远有饭吃，政客永远有官当，他们自以为永远(?)不会有犯罪之辱和牢狱之灾，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去深忍什么，触犯什么。但同样是他们，永远也感受不到林彪倒台后的万分庆幸和无比喜悦，而只会在一个接一个这样的“霹雳”面前永远瞠目结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风雷激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呐喊！

“除了毛主席，谁能反林彪？”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们不许李九莲翻案的又一条响当当的历史根据。好象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永远不发表，林彪的那套唯心理论就永远非得当作唯物主义来崇奉不可似的。

亲爱的许多“书记”大人们，某些挂着共产党员金牌的人们，你们究竟有多少人敢站出来，站到你们曾经对它宣过誓的、缀着斧头和镰刀的红旗下，问心无愧地这样向党说：“我不是私欲重于理想，而是理想高于私欲！我不是宁肯犯路线错误，不愿犯组织错误，而是宁

可冒撤职的危险，也要把路线搞正，我的人生态度不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那么让我们具体看看李九莲的人生态度吧……

先驱者，生前被加着种种的罪名：“大逆不道”、“不安分”，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反动派格杀他们，而可叹的是还在蒙蒙状态的人却一时不能理解他们，奚落，冷笑，恶意中伤，有意或无意地有助于反动派格杀革命先驱。先驱者，死后还要被蒙着灰尘，一年两年，一代两代，等到历史证明了这些先驱的见识和行为是正确的时候，于是就连先前那些敌人也打起先驱者的旗号，纪念他们，表彰他们，为的是更巧妙地格杀那一些后来的先驱者——原来先驱事业的继承者……

由于调委会的卓然独立，及其“一线广播，两张小报，三下南昌，四开大会，五次声明，六赴北京”，对于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日趋深入化、持久化和社会化了。

那时，在首都，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都出现了“李九莲无罪”一类的大标语。在省会南昌，数以万计的关于李九莲问题的大字报，在主要干道——八一大道上有铺天盖地之势，即使在绵绵雨天，也伞阵迤迤，人潮不绝。在整个江西大地，“李九莲”三个字，如雷贯耳，似风遍行，唯明便是在他当时下放的县里看到有关她的大字报的——

记得是在一个阴雨蒙蒙的上午，我来到县城，看到了被人们簇拥着、竞相观看的文章，标题是触目惊心的：《请看——李九莲冤案真相》。开头一段文字写得那么沉痛，又是那么激愤。当我一举目，看到了李九莲的照片，我惊呆了，这是一张多么美丽的脸庞啊，端庄秀气的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下面，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的忧郁……

她作出了判断，作出了选择，而且开始了痛苦和磨难。她由自己父亲的遭遇，进而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遭遇。她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开始厌恶林彪和怀疑起“红太阳”的光辉来。厄运的阴影从此笼罩了她，然而，最终使她陷于绝境的，却是爱情。

……我几乎是用尽力忍住涌出来的泪水，看完了她的“真相”。然后，我再一次走到她的相片面前，细细地端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悄悄地生起，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你是无辜的，你是可爱的，从现在起，我成了你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你的命运已经牢牢地牵连着我的心，让我为你的平反，为你的出狱，为你璀璨的美丽。为你重获人间的幸福而呐喊，而斗争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挤出了人群，不知道

自己是怎样一路默默地走回工厂，脑子里只有李九莲，李九莲，牢狱，牢狱，信，信。眼前只有她那端庄美丽的脸庞，只有那双忧郁地温柔地凝视着我的眼睛。

记得当夜万籁俱寂的时候，我摊开信纸，向在远方的恋人急急地倾诉着我的感受和情绪，从此，李九莲便成了我们相互间经常的话题，我们共同为之喟叹，为之不平。记得我给恋人写过，亲爱的，请原谅，当我一见到她的相片，我就明白，自己已经立刻爱上了她，假如命运之神没有把你送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向李九莲，这位被囚的维纳斯奉献我的心，我会为她奔走呼号，为她走到天涯海角永不回头。今天，当我将自己的心扉坦露给读者诸君时，我仍然感到了难已的激情……

从此以后，李九莲案件便深深地撼动了 我，影响着我业已开始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我知道在整个江西大地上，李九莲案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声援李九莲，要求释放李九莲，她成了江西各地一时间议论的中心。

◎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民族现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中，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官明华，王申酉……论当时影响，没有比李九莲更大的了。他们的英名，大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世人所知，而李九莲的名

字，还有她的思想与风骨，在1974年便在江西大地上涌动着另一条奔腾的赣江！这“赣江”不仅是为解决李九莲一个人的冤案而滔滔东去。调委会及各地人民群众几百万言的辩护、申张文字，因为有的散失了，有的至今仍锁在某个公安局的铁柜里，而留存下来的因为篇幅关系，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展示。但是它们既然沿着李九莲已经打破坚冰的河道出发，那么无所畏惧地冲击当时中国森严壁垒、不可一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重大禁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狮鬃般猎猎高扬的潮头，便是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偏偏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及如蝇逐臭、如蚁逐膻地吸附在这“成果”上的新老权贵们，毫不留情地打去！

丙辰年清明的绵绵细雨中，天安门广场上那花圈的海洋，诗文的海洋，已经毫无愧色地被镌刻上了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丰碑。然而，请不要忘记，在赣南那广袤的红土壤上，还有在江西，所发生过的这一切要比“天安门事件”早两年！

或许，因为它们发生在二年之前，发生在哺育了人民军队和共和国雏型的老区，发生在最早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又最虔诚地崇拜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之中，这一切便更值得让今人沉思，叫后人玩味……

十二

在罗马，穿过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来到柏

拉丁山的脚下，再经过蜿蜒曲折的一条小路，便来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这里耸立着一座巨大、阴森的古堡。这便是闻名世界的罗马宗教法庭。

法庭大门右部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在这里，1633年6月，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刑讯持续了五十余个小时，法官每四小时换一轮，却不许伽利略有一分钟合上眼睛。行刑者将毛骨悚然的刑具拿了出来，以老师的耐心向这位大科学家讲述了每件刑具的用法及对人身造成的摧残……伽利略在关押三个多月后，最终屈服了，承认了自己长期坚持并宣传的哥白尼的“太阳静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昼夜运行”的真理，是对《圣经》和教会的严重诬蔑与攻击。

主持审讯的格鲁利主教，宣布了宗教法庭的判决：禁止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发行和流传，暂时将他正式关进监狱，并规定伽利略在三年内，必须每周唱七个忏悔的圣歌一次。

宗教法庭并不起源于17世纪，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罗马。它约形成于13世纪，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里，它几乎广泛存在于欧美各国。

宗教法庭，^④又名异端法庭，顾名思义，即是以镇压异端为自己职责的。凡否认教会制度的信仰者，即为异端。犹如有上帝就必有魔鬼撒旦一样，自基督教会产生，异端就如影子般始终困扰着它。为此，教会展开了

长期的斗争，最终选择了火与剑——“谁要是不听规劝，那就把他从世界上消灭掉！”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

“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异端法庭鼓励、接受日常生活里最卑琐的告密，此外，它还养有一批“鹰犬”，在哲学、政治、历史、艺术等诸方面的著作中，去嗅出异端的思想学说。为此，它既对付向王权和世俗封建秩序发出挑战的平民们的反抗活动，它也对付向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地位挑战的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在1481年至1808年之间，欧美各国的异端法庭，共判处了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火刑活活烧死者，达三万二千人。相比之下，对伽利略的判决，算是从轻的。

美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廉·德雷柏对此描述道：

有思想的人无论注视何种方向，天空都充满了恐怖的阴影。没有一个人沉没于思想之自由中而得免于惩罚。宗教法庭的行动如此可怖，所以巴格里雅利西的呼号：“一个人做了

基督教徒而能死在他自己的床上，这是太难的事了”，也就成了千万人的呼号！

异端法庭，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卑劣的一幕。这个象征着恐怖和灾难的罪恶机构，对于欧美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都投下了极为深长的阴影。以对伽利略的审判而言，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它“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如果说，17世纪到18世纪，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口号，敲响了异端法庭的丧钟的话，那么1776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后的第二年所发表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于同年八月通过的《人权宣言》则举起了向封建王权、僧侣神权进攻的光辉旗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也将中世纪的黑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权，包括人民必须具备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这样被提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多少年以来，我们总是说它们的提出，在当时确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可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犹如狐狸把鱼汤盛到平底盘子里请仙鹤吃，可仙鹤那长长的尖嘴，怎么也吃不着，汤全被狐狸喝尽了……

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的权利应该有真实、彻底的内容了。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言论

自由的权利，应该有着长足的保障了。虽然为了真理而斗争，在哪个时代里都不免付出代价，甚至有人牺牲，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总该比其他任何制度，对此会提供更优越、更稳定的条件吧？

然而，在“文革”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毛泽东主席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犹如在饥馑遍国、饿殍遍野的年代，他在韶山却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在今天，面临一场能让泰山崩裂，黄河倒流的千古浩劫，他能说：

“形势确实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高兴时，他信之所至，钦定林彪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

震怒了，他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由他去吧”……并且表明早就洞悉了那个总摇语录本的家伙，倘若不信，有1966年5月致江青的信为证。

仅此一人。仅此一人。

即便是炙手可热的林彪、江青，也只有相对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在江西，R司令员，涂烈，潘某，樊某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自由就更不多了。他们是晒干的丝瓜，除了两报

一刊里的观点和语言，他们腹中几乎空空如也。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正是在此不自由中，获得了为官的自由。否则，凭什么偌大一个江西省，三千多万人口，会听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社”摆弄呢？

平民百姓呢——

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英明领袖”上台了，你就有歌颂“英明领袖”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罕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的自由。

“批林批孔”了，你就有说孔子是个色鬼、吸血鬼的自由。

“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就有喊武则天、吕后是个大法家、大革命家的自由。

你若被打成“反共救国军”了，你就有了构思自己如何与台湾联系、台湾在那天晚上派来架飞机给你扔下二门大炮、十挺机枪、一百颗手榴弹的自由。

你父亲若被揪为“历史反革命”了，你就有了揭发他拿着手枪逼迫你去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动标语的自由。

你朋友悄悄地钻研业务，你就有了与他“忆苦思甜”——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自由。

你邻里不经意地化了下简妆，你就有了给她“斗私批修”——要谨防“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象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还象只公鸡，你叫早了，哪怕只是早几分半刻，惊扰了四邻，众人不容，你有被宰的厄运。你要叫得与一刹那间跃上海面的鲜活太阳同步，你又难有如此精确的生物钟。你只有在霞光满天、车人如潮的时候叫了，可这样你的功能便退化了，你成了只徒有虚名的公鸡……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的嘴巴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文化革命”中，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一个职能就只能凑合着对付了。为了不当“异教徒”，第二个职能也分外凄惶，或是闭口缄默，人人皆为华子良，或是悄悄地说上一点什么“小道消息”，都得关上几道门……

我在复旦读书时，有的外国留学生真难理解，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人在那十年内何以会有如此高涨的繁殖兴趣？其实并不难理解，上面受压抑，下面就要发泄，而且这一发泄因为不要通过思想和言语来进行，又是无比安全的。否则，连这点点兴趣都被剥夺了，中国人何以为人？

人口的高速增长，与优秀人口的被摧残、被扑灭及全民族思维水准的奴化、僵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

差。这不仅是中世纪的罪恶与黑暗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的重演，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在民族素质上的一场慢性自杀。这场慢性自杀的严重后果，不会随那段黑暗与罪恶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以至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不能不吞咽它的苦果……

而发生在“文革”中的这一切，对于人民的权利的蔑视，对于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禁锢与扭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的么？

马克思对于没有民主的政府作了这样的刻画：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十八页）

马克思对于没有公正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评价：

“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十六页）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更对专制主义作了如是的嘲弄与抨击：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

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仅看看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与普鲁士铡刀般粗暴的书报检查制度作了何等坚韧的斗争，便知道这位有着雄狮般硕大头颅的犹太人，是一位民主意识十分强烈的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不能怪马克思主义，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那十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李九莲一案正是这十年的缩影。

为什么这十年的天空纸糊般脆弱，竟然难容下一鸿一爪似的“异端”？其实，诸多“异端”出现，正是普遍信仰解体的信号，正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即将到来的标志。

为什么这十年的上质和莫尔西亚山谷的土质那般相象，雨后大森林里野蘑菇般疯长出一个一个的“异端法庭”？其实，它们什么也难以捍卫，只不过是加快了风云突变、天地玄黄时刻的到来。若没有“四五”运动后全国性的大审讯，大追捕，能有几乎接踵而至的扬眉舒怀的十月金秋？

还得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博大的眼光与恢宏的胸怀，去承受已被人类文化长河洗刷得如金子般璀璨的一部新的《圣经》——

“活生生的创造意识与硬化的普遍信仰，在历史之流中不停地移位、变奏……所有的普遍信仰都曾一度从创造的意识变形、发展而来，但所有生动的思想，创造的意识，也都可能摆渡到普遍信仰的彼岸。”（谢选骏《荒漠·甘泉》）

十三

1974年5月9日，R司令员下达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尧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年5月12日，R司令员决定在南昌召见调委会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

5月19日上午9时到下午1时，在省委滨江招待所，调委会曾传华等九名代表与R司令员、涂烈、樊某等人，就李九莲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激烈争辩。

1974年6月1日，省委秘书组传达R司令员关于李

九莲问题的四点意见：

一、李九莲确系现行反革命分子，证据确凿，本人曾供认不讳，过去对此案的审理是完全正确的。

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革命分子窜到赣州，进行翻案活动，干扰和破坏批林批孔，中共赣州地委决定拘留审查是必要的，正确的。

三、赣州地委个别负责人丧失立场，支持李九莲翻案活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自己，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群众中为李九莲问题成立的组织应按照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精神予以解散，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设立的广播站应予撤除。部分群众不明真相，持不同意见是没有责任的，各级党委应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不允许追究他们的责任。

四、广大革命群众要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排除干扰，提高警惕，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健康发展。

不久，公安部对李九莲一案作了第一次批示——

江西省公安局：

你局寄来有关李九莲案材料收悉，已转部领导看过。请向江西省委汇报，按省委意见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

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常委张春桥，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在北京办学习班的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并一起听取了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关于赣州李九莲一案争论的详尽汇报。

汇报完后，王洪文大大咧咧地说道：

“李九莲哪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时我们都看不出来哩！李九莲不可能是先知先觉嘛。”

张春桥的两块镜片后射出幽幽蛇皮般阴冷的光：

“李九莲的问题就是否定推翻嘛！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的觉悟哪里去了？！”

十四

朱毅对钟海源的第一次印象，是见她在李九莲的《我的态度》那份大字报上签字。

当时签字的人很多，但大都是男的。他不禁多看了这个身穿苹果绿春秋衫的女性一眼，又注意起她的签字：

“李九莲，您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过了些日子，朱毅在调委会接待室里与一个单位的同志谈事情。她进来了，说自己原是地区广播站的，要求到调委会广播站工作，想找负责人谈谈。他表示现在正忙着，没时间，她说了声“我等着”，便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

朱毅谈完事情出来，约有个把钟头了，见她真的坐在公园门口的一条长凳上，静静地等着。这时，朱毅才觉得面熟，想起她就是在李九莲大字报上签字的女性……

他走了过去，她赶紧站起来——

“我就是朱毅。你叫什么名字？”

“钟海源，大海的海，源泉的源。”

她一口圆润的普通话，自然、纯净得象一尾汨汨流泻的泉水……

“你在地区广播站干什么工作？”

“原来是播音员，‘批林批孔’了，没什么可广播的，我便要求调去了景凤山小学。刚去不久，课都有老师上了，暂时学校没什么工作好安排，我就想到你们这儿来当个播音员。”

“你为什么想来这儿搞广播呢？调委会可是块漩涡之地……”

“你朱毅为什么要从全南回来呢？”

“我和你不一样。我与李九莲‘文化革命’前就认识，‘文化革命’中我们又在一起待过……”

“难道不认识李九莲的人，就没有权利去伸张正义，我佩服李九莲，我觉得应该为她的平反干点什么，我才来的。”

犹如金字刻上羊脂白玉，以致于今天这两句话给朱毅的印象仍很深，很深……

也犹如怕不小心伤害了一块羊脂白玉，朱毅解释道：

“你晓得不，R司令员下了五点指示，省委的态度已经明摆在那里，现在我们唯有抱成一团，可以后调委会肯定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同情、支持我们的干部、群众虽很多，调委会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四十几个人，我们不想让更多的人卷进来。对你也是一样，别人还不太认识你，单位也没有注意你，真出了事，你还是一位小学老师，一旦卷进来了，就不同了，后果也许会很严重……”

“后果我考虑过了。”

“你考虑了什么？”

“为了李九莲这个冤案，赣州城里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讲话，站出来斗争，别人不怕，我有什么怕的？”

也许是谈话的气氛始终太严肃了，已经觉得应该收下她的朱毅，想开个玩笑轻松一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已经向他的潜意识层里发出了个他眼下尚浑然不觉的信号……

他问：“小钟，你怕死吗？”

“不怕死。”钟海源嫣然一笑，白皙的脸肤上泛起一抹红晕。她也当成了玩笑。她也浑然不觉。

“朱毅，你要不要听我广播一下？”

“不用听了，你的播音水平我信得过。我仍是怕你将来会怪我……”

她嗔怪了：

“你一个男子汉，怎么婆婆妈妈的！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

调委会的广播站，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10点半。群众的心声，群众的稿件，有时也播官方的观点与态度。那段时间，小小古城里，俨然是一个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几个播音员分早中晚三个班次，钟海源则上完自己的班后，又常常主动再值一个班。除了播音，一有闲暇，她还帮着刻钢板，抄大字报，或者接待来访的群众。在调委会里，和大家的关系也相处得挺好。有一个姓邱的工作人员，人品不错，可说话大大咧咧，举止也不拘小节，颇有些江湖浪荡子的味道，众人都喊他听“邱麻子”。唯有钟海源，一见到他，老远就打招呼：“邱师傅，邱师傅”……举手投足间，她无不彬彬有礼，让人想起以温良恭俭著称于世的日本女人。

给众人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钟海源总带着个两岁的独生女来调委会。自己要播音了，或是要干个别的什么事情，就要女儿独自在一边玩。室内室外，满眼闹哄哄的，皆是大人们的世界，她

能怎样玩？不过是缩在一角，或折纸，或涂鸦，再不就是说着自己才能明白的碎言只语，那孤僻的神情很是楚楚动人……有时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女儿肚子饿了，哭哭啼啼的，或是由她哭去，或是给她塞上几块饼干……若按常情，单位上没事干，让你全薪在家里带孩子，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钟海源却连孩子，一起扯来了这块旋涡之地。

省委几次三番下达指示后，各单位都接到了通知：在调委会工作的人员，本单位一律停发工资。于是，自8月份起，钟海源成了最早停发工资的一个。人不能不吃饭，无论是思想，还是同情与勇气，均填不饱自己和一家人的肚子。有人不得不走了，却未见她为此吭一声，也未见她在调委会的工作，有丝毫的松懈。

人们在敬重之余，还会想：也许她的身后，有一个深明大义、豁然大度的丈夫在鼎力相助……

朱毅渐渐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原单位的领导同情他，还按月给寄工资来，但为了不牵连领导，也为着和调委会的工作人员风雨同舟，相照肝胆，他寄信去原单位，也将自己的工资停了。自己孤身一个，混口饭吃还是不难的。钟海源却象是有了误会，他调委会里事情多，家里又住得远，下午老是不回家，常常走到哪个单位，就吃在那个单位，她发现了，此后便几乎天天给他送晚饭来。

朱毅感觉到了什么。他向她讲明了情况之后，她也依然如故。她知道了他原籍是湖南人之后，给他送了两

大罐腌好的辣椒来。晚餐常常送的是馄饨，怕冷掉，用暖水瓶装着，一只只圆滚滚的，翠绿的葱丝、嫩黄的姜末，红辣椒切得匀匀细细的，一看便会食欲大增。饮食店里的馄饨，哪会做得如此精致可口，显然餐餐都是出自她的手……

每回朱毅津津有味地吃时，要不钟海源就将他的脏衣服不声不响地找去洗了，要不她就站在旁边，目光里复杂而又深沉：

敬重。隐忧。怜爱，类似母性般的怜爱。抑或还有憧憬，某种朦朦胧胧恍如水中月、雾里花似的憧憬……

朱毅说不清楚这目光。

一方面，他却清楚自己的一颗被严酷的社会磨砥得无比粗砺的心，却因这目光而渐渐酥软。甚至在一股融融的暖流之中有了水草般地轻荡……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愧对这目光，尤其是他知道她正坚持要与丈夫离婚、而丈夫又坚持不肯离之后。形式上自己还是个自由身，可从调委会成立，公然向强大的势力挑战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十有八九，自己的政治生命终有一日将要被压成齑粉！他不能让她刚从情感的废墟里爬出来，又一头栽进墨黑的深渊……

朱毅开始注意回避钟海源。

公安部的第一次批示下达后，无形的压力愈来愈沉重。朱毅曾想解散调委会，既然李九莲一案的争辩，已波及全省，震惊朝野，终成铁案，难有回天之力了，何不偃旗息鼓，再待时机？而且，在省委不久前下达的四

条意见里，有这么几句话：“部分群众不明真相，持不同意见是没有责任的，各级党委应耐心细致做好思想工作，不允许追究他们的责任”，若真能照此办理，就由“明真相”的自己一人来承担全部后果，这也是件幸事……

他想先回全南等着，自己一走，调委会也就自然散了。他提出来后，大家未说什么，只是一致表示要给他钱行。到了钱行那天，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全来了，唯有钟海源没来，这是朱毅的意见。他担心在这样的场合，她情绪可能会失控……

其实，那天大家的情绪都失控了——

叫着，喊着，抱着，哭着。流泪的不是泪，酒杯里不是酒。满桌子叮叮咣咣，满屋子沉郁悲壮。

如果不是为了李九莲，不是为了李九莲所追求的真理，调委会前前后后一百来个工作人员，几个月前还是陌路上人，怎么会风风雨雨之中聚在一起？大家的命运又怎么会捆在一起？可在眼下，甩扑克、打麻将不难，飞短长、播事非不难，逐私欲，昧良心也不难，唯有追求真理、张扬良心如此之难。眼下，难也只能是难在一起了，要蹈火众人一起蹈，要跳海众人一起跳！

结果，调委会未散，朱毅人也未走。

为大家的热忱与精诚感怀不已的他，过了几天，便在家里摆了两桌酒菜，以答谢大家。他又没有叫钟海源来。可钟海源并没有蒙在鼓里，她心灵的被挫伤，也许误会了，还有忠诚的被亵渎，朱毅是可以想象的……

她当他的面，依然如同被扣工资后的一声不吭。在调委会里，她昨天干了什么事，今天依然照样干着。只是在她复杂、深沉的目光里，终于压抑不住，流出了几丝幽怨……

仅仅几个月之后，朱毅便明白自己犯了一个与初衷完全相反的错误。

四年之后，朱毅更是痛心疾首，自己犯了一个终身无法弥补的错误。

第三章 铁窗铮骨

“人类只是一棵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

——布雷兹·巴斯卡
《思想录》

十五

1974年10月中旬，调委会几个工作人员，将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C扣在了行署招待所。扣他的理由，一是当时正进行赣南“三查”运动杀人风潮的调查，而他在“三查”时正是瑞金县革委会主任，要他就此作出交代；再有就是要他明确表态，补发调委会工作人员在原单位被扣发的工资。

C瞅了个机会，宛如惊弓之鸟似地来找朱毅：

“朱毅，‘三查’杀人那事，你们就晓得来找我，我是事先不知道，事后制止了……”

“就凭这一点，你瑞金死了三百多人，你却事先不知道，你就够呛！”

C慌了，脸急成猪肝色：

“你晓得于都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

“于都杀了五、六百人，我们才三百多人，你们调委会怎不晓得去找他们？”

朱毅吼道：

“哪有共产党的官比杀人多的，你给我住口！”

就这么个层次，就这么个水平，又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连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都四处扯着嗓子喊：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你能都归罪于一个县革委会主任？

对扣人此举并不同意的朱毅，极力抑制住自己，挥了挥手：

“你可以回去了。”

他筛筛抖抖，竟不敢自己回去……

10月17日，赣州地委书记D以调委会“绑架”了地革委会副主任C、“继续大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直接对抗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为由，密电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对调委会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自然落在了中央当时分管“批林批孔”运动的王洪文、张春桥手里。他们两人责成江西省委在京常委，按

照他们对李九莲一案的明确表态，果决处理此案。

10月22日，江西省委在京常委通过了给赣州地委的决议——

赣州地委：

地委10月1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央收到了。省委在京常委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如下：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这四点决议，当晚分别由潘××和R司令的秘书，急电告在南昌、赣州的省委、地委。

电报内容，朱毅次日就知道了。转眼间每刻每分的时间，都象走在定时炸弹上那样惊心动魄……

他先去理发店剃了个头，回来后秉烛夜书，赶写了几封信。24和25号，更似织布机上的梭子，跑各家，奔车站，遣散调委会主要成员，将他们一批批送往各地，以免一网打尽。他不想跑，他为对方设身处地想，轰轰烈烈七个月，闹到王洪文、张春桥那里去了，对方抓不到自己，岂不太丢了面子？自己得给他们留个面子。他

也不能跑，自己必须履行自调委会成立那天起内心里早已作出的承诺，一人将调委会的全部“责任”承揽起来！

当他再经过赣州公园时，暮意阑珊之中，门口行人寥落，几乎冷可罗雀，只见几双磷火般闪动的眼睛在来回飘忽……

一阵重负卸去后的轻松感过后，一股更强烈的失落感充塞了心头。一切都过去了，这二百多个有爱有恨、有声有色的日子；一切都将泯灭吗，这二百多个敢做敢当，敢吟敢歌的日子。这里不是人去室空、余音绕梁的怡红院，潇湘馆。这里是中国夜色如磐的长夜里，一座曾云集无数宙斯、万千火把的奥林匹斯山。自己不该有这份失落，他觉得必须为明天给这座“大山”留下些什么！

此刻，朱毅想到了一个人，凭清彻的理性，也凭压抑了的感情，他断定这是一个可以以这段岁月的见证和对未来灼热的期待相托付的人——钟海源。

她没有撤离赣州。也许是朱毅潜意识里的安排，也许这更是她本来就有的秉性，在调委会里，她干的都是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工作，抛头露面极少，人们对她远没有对她内声音来得熟悉。又是个女同志，朱毅估计不会对她怎么样，何必要让她抛家携女，四处飘泊，她丈夫不是更要耿耿于怀么？

象是彼此心有灵犀，钟海源此时也想到了朱毅。

她来了，提出去外面走走，他陪她去游了八景台。八景台在八景公园里，古代是小城的防御阵地。往下看，是章水、贡水的汇合处，往周围看，小城的八面景

色皆入眼中。

时令正值金秋。柔和似纱幔的阳光中，乍看之下，小城澄静而又色彩分明，恍如系在青苍色江水缓慢、庄严地流去的赣江上的一个迷离梦幻……

他们不会有澄静的感觉。现实更不会让他们沉于梦幻。他们久久注视着的是西面伟峙的郁孤台。

南宋词人辛弃疾，抗金主张未被昏庸的朝廷采纳后，自行南下联络、组织抗金武装。路过赣州时，他登临了此台，想着仍在灯红酒绿、笙歌水袖里的京都，想着已被吞噬多半、云暗雾嶂的中华河山，他喉间的郁结，胸中的孤愤，一如脚下的江水奔泻：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予，
深山闻鹧鸪。

他们耳边，也仿佛听见了长夜冷雨里那鹧鸪的一阵阵啼喊：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也许，此刻她与他相怜相伴的欲望，愈发强烈了，如同栖巢里两只鹧鸪靠得紧紧的，彼此焐热着去度过冷

雨长夜……她的嘴唇蠕动了，又止住，止住了，又蠕动。

朱毅未等她说什么，这个过去带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似乎现在情感世界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老牛皮。他打开随身带来的书包，将调委会的一些材料和自己部分文章的底稿交给钟海源。交给她的还有几个通讯地址，几张照片。在一张照片后，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忍耐并非罪恶”。他虽然无言，却明明白白在告诉她：“我走了，而你必须留下！”

他正是将这些东西作为遗物一般交给她的。里面有李九莲所苦苦追寻的真理，调委会不长也不短的七个月历史，里面还有他的巨大信任，他的无法说破只期待她能谅解并释去幽怨的隐衷，还有他对她前程与个人生活的衷心祝福……

钟海源不象是感受到了他的期待与祝福，接过去了，可秀美的睫毛和纤纤的五指都在颤颤地颤抖，仿佛接过去的是一抹就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就要枯萎的残红。她的目光里溢透着凄凉，还不仅是凄凉，因为得接受这晚霞的消失，这残红的枯萎，目光里还有某种自嘲，某种被迫的残酷意味……

那目光又是单一的，单一得象一串晶晶润润的烛泪，一枝檐下快要融化了的冰梭，叫朱毅不能不看，又不忍多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在中学、大学里不知多少次读过这诗句的朱毅，今天才体会到这诗句一旦溶于血脉，那胸中便会有一种怎样悲怆、超拔

的境界。他余兴未了，觉得自己是一匹流血太多的战马，就是在倒地之前，也得发出一声猎猎嘶鸣！

10月29日早上，朱毅回到家，看望过母亲，他写了一份大字报《仍然并非最后的话》。又在当晚他被捕前的几个小时，将这份大字报贴在了赣州公园的女墙上，那里正是贴过李九莲公开申诉的地方——

李九莲已先我们（坐牢）去了，我们也即将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赣州的人民。

我们并不遗憾。因为我们和人民及其忠诚的女儿（李九莲）一道，共同创造和度过了这样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所思想的比过去七年还要多。能够这样思想，证明我们比过去七年还要勇敢、纯洁，我们的思想收获比过去七年还要丰富、深刻、珍贵！

这段岁月，和由此即将而来的一切，对于我们不是耻辱，而是一个真正无愧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才应感到那种骄傲和自豪。

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是开朗的……

十六

调委会取缔了，赣州的这块地面非但干净了，平静了，而且“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胜利。因

而，领导者们能有时间坐下来，松口气，再泡上一杯茶，点上香烟，在蓝色水母般轻轻荡开的烟雾里，对自3月份以来的颇为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作一番回顾……

1974年12月3日，赣州又一任地委书记E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主要是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长达几万字，可它却是当时的官方（不仅仅代表地委）对于李九莲和调委会的一份正式、全面的“檄文”，为着报告文学的客观性，同时，也为着后来的人们对于快要湮灭于历史云烟里的这个故事，能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了解，必须将它摘录于本文。这里，作者省略了报告中无关的开头部分（约占整个报告的五分之一，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74）26号文件，追查政治谣言等），此外，对后面的部分，作者也只照录其中主要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依据的，是经赣州地委办公室记录整理、供传达用的中共全南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1974年12月21日的翻印文本——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

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护，那是别有用心，也是根本站不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一套反动思想的影响，她的许多话都与“571”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思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

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上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这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

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
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
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
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当然，参与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
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
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
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
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
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
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
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
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
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调委会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他们攻击
毛主席……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
历次政治运动……还有的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央
今年25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
定能平反！”……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
首先不是我们乱扯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
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
题。如果说是办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
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

班，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弄清了问题就结束……

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作，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作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多，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出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十七

兴国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4)兴刑字第47号

公诉机关：兴国县公安局

被告人：李九莲，女性，29岁。工人家庭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汉族，籍贯江西丰城县。家住赣州市陈家巷7号。捕前系画眉坳钨矿工人。于1974年4月20日拘捕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该案经本院审理查明：

被告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现实不

满，发展到思想反动，以致走上犯罪道路。1969年间，先后书写反动日记三十余篇，长达七千余字，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一封，其内容极为反动，恶毒地攻击我党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妄图拉拢他人参与她的反革命活动，阴谋组织反革命组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其上述反革命犯罪事实，我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间将其依法拘留，本应依法惩处，但经过教育，被告坦白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已给予宽大处理，免予了刑事处分。1972年拘留教育释放后，并重新安排了被告在画眉坞钨矿工作。

被告理应老实守法，将功赎罪，可是她并不痛改前非，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告错估形势，从画眉坞窜到赣州市，公然在赣州公园围墙上公开张贴其反革命匿名信，扩散反革命毒素，公开张贴其泡制的反革命翻案书，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大好形势。

在1974年4月20日拘留被告时，又从其家中查获一批已写好了的反革命大字报及其他反革

命材料，如题为：《我的人生态度》、《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等，内容十分反动，犯下了新的反革命罪行。拘留入狱后，被告仍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抗拒交代，违犯监规，咒骂管教人员，并继续散布反动言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被告李九莲，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罪行严重，活动嚣张，民愤很大，态度顽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批林批孔运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现根据党的政策，依法判处被告李九莲有期徒刑拾伍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如不服本判决，限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理由，上诉于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兴国县人民法院（章）

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5）全法刑字第26号

起诉机关：全南县公安局

罪犯：朱毅，原名朱民盛，男性，现年三十岁。家庭出身（未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程度，汉族，系湖南省武岗县人。现家住赣州市南门外牛岭居委会。捕前系共大全南分校教员。无前科，现在押。

罪犯朱毅现行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现行反革命分子朱毅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于1974年4月间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擅离职守，窜到赣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案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74年4月26日为首策划组织“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竭力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

自非法组织“李调会”成立之日起至1974年10月29日强行解散止，曾在赣州公园架设广播，主办《野草》、《战期》、《动态》等刊物。亲自起草《众手掀翻独霸天》、《九吐心》、《静夜捫心录》、《调委会和她的群众运动》、《告全省人民书》等反动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朱犯的策划和煽动下，先后七次组织人员赴京，在京张贴为李九莲翻案的标语，破坏首都秩序。同时，还先后冲击赣州地委扩大会议，绑架扣押地委领导同志，围攻兴国县委、县武装部、县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冲击兴国县看守所，冲击地区政法机关，殴打公安司法干警，抢占地委交通工具，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

严重地破坏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

当江西省委三令五申指示解散“李调会”非法组织时，对朱犯做了许多教育工作，朱犯均不听劝告，仍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为非作歹。在审查期间，不但不老实交待罪行，反而继续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辱骂对其审查的人员，并以“绝食”来对抗审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事实，经审理查明属实，证据确凿。本院认为：现行反革命犯朱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向坚持反动立场，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为首策划组织“李调会”，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且经多次教育，仍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情节严重，民愤极大，实属顽固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维护社会治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保障“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严判决如下：

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朱毅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日起，五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赣州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

全南县人民法院（章）

1975年12月12日

十八

1975年5月，以后来在中央搞“两个凡是”的那人兼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的报告。

被王洪文、张春桥钦定为“右倾翻案复辟”典型的李九莲案件，和“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反革命”性质终于被最高钦定了。

江西省政法领导小组为公安部批复后，这个报告发了专案通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朱毅低估了那张网的能力。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再跑，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在他被捕之后，一个个地请君入瓮。继李九莲与他被判刑，仅仅在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被推上审判台、正式判刑者就有十五人。

对朱毅来说，十五个人里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的，只有一人，那便是钟海源。

仿佛是命运特意要安排这位女性进入这个故事里，与曾××那个六尺须眉男子作一比较，一个接到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后，“立场鲜明”地交出去了；一个收

的一包“反革命宣传材料”后，隐匿不报之外，反将自己交了出去。

在她的那间小屋里，钟海源起草了几份传单《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写了又自己刻，自己印。没有油印机，就将蜡纸铺在地上，上面用软布使劲抹，几张，几十张，几百张……

也许这一切都是在深夜她丈夫与女儿大梦沉沉时，她才进行的，也许当进行这一切时，泪花，还有额头上的汗花，扑簌簌地掉在了蜡纸上，和进了油墨，渗入了传单。还掉在地上，化成了一滩滩的印迹……

她边干，边想了些什么呢？

她一定想到了李九莲，这位与她素昧平生、不曾谋面、却让自己无比敬重的女性；

她一定想到了调委会。它是个非官方承认的组织，它是个谋不到一分钱私利的组织，却象磁铁一样，吸引了上百名干部、群众为它呕心沥胆地工作，象火把一样，在整整七个月里，烧热了几十万赣州人民的心胸！如果我们内人民，都能似这样被某种真理所激励，被某个理想所召唤，我们的国家该有多么伟大的力量，将能创造出多少令世界震惊的事情……

可是在那时，为什么一个处处号称“人民”：人民政府，人民交通，人民铁道，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人民大道……乃至国名也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却要人民在精神上跪着，一旦站了起来，它竟如此凄惶，如此从上

到下，处心积虑地要扼杀人民的思索，人民的声音呢？

这表明它的强大，还是表明它的虚弱？

这显示着它的年轻，抑或是显示了它的老化？

钟海源更一定想到了朱毅，想到了他的难言之隐。

月亮与星星有难言之隐吗？

太阳对江河有难言之隐吗？

春风与草木有难言之隐吗？

母亲对儿女有难言之隐吗？

在爱的博大疆土上，应该没有隐衷的影子。若说还有的话，那不是爱快要凋零了，就是爱之履尚未征服的最后一冠雪峰，爱之力尚未融透的最后几枝冰棱……

于是，与曾××的比较，便如此富有戏剧性——

她决心要融化最后的几枝冰棱，哪怕为此要耗尽自己的全部心血，

她决心要征服最后一冠雪峰，哪怕在峰顶之上自己一跌再也没有起来，刹那间，一闪的只是映着皑皑白雪的红梅般笑靥……

钟海源不是不知道周国出了犹大，她还是领着几个也在调委会工作过的女性一起上街了……

起初，公安局也并非没有动恻隐之心，几个区区女子，既非头，又非脑，上有老，下有小，一个家全靠她们铁箍般地维系着，抓她们何必呢？事后，公安局一位负责人曾说：

“我们就是想把她们的泥坑里拔出来，不想拔的话，就会叫便衣去。没派便衣去，派了穿警服的去，

是要正告她们：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几个娘们放老实些，赶快回家带孩子去……”

在赣南剧院门口，钟海源撒出了传单。她站在楼廊之上，身上依然是那件苹果绿的春秋衫，脸神凛然而又坚毅，恍如一尊青铜雕塑。只是手一回回地高扬着，传单犹如一群白鸽般地飞上天空，又柳絮般悠悠地落下来，它们告诉一街纷纷抢拾的群众：朱毅逮捕了！调委会取缔了！只是李九莲的精神，还站在传单上，仍将屹立于小城里！

此时，尚不很要紧，只是叫她去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她不给对方一点面子，居然拒绝检查。她自己又上一层“楼”——逮捕，来执行时，她就是不肯将双手伸出来戴上手铐，一直与警察推推搡搡，直到其中一个姓唐的过来，对她说：

“朱毅当过我的老师，我不会与你过不去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看……”

她这才一动未动地戴上了手铐，给了这个朱毅昔日的学生一回面子。

值得注意的是，钟海源等七人被判刑是紧接“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之后。那段时间，在赣州，报纸上，广播里，领导者们的报告里，市讯人员们的斥责中……如同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切都亢奋起来，“你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你们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有什么两样？”……类的舆论甚嚣尘上，钟海源等七人显然被视作了天安

门广场上的那个“小平头”，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不要以为官方将小小赣州的一泓活水，与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片汪洋联系起来，这未免太唐突，太急功好利了。不，客观地说，是钟海源第一个道破了这其中的某种联系。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时间，他被官方的舆论称作“中国的纳吉”。与此同时，穿着藏青的毛式服装、不露锋芒、处事稳重、后来在中央搞“两个凡是”的那个人，已有扶摇直上九霄之势。

在监狱里的表态会上，刑事犯们、政治犯们，以拉锯一般机械、重复的语言，或有气无力，或激昂慷慨地声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之后，钟海源从容地说了这么一句：

“×××不如邓小平！”

这方面的反应总是异常敏捷的。

1978年5月3日、赣州市人民法院以（76）特刑字第14号判决书，5月28日，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76）上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钟海源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她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就因为这一句话，仅仅八个字，钟海源被加了五年刑！

无怪乎那时中国的大人们总是这样叮嘱孩子，

“在外面讲话，你可千万要当心……”

十九

1975年5月20日，李九莲在兴国县看守所开始了绝食。
绝食之前，她写下一份这样的文字——

投 降 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这投降书。

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救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人，我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捧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

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这份《投降书》，实际上是一份绝命书。

它以蝇头般的小字写在一张皱皱巴巴的手纸上，写好后，李九莲将它藏在自己布鞋的面壳里，是在她判刑后，被押到珠海劳改农场，在一次年终对犯人的大搜查中发现的。

李九莲厌倦了失去自由的日子吗？

从二十二岁起，她的青春就被抛弃在社会的一个最阴暗角落里。她的额头就被刻上了这个制度所最不能容忍的红字。然而，她的心灵，犹如一只晨光里扑楞楞的小鸟，从来没有停止飞翔，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

1969年5月1日，是李九莲在监狱生活的第一夜。此夜，望着铁门，铁窗，窗口上不时划过的刺刀的寒锋，还有囚室里通夜不熄的昏黄灯光，灯光下一具紧挨一具、只好弯起虾腰的身子，墙壁上因为拍打养得肥硕的蚊子、跳蚤所擦下的一痕痕血污，隔壁，传来有人翻身时带动的脚镣响声……她彻夜未眠。她觉得要为自己由此开始的地狱之行，写一首诗，此诗便是她在地狱里的天堂——

不要停止歌唱，姑娘，
你的歌声似眼泪似鲜血，
滴进了我的心坎。
你悲愤的低诉，
抚摸着心灵创伤。
你呻吟的颤音，
牵扯我的惆怅……

不要停止啊，姑娘！
你的歌声似同情似黎明，
吸引着我的心声。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无所依傍，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孤寂凄楚……

李九莲忍受不了牢狱里非人的虐待吗？

第一次坐牢，一些看守变着法儿折磨她，污辱她，最后竟也无可奈何地说：“二十四号，二十四号，要怎样才会使你老实些呢？”第二次坐牢，她依然一副铁骨，数次对审讯人员说：

“不要忘记，你们头上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你们一定要为这个政府取信于民，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你们的委托和信任，才对得起人民对你们的委托和信任……”

李九莲为什么要舍命而去呢？

几乎在写《投降书》的同时，她还凭记忆录写了臧克家的一首诗——

宇宙这样宽大，
却容不下一条身子；
天地如此广阔，
思想却无处安放。
只好抱着贞洁去追踪彭咸，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汨罗江……
（生命就是这样，
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
就只有碰死在它的身上！）
汨罗江的水

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
到如今，上官令尹
依然在人间充沛……

括号中的三句诗，原诗中并没有。李九莲加上去的这三句诗及原诗，是她当时内心煎熬和思想斗争的写照。

也许，她觉得了自己的无能与渺小。她讲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就是面对的是墙壁，那墙壁也会有个回音。可她面对的是一个“逻辑”，一个大理石柱般刀劈不进、水泼不上的“逻辑”：你反林彪吗，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你反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可它成绩最大、最大，缺点最小、最小。你追求真理吗，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阶级敌人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三查”运动时，她被这个“逻辑”碰得头破血流，“批林批孔”运动时，她又被这个“逻辑”碰得头破血流。它真是包麻不输，天衣无缝，它真是豪夺强取，处处进逼。无路可走的她，唯有以死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力透强权意志的“逻辑”的最深刻怀疑！

也许，她写出了自己的悲剧。她心中曾有一个矗立着灯塔的美丽小岛，她想沿着一条风涛滚滚的河道，去寻找它的橙黄与葱绿，去呼吸它的宁静与清新……现在，她明白了，在自己启程之前，灯塔已经倒塌了，小岛则沉进了水面之下，现实世界中将不存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能够收容自己的爱情，近一切地方只能践踏

自己的虔诚！它只能存在于梦幻之中，那自己便去梦幻之中寻找她。死比生容易，生命一旦象颗流星划过未知的、但却是新鲜的茫茫夜雾，横亘在面前的不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梦幻世界吗？

李九莲开始绝食了。过了几天，即5月29日，是她被宣判的日子，监所报告法院，她因为绝食人已经昏迷了，法院坚持昏迷了也得宣判。又过了五天，她仍在昏迷状态之下，由兴国看守所押运到设在赣州的江西省第二监狱。

为了动员李九莲复食，监狱派了一个叫张兰、因贪污问题而入狱的女犯，与她同一号子。当然视此为狱方对自己的信任，为了这绿豆芝麻大、却又来之不易的信任，张兰的嘴皮，几乎整日里水浪般波动，可所有的话，都象几掬泉水引进了热风灼人的沙漠，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倒在铺上、形消神黯的李九莲不为之所动，昏迷中的她，仿佛所有的听觉都麻痹了，萎缩了，只有张兰的一句话，不知被她哪根飘忽的游思，一下迅疾地给逮住了，

“绝食不那么容易，人其实是很贱的东西，不会饿几天就饿死的，除非是断水。没听人讲过吗？狗可以七天不吃食，但不能三天不喝水……”

本来每天还喝一点水的李九莲，此后一口水也不沾了，狱方便强灌鸡汤、牛奶，李九莲将牙齿咬得紧紧的，对方就用汤匙往嘴里撬，撬断了再换根钢精的。强灌还是不行，便趁她神态不清时，进行鼻饲，可只要她稍有知觉，便马上将管子拔掉……

在这二十多天中，在一对深深凹陷的眼窝里，她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似乎人世上的一切远不如一个幽暗的世界来得真实。偶尔，也睁开过几次，晶晶闪闪，莹然欲泪，噙动的泪珠却难以掉下来，仿佛她连落下一颗泪珠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她总是喃喃絮絮地说着同一句话：

“你们……让我死……让我死。”

6月中旬，李九莲又在昏迷状态下，被押送到位于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

她已经绝食近一个月了。抬进囚室时，恍如是从埃及哪座金字塔里挖掘出来的一具木乃伊……

珠湖农场的干部，首先将她作为人来对待。场长、政委、教导员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几套抢救她生命的方案。还专门派了一个女犯照顾李九莲的生活起居，派了一个犯人医师给她配制药方，再由场部一位医生检查实施。六年后，朱毅在珠湖农场抄到了这次会议的记录。

然而，李九莲又绝食了四十余天，前后累计起来，她共绝食七十三天，只是在被强行注射葡萄糖液的情况下，她才免于一死。朱毅在狱中也绝食过三十三天，出狱后他曾查问了这方面的资料，自中国有记载以来，还没有发现谁绝食超过了七十三天……

1975年8月1日，李九莲第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同室的一个女犯人经场方的同意，搞来了一只猫，不知怎的，那猫就爱在她床上闹。她将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让给了这活泼、可爱的小生命，扶墙站了一会儿，她又坐了下来，和猫逗着玩。她惨白的脸上，也第一次有

了笑容，尽管这笑容那么无力，又稍纵即逝，犹如一夜风雨过后桃枝上的最后几点残红……

这被当作一件大事，由一个女犯人风风火火地去报告了，一位姓田的女教导员闻讯后赶快来来了，她看到李九莲，目光里是洋溢不住的喜悦，喜悦之中还隐隐含有母亲般的慈爱，不迭声地说：

“好、好，起来就好，不要一天到晚躺着，你起来就好……”

这天，李九莲站起来两次。第二次，她挪着瘫软的步子，移到了窗前，向着窗外看了好久、好久。

已是夏季了，蓝得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姑娘们发梢般摇曳的墨绿柳丝。耳朵里，蝉声如雨，清风中，瓜果飘香。四季没有偏见，太阳没有偏见，阳光对于大墙内的人们，同样挥洒自己的浓烈。男人们光着黝黑的脊梁，女人们光着膀子的黝黑。他们收割播种，他们汗水如注。如同蝼蚁必须适应蚁穴一样，他们得适应这大墙内蒸腾的八月……

没有比在这里，更能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活的严酷了！

望着窗外，李九莲在想着什么呢？

是什么促使她在整整绝食七十三之后，又站了起来，继续坚韧地走完她遍布荆棘的人生之旅呢？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这是一个灵魂在死去活来中蜕变的秘密。这是一个生命在酸水里、在酸水里淘洗的秘密。

后来人唯有在李九莲此后二年多的日子里写下的文

字中，去触摸她的思想轨迹——

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是劳动人民最幸福、最完美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存在的。任何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就没有光明和幸福，因此共产主义是我最热爱的真理，党是我伟大的母亲。党给我以温暖，是我雄浑的精神力量。我一直热忱地向党靠拢，始终坚定地相信，党一定会再认识我，一定会满足我获得母亲般温暖的心愿。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象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二十

1976年10月。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几个月前，刚写完“批邓”诗稿的郭沫若，又以一阙激情浓郁的《满江红》，风靡了神州大地……

几乎在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的发行和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工作进行的同时，仿佛失传多年的《南泥湾》唱起来，《绣金匾》唱起来了，一曲陌生的《交城山》，也在天南海北传唱开了——

“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伟大领袖”变成了“英明领袖”，而且他身板结实，精力充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大的身材穿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扬手向广场上几十万欢呼雀跃的群众致意时，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伟大的新长征，并胜利走向21世纪的抱负与气概。但是扬眉舒怀，吃了螃蟹又喝老酒的中国人，仅仅一个多月以后，那份热烈，便象瘪了气的车胎，代之以焦灼地期待，或者冷漠地旁观……

1976年11月18日，当时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抨击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所作所为：

“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他明确无误地反对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他要求继续办走“五七道路”样板的辽宁朝阳农学院。他指示继续放映以“批邓”为主题的影片《决裂》……其理由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1月30日，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不露锋芒的那位“英明领袖”，正忙于运筹在中国建成十个大庆式的油田，还有几百个重点建设项目，以

图三年大见成效，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颐指气使，一言九鼎……

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依据“文革”中的经验，以两报一刊联合的形式发表社论，这绝对表明了它的精神来自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其关键的一段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

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几乎有如黄果树瀑布一泻而下的长段，说穿了便是三个意思：

一、既然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就应该放心地去他宽广的胸怀里享受长治久安了。

二、既然毛主席号召“批邓”，人民群众翘首以待的邓小平的复出非但没有了可能，而且他也该和“四人帮”一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

三、既然毛主席亲自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

命”事件，人民群众呼唤已久的“天安门事件”，只能是板上钉钉，无反可平。

不能说这是一派胡言。

毛泽东，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伟丈夫也——

“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毛泽东：《伦理学原理》之批语）

他从青年时代登岳麓山栉风沐雨，磨砺筋骨时起，“任一己之心力，主万民之沉浮，”他将祖国大地写进诗里：“茫茫九派流中国，”“百年魔怪舞翩跹”；他将诗铺在了祖国大地：“萧瑟秋风今又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他博大的视野，奇诡的想象，永不疲歇的斗志，坦荡而又不乏韬晦的内心，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性格，使他集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为一体，既造就了他壮丽辉煌的活剧，也造就了他令人扼腕而叹的悲剧……

是的，“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

现在那庞大的身影刚刚消失于风光旖旎的中南海，可即将要移去宏伟的纪念堂，化成一座鲜花四季环绕的永久汉白玉雕塑，怎么能就否定掉他老人家逝世前不久说过的话呢？

又不能不令人心里发怵。

如果说，这个六百五十余字的长段，真成了中国的总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然是沉重得不能解体的集装箱，

“天安门事件”和“批邓”依然是动不得的原装货，那么，1976年10月6月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搞，对于祖国的历史与未来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一阙《满江红》，一曲《交城山》，以及一张千家万户的墙上与毛主席像并排挂着的华主席像？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

“我们必须世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如果说此信里还没有明确批判“两个凡是”的话，在5月24日的一次谈话里，邓小平便以手术刀般的犀利，剖析了它的荒谬——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

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话每句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的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然而，富有如此卓识与勇气讲出这番话的邓小平，尚没能出来工作。他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即使恢复之后，可他“文革”期间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地踩得发白的沙石小道上所孕育出的成熟、坚定的思想，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被党的中央委员会所瞩目和首肯。

犹如两报一刊社论刊出时，冬天欲去未去，春天欲来未来，即使是江南的原野上，那对于春之翼最敏感的

柳丝，也只是刚刚小心翼翼地生出几星鹅黄的芽茸……

中国有了两年的徘徊！

一个巨人，刚刚抬起头，动了动胳膊，世人以为他终于醒了，将要拔地而起，岂料他伸伸懒腰，打了个不长也不短的哈欠，又慵倦地睡了……

这是在抛弃与选择之间的徘徊，因为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

这是在撕裂与再造之间的徘徊，因为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

这是在现代迷信的神殿前继续跪伏与在思想解放的广场上高扬起人的头颅之间的徘徊，因为还在跪伏，也就高扬不了头颅……

在后人眼里，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两年。实践，只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天经地义。充其量这只是中学生黑板上的命题。可是，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就这么个智力水平……

历史的惩罚，导致了现实的徘徊。

人的徘徊，有时还有散步花前月下的情韵。可一个时代的徘徊，有时却不亚于战争，仍要以鲜血与生命作为代价……

二十一

李九莲仍在服刑。

朱毅仍在服刑。

继钟海源等十五人被判刑后，1977年8月、9月，

和1978年初，原调委会成员中又有三十余名被逮捕、被判刑。近五十人的刑期加起来，共达五个世纪。

此外，原调委会成员和直接帮助过工作的人员中，有四十六人被开除工作，或开除留用。有二十三人受到记过、警告、勒令检查等不同形式的行政处分。

数目更为广大的是因同情李九莲问题，支持调委会的干部、群众，他们遍及赣州地、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旁及南昌、九江、吉安、宜春等地区。仅在赣州市，就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党纪处分。

如地区林业局从党委书记、科长到一般干部，就有十人受到组织处分。教育系统中九个中学，就有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受株连……

下面的县、矿也不能幸免。赣县，上犹，甚至偏远的全南，每个县都有一、二十人因李九莲的问题而受株连。

饶有意味的是，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一位负责人，参与了第一次逮捕李九莲，九年后，他自己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逮捕。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后调至赣州齿轮箱厂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当年是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同样在九年后，因对李九莲答辩中的忧党忧国之情所动而流露出同情，他自己也被开除了党籍……

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子的命运，竟这样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自杀，有的致残，有的逼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变卖细软……

可以这样解释——

李九莲代表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中国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当人民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时，政治常常只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而人民一旦明白政治联系着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未来，便会有为它呐喊的热情，献身的勇气。

问题在于，政治不是一眼见底的清潭，不是一目可估年景的庄稼。它是动态的较量，静态的平衡，它时时盘根八处，受掣四方，它常常迷离扑朔，花明柳暗。于是，少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包一张漂亮装潢纸，伪造成多数人的政治，而释放出人们最终被利用、被亵渎了的排山倒海般的热情。所谓“文革”初期，出现的便是这幅图景。而多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因云笼雾罩，鱼龙混杂，被误认为少数人的政治，而使众多的人们在海边茫然失措，未敢扬帆，或是下海了，吃了一口咸涩的海水，便满街凄惶，满街叫唤，恍如这一口吞进了全世界上百年的苦难……

出路唯有一个，让政治透明起来，将政治公开出来，多数人的政治便能拥有多数人的力量，而少数人的政治便丧失了权力的舞台上较量的砝码。

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李九莲是红卫兵头头，朱毅也是红卫兵头头。调委会是打着“反潮流”旗号的帮派组织，搞的是帮派活动。自然，这成百上千的人，不是帮派分子，便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帮派”，有着如此巨大的魔力吗？即使在骄横一

世的权力的支撑下，林彪的帮派有几个人呢？江青的帮派有几个人呢？当年在九大、十大中央政治局里，处境独特，心境微妙，而以后又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蛇影杯弓的衋衋诸公们，又有多少是林彪、江青集团的帮派成员呢？

建国以后，“帮派”，犹如女孩子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飞碟，轻松而又迅捷，抛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上，抛在了“章罗反党联盟”头上，抛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头上，抛在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头上，抛在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头上，抛在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上……结果，抹去岁月的风尘，捅破那层该有几十吨、乃至几百吨的文字垃圾，有哪一个能成立呢？

要说“帮”，大抵是道义之帮；要论“派”，大抵是讲真话派，硬骨头派。

不是“帮派”有魔力，而是抛它抛习惯了，这种习惯有魔力。在中国，自己被人抛掷过，又去抛掷别人的人，抑或是情况颠倒了个的人，还少吗？

李九莲及调委会的命运是悲剧，然而，在前后决定此案的诸多人物之中，有不少曾在“文革”初期受过迫害，乃至摧残，有一些又在后来的政治大浪里接受审查，大抵上都被划过这个“帮”那个“派”的一分子，他们的命运不也涂抹有某种悲剧色彩？

要将任何一个人贴上一张政治标签是如此容易，犹如在流水线上成批地制造个什么零件，而要感受一个人

泼辣辣躁动，五味俱全的灵魂是如此困难，那么生活，肯定是残缺的生活，世界，肯定是冷峻的世界。

李九莲及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成百上千的人，多数是“文革”中的那代青年。

就那代青年人而言，他们是喝过狼奶，可他们是将狼奶当作羊奶而咕噜噜喝下去的。他们是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即使在他们迷狂得犹如魔鬼附身之时，可他们心头也充溢着上帝一轮祥和、宁馨的圣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曾象沐猴而冠的小丑，当过什么“司令”、“团长”、“总指挥”，可将此视作梯子攀附上了青云的，只是区区一小撮，多数即使在最令后人忍笑不住的闹剧里，也自以为有话剧《万水千山》里罗营长的那腔豪情：“让革命在马背上前进”……

当他们在落幕降下之后，这样回顾自己——光荣与耻辱嫁接。神圣与卑鄙的嫁接。庄严与滑稽嫁接。动机与效果的分裂。精神与物质的分裂。起点与终点的分裂……

他们心头的创伤，便和他们当年稚嫩的肩头上浑然不觉地承担的风险一样深重了……

在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里，我们这样描绘过他们：

“于是，1976年10月，无论是处境，还是心境，这都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复杂、最独特的人——

一边为祖国与民族的新生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时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

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他们‘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

多少人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他们却‘茶壶里煮饺子’，象一头负伤的老狼，踉踉地走进大森林里，以舌头舔自己的伤口；

他们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车子在等着他们，他们找不到一条政策可以落实。将近而立之年，或者已经而立之年，为了在生活中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不及喘口气，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何况那代年轻人，生命的根系已经牢牢扎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在以钢铁般的牙齿咽下痛苦，咬碎委屈时，胸襟为之拓展，力量随之爆发。现实已经在描绘——在本世纪80年代、90年代、下世纪初的中国之潮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最壮观，最骁勇的船队……

何况那代年轻人里，更有李九莲、钟海源这样的人，他们以青春和生命，撞开了如磐石般厚重的历史的一道长长口子，以致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今天有了颇为自由的思索和呼吸。尽管他们生前如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般默默无名，也许他们死后生平与思想，也仍象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一样蒙受践踏、遮掩，可他

们的绝响，万古不废的滔滔江河不会埋没，与民族魂同在的巍巍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能忘记！

理解那一代年青人，并不比理解深奥如毛泽东般的伟人更难，也不比理解郭沫若魔方般的变幻困难……

可最保险、又最容易作出的，却是后面一种解释。它还不仅仅存在于时代的那两年徘徊里……

二十二

那种文质彬彬的日本女人的味儿，去了哪里？

如果说昔日钟海源的每一寸肌肤间，流泻的都是似水的柔情，那么现在，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宛如一颗铮铮作响，烧不熔，也摧不化的铜豌豆。

赣州就这么大个城市，审讯的与在押的之间，难免不碰到几个熟人。审讯钟海源的人，每审讯一次出来，几乎都会给也被逮捕了的原调委会主要成员曾传华说一次：

“好厉害，这个女人好厉害，可谓赣州自有女囚以来之第一人！”

她在审讯中究竟何种表现，虽不得其详，但是她在监狱中的表现，却让原调委会成员为主的“政治犯”们无不敬重，还有让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等在内的刑事犯们，在惊咋之余，无不佩服。她在狱中宣传李九莲无罪，宣传原调委会无罪。她和看守人员辩论“×××不如邓小平”……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是数十次地严刑拷打，每打一回都要问：“你还说不说？”“你还辩不辩？”她回答：“我

有口就要说”，“我有理就要辩！”结果，她伤痕遍体地被拖回牢房，几乎未等伤口愈合，她又给几个人高马大的大汉给架出了牢房。辩论中，她常常是喋血呼喊的，血随着那些话一齐从嘴里涌流了出来，或者再没有了力气说些什么，只见一串串的血泡在嘴角鼓起，犹如孩子们用草管儿吹出的一簇肥皂泡。不过，后者在那五彩的泡里寄托的是一片幼稚的幻想；而这紫紫晶晶的红色泡泡，则鼓足了她以生命磨砥出来的不死信念。

客观地说，钟海源在理性上对那个在中央搞“两个凡是”的人并无多少认识，她与李九莲不一样，她不是个思想型的女人。她是凭感性认识他的。李九莲问题的定性，调委会的被取缔及其主要成员的逮捕，都是经过了他兼部长时的公安部点头的……她一旦油然爆发了爱憎，便变为火辣辣地呐喊，奋争，哪怕它将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哪怕它将导致送自己上断头台。

更让狱方觉得她“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是，她在被打断腿骨，又被戴上哗哗重镣的情况下，不知凭着一股什么力量站了起来，竟然又将自己的信念，刻在了号子的墙上。那时，在社会上张贴反动标语，都是惊天动地、十恶不赦之事，她却将“反动标语”刻在了专政机器那钢青色的坚硬甲壳上。是她在表现自己对那庞大躯体的蔑视与嘲弄？抑或是她用一种必将导致自己问题升级的特殊形式，向朱毅表明自己那与不死信念一样不死的爱情？

女人要是坚强起来，远比男人更坚强，男人的坚强

有时还得依傍点什么，而女人的坚强，则犹如浩瀚沙海里一棵卓然独立的仙人掌，无法从外界吸取，滋补点什么，全凭自己的撑持……

钟海源判刑后，被押送到南昌市郊区长头垅西河砖瓦厂服刑。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她。她父母死得早，她的丈夫则象一支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的水银计，几乎她前脚被抓走，他后脚就去了法院递上离婚状纸。那离婚的态度是如此坚决，二岁的女儿也未曾让母亲见上一面，而且连一张手纸、一把梳子也不送……

人处于黑暗的绝境，若有一点点爱，即使不是爱，就是几分理解与同情也行，化为前方豆大的亮处，他也许就能追着这一线弱光，拼了命去跋涉……

李九莲也未能获得这一线弱光。从1975年6月由兴国押去了珠湖农场，直到1977年11月又押回赣州待执行枪决，在这两年半间，她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她不挪去一个字的目的，显然是不想牵累家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哥哥、妹妹，似乎也就坦然地接受了她的这一想法，在这两年半间，竟没有去农场探视过她一回……

是压力太大吗？朱毅以后也被送去珠湖农场劳改，才进去十三天，他的嫂子，南昌一个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就风尘一路赶来看了，不让探视，因为不是探视的日子，她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她不觉得这有辱于知识分子的斯文。

即使是压力太大，家里四、五个人，每个人每月轮流给蒙难的亲人写一封信，也可以。若信里告诉了她，在赣州，有那么多人一批批地为她的问题而坐牢，这既是对她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同时也意味着她有了某种责任。在监狱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谨慎、稳妥，她的命运将连系着大家的命运！

可始终没有一封这样的信，始终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在与世隔绝的孤独里，孤独可以成为一块打磨思想光辉的砥石。

李九莲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她用自己的语言写在一份份交代里的思想，在不少基本问题上，在六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较为科学、充分地表述——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遇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

混淆了敌我。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

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李九莲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她1976年5月写下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一文。在此文中，她批评了关于对毛泽东同志感情不能有丝毫变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怀疑并加以发展的论点，提出了要在社会实践中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比较起来，两年以后一场如滔滔热雨几乎席卷了中国全部舆论机器的大讨论，不过是在不小的程度上，证实了一个小女子写于铁窗昏灯下的睿智……

在与世隔绝的孤独里，孤独也会成为一排咬噬思想方圆的碎齿。

李九莲思想的片面性，犹如她思想的深刻性一般昭然如镜。

如果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片面、乃至谬误的话，那么随着自由被长期剥夺，年深月久地处于一个昏冥、畸形的世界，李九莲思想视野的局部昏冥，思想方法的某种畸形，乃至从已经到达的高度上暂时退了下来，也就并不奇怪了。

再说，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那个时代里，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或浓或淡地溶化于每个人的血液里。从现在倒退十二年，无论是哲人，还是草民，有谁会想到，大陆，

台湾竟能光可鉴人地镶嵌于“一国两制”里，数十万台湾同胞过江之鲫般来往于海峡两岸；而赫鲁晓夫，不是野心家，更不是阴谋家，而是在苏联沉闷、灰色的天空下，第一个果敢地将改革之锋拔出剑鞘，尔后又终于无奈地退了回去的悲剧性人物呢？

1976年12月，李九莲写了并最终铸成杀身之祸的《我的政治态度》一文。

此文是这样被发现的——

1977年元月31日晚，李九莲所在的犯人第七组进行年终评审。管教干部张某指名要李九莲谈过去一年的思想改造情况。李九莲不愿谈，同组的女犯们轮番批判她“对抗政府”之后，她仍保持缄默。张某顿时口气严厉起来，严厉之中还有几分嘲讽，

“你不谈，这完全出于你的反动本性。象你这样的反动货色，真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可你还想把自己的灵魂装扮得象美女一样……”

李九莲听罢，身子恍如筛糠，脸倏然纸白。她一下站了起来，去床头纸箱里翻出这篇稿子，回来后当众就念，一气之下，如泻如注。当念完第一个问题时，众人才反应过来，管教干部龚某当即斥责：“你这是反动思想！”话音刚落，犯人董素华，犹如猴子般敏捷，一把将李九莲手中的稿子给夺了过来，似乎是怕她毁灭了“罪证”……

在《我的政治态度》一文里，李九莲对“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逝世，表示了无限的悲痛，同时，她对攥

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表示了不满。认为的他诸多做法，业已开始背离“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和他老人家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她不无惆怅：“毛主席百年之后，将没有谁支持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她不无忧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借口反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原料市场”，她又一次地贬斥了赫鲁晓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作者注：应为30年代），偌大一个运动，不可能不杀错几个，赫鲁晓夫就利用这一点，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

一方面力图打破程式化的一元迷信，

一方面又重蹈了程式化的一元迷信，

一方面以实践的高压水龙头冲洗着被教条涂抹得不堪重负的现实，

一方面又持教条的高倍放大镜，忐忑不安地探视即将发生大陆板块挤压与裂变的现实，

一方面对黑暗之中一双主宰着祖国命运的手保持着银针般的警醒，

一方面又对最终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势力将自己逼向死亡表现了糊涂，

一方面有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恨不能去抵挡那有如救护车一样呜呜响个不停、令人心惊肉跳的运动，

一方面又义不容辞地充当斯大林亡灵的辩护人，

“偌大一个运动，不可能不杀错几个”，

一方面为了驱逐注定要在中国消逝而去的东西九死不悔，

一方面又以血肉不觉祭奠了注定要在中国消逝而去的东西……

也许，张志新的思想里没有这样的矛盾。

也许，遇罗克的思想里没有这样的矛盾。

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的脑袋里有相似或类似这样的矛盾，不过在若放弃思想莫如放弃生命的李九莲身上，表现得更为复杂，也更为突出……

由此，就决定了李九莲的悲剧。

不，准确地说，这是在容不下思想的年代里一出思想的悲剧，这是在力图走出现代迷信峡谷而又最终未能超越现代迷信峡谷的思想的悲剧。

二十三

五年之后，“作为同探索共命运中深深理解李九莲个性”的朱毅，虽然无法看到锁于案卷之中的《我的政治态度》，不想也不能对这篇文字加以评论，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指出正确认识李九莲政治态度的至关重要的三个事实——

第一，李九莲用她的“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表明她决不是政治懦夫，也不是那种“今天谈虎色变，明天奉为时髦”的政治庸人。因此，必须依据她那1969年开始了的十年来为之历尽艰危、并至死都不以为

罪的思想进程，来全面分析和正确理解她最后的表态。一个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战士，一个在全民族精神最危机的时刻，在政治和思想路线上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严肃态度和科学理解的革命者，一个在十年前就进入重重禁区探索真理并用思想的火花显示了自己成熟的人，可能在一夜之间堕落吗……如果把她偶尔的政治谬断视为本质，反过来把她十年一、含辛茹苦、步步艰难所探索的真理的流露视为虚妄，这岂不是以假乱真吗……

第二，李九莲经过三年的观察和深沉的思索，识别了林彪之诈和刘少奇之冤后就与世隔绝了，先是为真理坐了三年零二个月的牢，后来是为了坚持真理被判了十五年刑。从第一次获释到第二次被捕前，这一年多又是在地处偏僻的矿区，并处于严密的管制和控制之下，在这种远离实际斗争和政治风云的环境中，再加上倍受摧残和蒙受耻辱的心情，能够要求她完全解开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之谜而“洞察一切”吗？李九莲历来不承认有圣人，超人！是的，按其革命本质、斗争方向和思辨能力而言，她至少能够在伟大的“四五”运动前后，完成对“四人帮”的本质的认识的思想飞跃而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而如果说她始终不能象当年识别林彪之诈和刘少奇之冤那样也识别出“四人帮”之奸，甚至有过与此相反的错误判断，那与其说是她的罪过，毋宁说是那些剥夺了她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给她一点时间、有限的自由也要七折八扣的人们的罪过……至今按住李九莲

1969年反林彪、为刘少奇鸣不平一案的人自然会抓住这张王牌不放，其实这正如同拽住翅膀怪苍鹰：“你为什么不能飞得更高一些呵”！一个农奴主在挖去人的眼睛后，还反过来责怪这个被强权挖去双眼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清清楚楚什么是大路，什么是沼泽？”……

第三，李九莲表态的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仅仅两个来月之后，新生活还刚刚萌发，还不清晰，对于一个深陷狱中，与生活和社会远远隔开的人来说，是阳光，还是月光，不太了然。而那个时候的现实正是这样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伟大壮举还没有开始，魔鬼还在接过新的口号干着罪恶的勾当，他们改头换面，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政治舞台，陈腐依然抗拒并踞有一隅之地。“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提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四人帮的极右实质”的提法，“四人帮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提法，以及迷信崇拜的种种表现，等等，这一切充满了报刊、杂志、电台、文艺作品，平反冤假错案还没有半点蛛丝马迹，镇压人民的元凶还喜气洋洋混在革命干部的队伍中满面春风地庆祝胜利，报刊上还经常看到这些丑类的尊容……在这个大局虽定，但还龙蛇不分的特定时间里，李九莲这个全省闻名、拒不认罪的重要政治犯，会受到比平时苛严冷酷多少倍的待遇，坐过监狱的人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这一切给她造成的错觉，无疑是她产生某些误解谬想的客观根源。而就主观而言，仅仅她的死罪

状上拒“不认罪服法”这六个字，就足以说明这一切，她的革命本质没有变，她探索真理的坚定步履没有变，她十二年前开始的思想进程的方向没有变。’如果她能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看到她本人步入社会以来，为之呕心沥血的一切都绽开了胜利的春花，她是会回过头来认识到“十月”的伟大意义而衷心地为之欢呼的……

世上并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这一点完全符合李九莲生前的思想。李九莲也不是“先知先觉”，她完成对林彪的认识、识别，是有过程的，也花了前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她为刘少奇鸣不平，也并不是思想上一开始就固有的。可以理解，1966年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包括李九莲在内的任何群众都不会对林彪产生怀疑，当红卫兵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谁也不会考虑到刘少奇的冤枉……这说明一个人尽管善于观察和思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为什么要苛求失去自由远离社会的李九莲，在粉碎“四人帮”后两个月的短时间里，就非得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不可呢？认识错了，完全可以重新认识，根据李九莲的政治品德，她完全可以做到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包括超群的领袖人物，谁没有犯过一点错误？《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光辉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充，其中包括重大的修改。何况一个身陷牢狱、受尽迫害和折磨的女青年！

本来，承认林彪、“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就应该同时承认李九莲反林彪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反“四人帮”。
其次，承认迫害刘少奇是林彪也是“四人帮”，就应该同时承认李九莲同情刘少奇就意味着反对“四人帮”。
实际上，继林彪一伙之后，继续迫害李九莲而第二次把她投入铁窗的，难道不正是“四人帮”一伙吗？以“恶攻”为“恶攻”，以被“四人帮”迫害者为“四人帮”迫害者而枪杀之，天理何在？！国法何存？！

第四章 松林喋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北岛《回答》

二十四

1977年12月，波阳县人民法院、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九莲在劳动改造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报经党委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

从珠湖农场被送上路时，她尚蒙在鼓里。管教干部通知她，“你不是要搞清楚问题吗？明天就放你回赣州去搞清楚问题。”她的“主罪”是反林彪，而且“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不但周围的犯人们都以为她此番回去将会是平反，就是心僵冷如冰的她，顿时也有了几分憧憬，不管怎说，让回赣州总是自己问题松动了的迹象。她兴冲冲地拾掇起床头的一个破箱子：一顶半新旧的

军帽，这是她在当红卫兵时戴的，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红卫兵检阅时戴过。1967年“六·二九”赣州武斗守卫西门时，她也戴过……不会有再戴的时候了，也许是以此纪念这段永远不该忘记的人生旅程，她将军帽留下了。留下：还有一包以旧报纸包着的烟丝，它还是从画眉坳的矿带出来的，在矿上的那段时间里，心情郁闷不过，与形影相吊时，便常常抽上几口烟。迄今，那烟丝早变质了，她却没有丢弃，也许同样是为着纪念什么，也留下了。此外，几乎所有的东西，李九莲都送给了同室的女犯……

临上车时，一位大队长拎着副手铐对她说：“虽说现在是送你回去，可按规矩，在问题未解决之前，你还是犯人，还得给你上铐。”她痛痛快快地伸出手来，老老实实地头一回予以配合，宛如锃亮地摆在眼前的是两个硕大有力的句号……

在赣县看守所对李九莲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原来，此行并不意味着句号，而只意味着不远千里地要借她的脑袋来故土一用的现实，一下，让她耳鸣眼黑，天旋地转！尽管她以前曾有过绝食而去的念头，可在已经打定顽强地活下来之后，而且在井壁般厚重的现实似乎有了某种松动之时，又要将她捉去死神那巨大的、青铜色的利爪下，无异于将一个刚刚爬上井口的人，又一脚踢进那深不可测、寒气侵骨的井里……

凉意，冰水般的凉意，夹杂着几乎可以目睹到的一点点割肉般的痛感，一下从脚底涌上全身。这力量是如

此迅猛，冲击得她一个趔趄，她禁不住紧紧抓住桌端，这力量也冲出了她胸口里一声声势能碎石裂帛的愤喊：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就是我有错误，也是认识错误，若犯一次认识错误就要杀头的话，那一个人生下来得长几十个脑袋？！”

法院来人无动于衷。只按照惯例，不带任何表情地问她：

“李九莲，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她象是从那片浑沌的天边黑暗里，把握住了自己的中枢神经。她松开手，站定在那里，怔怔的目光，断断续续、轻若燕喃的声音，不象在回答他们，倒象是在自言自语：

“这么些年了，我写了那么多……呼喊了那么久，若是对着一堵墙壁，这墙……都有了回音，向你们呼喊……顶什么用……算了，算了，只有……等历史给我下结论了……”

李九莲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

当晚，四个女犯陪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她们是准备鼓足毕生的勇气，去残酷地目睹一场山崩海啸的。然而，她的神情却显得有些百无聊赖。仿佛无论是在心力上，还是体力上，她都实在是太疲惫了，疲惫得只求能赶快倒下去，而不管是倒在床上，还是倒在火里……

当铁窗渐渐显出了蛋青色，她那一对黑莓子般的大眼睛糊上了一层晶晶闪闪的流质，神情安静得象夜雾覆盖的果园里的一棵苹果树，羊厩里一只喝足了母乳的羊

关。她哼起了一只曲子，那曲子也象是流经钟灵毓秀的大山里的一条小溪，恬静而又温柔。四名女犯，你看着我，我看着她，原本象弹弓一样拉得直直、随时准备打出去的神经，在这“小溪”银色的轻漾下，都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四双眼睛里的迷茫——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次日，12月14日，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除李九莲外，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原调委会负责人曾传华等十人，他们分别被判十至二十年重刑。

身著黑色囚衣的李九莲，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上哗哗铁镣，背插古老长签：“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之上，一道朱色斜勾，以示问斩。针药麻醉外，还将小竹筒塞入她口中，以防她呼喊出什么……

上午8时许开的大会。9时半左右，李九莲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下。临刑，她昂首不跪，行刑者射弹击腿，她一边不支跪下，一边慢慢回过头来，象是盯了行刑者一眼，又象是环视了一圈半山坡上葱葱郁郁的小松林。未等她再转过头，枪声又响了，她整个身子跌扑倒地……

三年多过去，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新华社的一幢楼里，朱毅见到了行刑后李九莲被有关部门验明的确是死

了的一张照片：她倒卧在两棵劲松之间，偏过来的脸上，眉头皱结，双眼微瞪，鼻子在流血，半张开的嘴里也在流血。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既象是至死都在思考着什么，又象是死后还在要求正义，还象有几分吃惊，仿佛这是在哪里不小心摔了重重一跤……

似乎这真是到了一致，她会爬起来，自己走回去。人们聚拢而来，又扬长而去，没有谁管她。她蜷卧在两棵劲松之间，任初冬的阳光懒懒洋洋地从头部的一侧踱去另一侧，任荒郊上的蚂蚁们奔走相告，继而成群结队，在她脸部、肩部附近那越凝颜色越深血泊里，开起了盛大的宴会。她无语，通天岩也无语，只有风儿一回回摇拂起她的发梢，象是在发出一串串轻微、悲怆的叹息……

当黑夜降临时，偌大的一个世界里，只有一个人想起了她。此人叫何康贤，是赣南一个工厂的退休工，未过几天，他也被投进监狱。既然听说他案由也是因李九莲而起，曾传华等人心目里便一下引他为战友，并急于找个机会接识。后来再一打听，他应该作“它”，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禽兽，在厂里就有蒐集女人们短裤、乳罩的畸习，对李九莲，他竟趁无人收尸之机，割去了乳房和阴部拿回他阴暗的小屋，浸泡在盐水中……曾传华等人肺部气炸了，如果说久处专制暴虐的日子，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支撑起李九莲被专制蹂躏致死的话，他们现在却支撑不起她死过第一遍后又被这个禽兽再度蹂躏致死，这是闻所未闻的第二遍，这是惨绝人寰的第二遍。若非囚徒之身，何康贤撞在了朱毅、曾传华等调委会成

员手中，定将化作肉酱！好在法律仍是自由的，客观的，它既注意到了李九莲所言的“政治影响”，也注意到了何康贤所为的“政治影响”，他很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二十五

1978年4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钟海源在劳动改造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判处钟海源死刑。

4月30日，死刑在新建县执行。

关于钟海源枪决前后的情况，我在三年前就有了较详细的了解。这情况并非由于我采访而来，而是一位武警干部H主动向我提供的，当年他参加了对钟海源的行刑，在看到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后，他发现了有关“黎莲”一节的不实。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他当我面指出了这一张冠李戴的失误，于是几天后，我们有了一上午的长谈——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从学生时代起，我便酷爱文学，入伍后也曾写过、发过几篇小说。一有外出参加创作学习班的机会，遇有那些知心又能写的作者，我都很主动地把这件旧事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写出来。也许是那身军装在起作用

用，虽不乏跃跃欲试者，但末了总是风消云散……

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武警系统创作座谈会，来了几位地方上的老作家，听说我来自守监部队，两只脚，一只踩在光明中，一只踩在黑暗里，个人又有一段很独特的经历，指名叫我去他们房间里谈谈。我又详细谈了这事，愈谈，他们的眼神愈是专注，似乎随岁月风尘的渐渐剥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具洪荒时代的恐龙化石，同时也愈显严厉，我几乎能感觉到，有一锋冷冽的刀片，在嗖嗖地划过灵魂……

我不回避他们的目光。在心里说：审视吧，解剖吧，就是翻皮溅血地将我这个人犁上一遍，我也必须顶住！

说毕，众人沉默了好一会，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晦暗。一位老作家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觉得该说点什么，于是一位接一位地叹气，表示了一种模糊语言。终于，一位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支，随海草般轻轻漾开的蓝色烟雾，他吐出了一句指向明确的话来：

“这事，真得写写。你来写吧，你年轻，感觉事物敏锐，又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我缺乏钙，他们也缺乏钙……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

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找你！”

顾不得穿衣服，被子一掀，军大衣一裹，我跑去了排长房里，拿起话筒一听，是F副营长那粗大的嗓门，

“你是二班长吗？”

“是。”

“今天下午操课时间，你来营部接受任务！”

我疑惑了。按惯例，过去有个什么任务，都是由连队下达的，怎么这次由营里直接下到我这个刚上任的小班长头上呢？仗着自己是全营数得着的几个技术尖子之一，在干部、战士里有些小名气，我不禁问了句：

“副营长，是个什么任务，能不能给先透个信？”

对方似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了：

“枪毙一个犯人。”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F副营长在自己房里，房间里还坐着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G。我和小G1977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五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他来自福建一个县农村，一身的农民味儿，朴实，本份，平时话不多，似乎话也得象钱一样积攒起来。除了买牙膏、肥皂，啥也不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干活却舍得力气，南方的酷暑苦夏，大伙儿都在房里睡午觉，他却挑担粪桶，来回出入营房，裤腿高卷，脚步登登，班里的一大块菜地，他一个人料理了多半……

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这一分手，便连彼此的影儿都见不

着了，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半月不见，小G起来，我也扑过去，谁都想亲热亲热。

F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一手搂一个，命令道：

“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医院住了一个××场站的飞行员，他父亲是××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F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与小G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哩！××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你们得保密！”

小G问：“什么时候执行？”

“明天。”

F副营长又转向我：

“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宿在连部吧，晚上还有个会。”

我问了一句：“谁开枪？”

“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J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F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J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案情——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

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的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个典型的帮派头头。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的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呜呜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三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在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趁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先冲了第二监狱，李九莲早被我们秘密转移了。凶相毕露，一回头又冲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档案……势态一闹大，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里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银当入狱。竟又有一班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算是宽大的，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的上台是一次成功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J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

“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J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蓝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似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匆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叫政治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

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屁？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匪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未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十有八九，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

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G，随F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

“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便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一昂头又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的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儿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辫，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那安详的神情，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

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坨毛，心里堵得很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抗议。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空无故？！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床咬得“咯登”一声，五指也握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猪生白肉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G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一对眼睛。

我问：“你是××医院的？”

“嘿”，他点了点头。

“有没有什么事？”

“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F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

“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

“我！”

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又痒痒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G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G，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G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

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飞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上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更象是在表演车技，一会儿快蹬，一会儿慢蹬，一会儿急刹，在人流里自如娴熟地穿行，总是保持在囚车周围……

一个模样粗黑、一脸横肉的年轻人，轻佻地喊道：“喂，保兄，你们放了这女的，让她给兄弟做老婆吧！我保证她跟着兄弟过日子，再不敢干反革命了……”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给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一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G，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

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了，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G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的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便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

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尔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茵茵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了一个蕴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楞楞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一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踉跄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我明白了，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 F 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F 副营长对身边的 J 科长说：

“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J 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 G 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蓬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

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G，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屁用，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个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G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身贴了一下，先跨了一步，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伸进去，以掌按压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下副营长使了个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海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那阵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下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一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澄澄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素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

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G和F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F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G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F副营长发现了，对小G喝道：

“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

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糊糊地讲了一句：

“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J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去老军医的脸上，

“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蓬飞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來，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我的胃里当即惊悸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蒸气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F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总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么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

机。F 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 G 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碰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手术，又给了 F 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 G 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了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串长叹：

“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F 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青岛啤酒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

“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F副营长又多了一连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G，则更是飞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F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网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G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G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会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荆棘，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一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J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料里，不如说就在她的脑袋里。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

进 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渐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军区的《××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 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

“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我老家在山东省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那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家里世代贫农，到了父亲这辈，得靠乞讨才能勉强活下去，就在他投身部队的前两天，他还在讨饭……

另一方面，也和我母亲的遭遇有关。她是1950年的

兵，家里土改时评为贫农，“三反”、“五反”时改为中农。1957年又定为地主。“三级跳”跳下来，当时是运动员的她，血气方刚，怒气填膺。家里都是姐妹，一个弟弟是先天性哑吧，因为少劳力，我外祖父在村里开的一个小小柴店，不过雇了几个帮工，怎么就成了地主？她向部队、也向地方各级政府，四处申诉，结果被部队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了部队。为此，我父亲在部队的经历，也就坎坎坷坷……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她的问题是1979年平反的，我相信，若现在扯起当年那个将外祖父扣上“地主”帽子的村头头，或者那位决定将她清除出部队的领导，她依然会耿耿于怀，毕竟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给扭曲了！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痛，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

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锋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杯残簪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G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F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

“这女的，跟你……是熟人？”

“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枪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

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我也想自己。我从不后悔以军人为职业，我只后悔自己在政治上蒙昧不清的年代里当了武警，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昌警备区当干部，以后我们交往深了时，我告诉了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听后，他震惊地说道：

“没想到看起来你斯斯文文，一表人才，却还是个刽子手。如果有一天，我象钟海源一样，也落在你手里，你会怎么办？”

我说：

“那刽子手也要去劫法场。”

当然，这是笑话，一句异常痛苦的笑话。只要是战士，就是再残酷的命令，我也得压进枪膛。内心的痛苦与人格的分裂，就这样产生了一——当我们受现实法庭驱使的同时，又受良心法庭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比我们武警战士更渴望政治上清明，法制上健全了！

F副营长几年前转业回了湖南老家。小G也早就复员了。那时我已经调到机关，在小G走的前夕，我去了他所在的五班，住了一夜。我们回顾了很多事，还是独独没有提及我们当兵生涯里那一回最重要的经历。可我感到，它象一堵无形的墙，总横亘在我与小G之间，想拆走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

我们成了彼此的历史痕迹。

那夜，小G提着军用水壶，上街卖了二斤封缸酒

来，又切了一个西瓜权充下酒菜。我们两人一旦沉默下来，便咕嘟、咕嘟喝酒，将二斤酒全喝光了……

二十六

你要了解的这事，我按你的意思，问了几个人。说我有亲戚，一只肾不好，外地的一家医院建议他做肾移植手术，他有些害怕，听说我们医院过去做过，他想看看这方面资料，不知我们医院是否保存有当年的手术记录，或者一位大夫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也许是时间过了十一年，人员流动也很大，也许是这事在我们医院里太敏感了，几个人都回答不清楚。被拿去肾的这个女人后来平反了，医院里也传过，大家也蛮同情的。可只不过是熟人私下里感叹几句，没有谁会去将当年的情况正儿八经搞清楚。一来没这个必要，作为医院要作移植手术，肾的来源只能是死刑犯，或出了意外事故如交通失事、烧伤致死的人。二来，总会涉及到具体的人。何必搞得一个部队医院大熬风景，当事者又心头阴影久久不散呢？

我把自己记得的一点情况告诉你吧，那个人叫史××。是空军部队的，到底是干部，还是战士，我就不清楚了。他二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身体看起来很棒，人也长得挺帅，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不是北京人，就是河北人，听说是干部家庭出身。因为肾不好，他住院很久了，前后快两年。他待人热情，讲话谦和，无论是与其他病员，还是与医生、护士，关系都不错。他会

修理无线电，那时常常有人拿着坏了的收音机来请他修。在医院图书室，我多次见他帮助管理员搬书、借书、整理卡片，总是手不停。有时，他还领着哪个职工的孩子出去玩，两人手牵手的，见花说花，见鸟品鸟，挺有童心的一个人。另外，他和一个护士的关系不当，晨曦暮蔼里，有时两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在草坪上打羽毛球……有人分析，十有八成，他们是恋爱了。

那回手术，当时医院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因为肾移植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个新的课题。去拿肾的是病理科的大夫，医院里去了两辆车子，配合很密切。那边刚拿下来，就马不停蹄地往回送，一到便装了上去，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耽搁。手术是成功的，当时医院内比较轰动，我也记得军区的《××报》就此发过一条消息。手术后，一下配了特级护理，情况也一直较好，史××快活到一年了，早就打破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纪录，他自己也对康复起来、重回部队有信心。可就在这时，情况一下恶化了，不知是因为肾移植手术难度太大，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病人自身造血功能不好，得经常输血，是不是在输血时带进了什么所引起的……他垂危时，据在场的人告诉我，他紧紧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脸上糊满了泪水，护士的眼里也是泪光晶晶……

听陈老师说，你写李九莲、钟海源的稿子，我劝你不要写。写她们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问题那么多，哪里不麻烦成堆，牢骚满腹，活人都顾不过来，还去管死人？再说，你鼓吹她们什么呢？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可

她们太划不来了，两人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你说给了一千多元钱的撫恤金，可这钱也是给别人用的。不比张志新、遇罗克，他们的名声闹得很大，几乎全国人民没有不知道的。这名声至少还庇荫了后人，张志新的女儿不就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遇罗锦前几年的脸上不也贴了金？可她们死了十一、二年了，现在还默默无闻，也许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何苦呢？

我看，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少想点，少管点国家大事为好。毛主席有一句话是对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医院一位干部L与作者的谈话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领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忽然都挤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了十字路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

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房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拿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抛开了，焦皮里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是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

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说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痼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痼病’这两个字，变了一

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这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

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地，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摘自鲁迅先生短篇小说《药》

二十七

本节将会是冗长的，且又似乎是枝旁叶蔓，但这决不是多余的一节。

《药》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的孩子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这篇小说，一届届的老师们都大同小异地分析它的题目：要疗救中国，必须唤醒民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饱经了磨难，历尽了忧患。若是一块石头，在重重磨难里也会睁开眼睛；若是一锭钢铁，在层层忧患中也要发出呻吟。中国人应该被唤醒了，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应该早就遁入了历史的陈述。

可当李九莲、钟海源被囚、被杀之时，作为她们的同代人的我，在干什么呢？

1975年，我发表了这样的诗句——

学文的，相信什么“灵感”，
在“世界名著”中进行文学“修养”；
学工的，以“萤窗书万卷”自勉，
关门搞设计，黑板上开机床；
学农的，远离中国远离地球啊，
大谈西伯利亚的马和月球土壤……
高墙之内多么荒谬啊，
然而多少年多少人习以为常……

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日子里，
风光绮丽的校园啊，风雷激荡！
我们懂得了：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
大学，
培养的精神贵族却高踞人民之上，
我们明白了：校园里还有孔丘、
凯洛夫的幽灵，
他们说着古代的语言穿着现代的
服装；
我们清楚了：校园的空气还有
火药味啊，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反
复的较量！

从此，北疆有“朝农”火焰般的高粱，
南国有“共大”金海般的稻浪，
攀登珠峰的征途有“北大”的汗水，
远涉重洋的巨轮有“复旦”的
合金钢；
批林批孔的战场有“清华”的檄文，
百花盛开的文坛有《七·二一》
大学的诗章……
天有多大校园有多大啊

这“诗”题为《校园抒情》。仅看这题目，读者就会以为我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大学生，其实当时我人在远离省城八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里，只是一家农机厂里神情困顿、衣衫褴褛的小工人。

在我的周围，可以说，没有比我更向往上大学的人了。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这年5月在报升学志愿时，我报了文科，第一志愿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根据前几年高等院校录取新生的杠杠，我报武汉大学已经有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我的父亲，前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的六十岁还扭动一双小脚、挑担粪桶下地的祖母，约有几亩菜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此时，虽然都摘了帽，但帽子摘了，并不等于那帽子就烧了；而且一代有问题填在政审表格上，那视觉效果已经有些扎眼，两代的问题这么摆在一起，若神经不够坚强，真够动魄惊心！

让我决心一闯此志愿，并最终得到班主任老师首肯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从小酷爱文学。小学五年级时，居然涂鸦了一个“电影剧本”，在中学，我的作文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坐在台下听老师洋洋洒洒地向全班同学讲评自己的作文，那心里蜜甜的滋味，对于从小向往出人头地、而命运多舛又难出人头地的我来说，远甚于今天在《文艺报》上，看到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我自信自己是块搞

文学的料子，而且凭着人学的文学，应该少些文学圈外蝗虫一般飞着的势利眼，会接纳我这个无落户子弟的……

于是我在当年的三月份，即报考志愿前的两个月，加入了共青团。那时金光闪闪的团徽来之太不易了，此时我的入团介绍人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位列全校的51名同学里，39个同学是共青团员。为了获此证，我狂热高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心得笔记，这些笔记，若是毛主席看了，他老人家也会感动……我每天总是提前到把课桌上的教桌一擦灰，在讲台，擦黑板，心里装着雷锋这号做好人，不留名真英雄，教室里却期待能听到有向教室走来的脚步声。为了获此证，我希望当支部书记，或是哪个团支部分委员，能每星期听我汇报一次思想，若他们颐指气使时，我却极其谦恭，可心里总冒起一个倔傲的声音：你们有什么呢，不过是有个好爸爸！我极少回家，有时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为的是领取生活费，我尽量少跟父亲说话，我怕他流露出什么会经不住阶级斗争观点的分析，我更怕他若真流露出了什么，我是儿子，更是决心跟党走青年，将陷于批判还是保持沉默的两难境地……姗姗来迟，总算是来了，我将团徽一天十八小时地别在胸前，我琢磨着，它的闪闪金光，能多少遮掩住一些我额头的那个“红字”。

上大学，登临苍郁的珞珈山，犹如节日的晴空里气球般缤纷五彩的梦，被“文化大革命”击射得粉碎，可球破了，那落在心里的一星星碎皮还在。当七年过去，大学又开始招生时，一星星碎皮便在那里蠢蠢欲动，但

梦终究升不起来了；过去是考试，政治上低人家一等，却还能在分数上争一争；现在是推荐，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那响当当的称号犹如泡在老酒里的虎骨，浸透了政治意味。我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学也要关我在校门外喝西北风！

我应该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的旧高校，鄙薄北疆冒出了个张铁生的“朝农”，本省几年后终于偃旗息鼓、沉下西山的“共大”。我至少也应该象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便嚷葡萄酸。我却用《校园抒情》改写了伊索寓言，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还说葡萄甜……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地改造？

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

1976年5月，即李九莲因为坚持反林彪无罪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入狱后两年，我参加了在婺源县珍珠山垦殖场举行的江西省诗歌创作学习班。为响应从中央到省里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号召，学习班集体创作了长诗《炮声颂》。我是该诗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啊，“炮打司令部”烽火里
落地的儿童，
今天挂上了
鲜红的领巾，
串连途中，

在韶山采下的松枝，
扎根在天南地北，
今日是何等峥嵘……
十年了，
文化大革命的
第十个春天
春水——
在我们心中荡漾，
炮声——
在我们胸中滚动……
当我们在红色日历上，
看到金色的“五·一六”
当我们战斗的笔，
就要写完《炮声颂》，
诗行在跳跃啊，
热血在沸腾！
我们情不自禁
要奔上珠峰，
让豪情
在这万仞之上，
随热风
在大地上奔涌！

遥望吧——
祖国钢铁打，

群山云蒸霞蔚，
大江滔滔向东……
敌人破灭了
一次次幻梦，
革命树立了
一个个丰功，
“造反有理”的大旗，
裹着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宇宙中显得一片通红！

我们的阵营
如搭箭的怒弓，
我们的气魄
似扶摇的鲲鹏！
把珠峰作炮台，
让炮口云天惊，
“八亿人口，
不斗行吗？”
我们准备数个
千年，万年，
我们还要掀起
一次次红色暴风！
炮声隆隆传万代啊，
千秋万代炮声隆……

在技艺上，似乎比上一年有了长进。若要说这便是诗的话，又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大相逖庭。毛主席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诗风，曾深深地折服了我，这是一位伟人叛逆性格和巨人意识的自然、鲜明的流露。而此诗里的“我们”，不过是巨人的模仿者，靠的是垫肩、衬胸，还有高跟的鞋子。诗行里几乎处处透射出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唯有靠着当年那种流行政治理论的支撑……

在“一次次红色暴风”里，我是一位百万富翁，还是沦落于街头的一名瑟缩乞丐呢？

我和弟妹们童年失去母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在同一所高校工作的母亲即被下放山区垦殖场。1960年，父亲也被下放至一块湖洲上养鸭，放牛。一家人分为三处，在南昌的只有正上初中一年级的我一人。那时，最大的欲望在饭桌上，最好的梦也在饭桌上，每到上午第四节课，还有下了晚自习时，我头昏眼花，肚子里打起了两伊战争。我与几个住校的同学一起，去火车站货运仓库外，拾过被踩进烂泥里的碎糠饼，到学校附近的农民菜地里偷过卷心菜。一大棵卷心菜在又洗脸、又洗脚的盆子里一煮，没有油，只有一点盐，此种吃法，大概今天的猪都会不屑一顾。就为这，第二年端午节前，母亲搞了一点鱼、猪肉和黄豆，冒高温在两天内匆匆转了三处，待回到自己所在的水产养殖场，进房间只喝了一口冷开水，便倒下了，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来，连骨骸，也没能回到故土，她享年四

十岁……

1969年“三查”，我被牵涉进江西省著名的“四·二一”案。据当年省革委会保卫部一个副部长在大会上说：这是一批省里的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躲在后面，指使一班娃娃们在前台搞反革命活动，上面与王力、谭震林有联系，外面与台湾挂了钩……作为高干子弟的我，本来无“资格”混迹于其中。只因为队上有一个高干子弟被人咬为“司令”，和他同过战斗队的五、六个同学，包括我，也就水到渠成地被划为他的“麾下”。我此生从未带过“长”，唯一一次当的便是这“反共救国军”的“参谋长”了。就为这，我被三天一小审，五天一大审，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五天五夜。我在林林总总的刑法里舞蹈、歌唱；舞蹈的结果，是衣服与血肉结成了一层铠甲，脱不下来。歌唱的结果，是引来一蓬蓬苍蝇在双腿膝盖处啾啾歌唱……我向专案人员请求：

“要不，你们就马上枪毙我。若不打算枪毙我，就让我去治腿，腿运断了，日后开批斗会要人扶上台，进了劳改农场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影响不好，国家也吃亏……”

终于，我象一条死狗，被扔进了一间密封的厕所。两天后，死狗醒了过来，颤颤地爬上高处，想用爪子握住电灯插座，一碰，便被电击了下来，扑通一声重响，招来了看守的，天国没有进去，反倒添了一副脚镣。关进监狱后，又加了一副。1968年冬天，我是戴着两副脚

镣睡觉的，一直到今天，我睡觉还得两条腿勾在一起……前后关了一年半，军代表找我去谈话：

“你可以出去了，出去后不准有牢骚，你能保住条命就是不错的，若不是这个案子牵涉到这么多大干部，连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侯××也被揪了回来，说不定你这个小家伙早给毙了！”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来斗去，我和我的家人，总是放在炉壁上烙的烧饼，架在火上烤的羊肉串儿，

父亲受我的牵连，也关了半年。据见过他的人事后告诉我，那段时间，他眼窝凹陷，发须半尺，面黯神销，浑如野人。细想想，清白一生，小心一生，粉笔灰下打发生涯，上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律，解放后这门课见鬼去了，他主动改行，教起《新民主主义论》和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似小牛犊紧吮着母牛的奶头，那“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荣誉，几乎年年未放过他，自1957年始，运交华盖，先是帽子一顶，再是猝然失妻，没几年又身陷囹圄，家破物散，几个子女流徙东西……我真担心他会熬不下去。还好，他真读通了那涵盖人生莫测风云的哲学，以后我没有问过他，我猜想，那段苦难的日子里，他一定是天天与云端处的老庄神交的……

1970年“一打三反”，我的一个妹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过程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学校放露天电影，电影散后，在宿舍楼道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众人围着看时，她说了一句：“这字，怎么有点

象我的字？”

于是校方请君入瓮，刑大约是没用了，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有一番软硬兼施的话就够了。那硬，“你父亲是反革命，你哥哥是反革命，讲是你写的反动标语，十个人有十一个人相信！”那软，使她真以为承认了就没事，犹如在家里承认自己私拿了几毛钱，父母亲会对你怎么样呢？可这一承认，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批斗，监督劳动，不让毕业分配……接踵而来。她发现上当了，便一个劲儿闹翻案。谁睬她呢！她是翻过去的一页日历，而那一页上正需要多几个“阶级敌人”，犹如今天的挂历上总需要刘晓庆那顾盼生辉的笑靥，尽管她已经年近不惑……妹妹突然寄了一封信给父亲，信里没写什么，只有几元钱，一丈多布票，父亲估计是凶兆，急得不行，赶去了永修县，果真她在谋划要去县革委会门口，喝上一瓶什么药水，自尽在那儿，以示抗议。不久，她被打发去了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那里有一个同情她遭际的工地指挥，疏通了有关部门，将那“反动标语”的照片送到九江地区公安局去做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下来，也许是照片画面不清晰，也许是妹妹的字迹有些象上面的，既未肯定，又不否定。以后，又辗转再三，送到省公安厅进行鉴定。在近一年时间，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象在刀丛里过日子，几乎没有一天不心惊肉跳，不送省厅鉴定，妹妹年纪轻轻，却得背一辈子黑锅，送去鉴定了，倘若还是既未肯定，又不否定，她还有勇气活得下来吗？倘若甚至确认是她的笔迹，再加

她一年多到处申诉翻案，她还不得被逮进监狱……值得万幸的是，冥冥之中她终于感动了上帝，省厅否定了……

我应该从骨子重叹这“一次次红色暴风”，依据自己一家的遭际。还有疮痍满目的中国，确认“文革”初期我和同代年轻人一样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对本来之中国仁色且又平等、自由的憧憬。些已遭到这“革命”最残酷、但心地蹂躏。我应该明白，若“四面惊雷/八方来风”，“把珠峰作炮台/让炮口云天惊”，“以家有限的一点家当会争得一千二争，大地将容入不生芳草，人民将受自不（因果）”退一步说，我没有多少年的目光与胆识，我也必须保持留云般的成熟。我却从留云里奋力地守出一幕“豪迈”的大雨来……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地改造……

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

不，不是得到了彻底地改造。在生活里我是痛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压抑的。严峻的生活，不给我一个社会的贱民以任何摆脱困境的机会。

也决非是痛苦地说着假话。在诗歌里，我是愉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膨胀的。不时飞向报刊上的诗歌，给了我一个小工人以出人头地的机会。

我习惯了上面提倡什么，我写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说什么，我写什么。怎样有利于生存，我就怎样写。恍如加足了油的轴承，几乎无需皱一下眉头，费一点脑筋……

我习惯了诗歌对于自己命运的嘲讽，对于社会生活的掩饰。习惯了内心世界的二重分裂，我从真实的一半

走去虚伪的一半，或是从虚伪的一半回到真实的一半，难有半点迟疑，不会磕磕碰碰，好似在一轮澄静的秋月下，漫步于宽广的长安大街……

邮戳不断地重复在信封上，悲剧不断地重复在我跌宕的命运里。悲剧意识，却被麻木的生活态度，卑微的生存目的所冲淡。悲剧没有转化成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再跌宕的命运，也不能净化我的灵魂，升华我的人格，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似乎不仅是我没有悲剧意识。敢于把钟海源异常惨烈的结局，连同自己一颗受了伤的心，赤裸裸地捧给世人的唯有H君。对于小G，那刑场上血淋淋的记忆，大概将陪伴他终生。他想努力遗忘它，它却蝼蚁钻堤坝般极力钻出来；在月白风清之夜，他被妻儿甜睡的鼾声所惊扰；或者是在县城的街头上，看了一张打了红勾的判刑布告……他一会儿郁郁寡欢，总觉得自己欠下了什么；一会儿眉头舒展，又觉得自己并没有欠谁什么。他也许会给人以有点神经质的感觉……

F副营长则十有八九，活得坦然，依然大大咧咧，依然活蹦乱跳。若他现在是一个副处或正处级的什么官，他也依然不摆架子，和下级们有说有笑。某次酒席上，或者是看完报，点着一支烟，等着下班的那会儿，他肯定会将那次刑场上的经历推诿出去，为了能和地摊、书亭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俗刊物争一雌雄，也许他还会添一点油，倒一点醋……

细分析，说假话有两种情况。若是自觉的，叫欺

人，若是不自觉的，叫自欺。因为前种尚有编织的过程，心计的痕迹，大概只能视作欺瞒症的轻度症状；而后种几乎已成了条件反射式的习惯，一说便是龙头一旦打开哗哗而下的自来水，故应视作病入膏肓的表现。

也并不仅是我病入膏肓。

就是到今天，据报载有位法国专家在中国工作了三年，要回国了，照例要举行欢送会，欢送会上照例要请他讲话。他说：

“我就讲讲中国最好和最不好的吧。中国最好的是十亿人有饭吃，最不好的是人人讲假话。”

妙的是，举座愕然，可继而满堂哄笑，掌声大作，仿佛看完了一出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小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欺瞒是个人遭受挫折时防御性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的一种表现，是人不敢正视现实的儿童心理化的标志。

也并不仅是在精神上长不大。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犹如一轮朝阳，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在一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昔日说着假话以求自己的生存，当今说着假话以证实昔日的清白，乃至冤屈，不是大有人在？

人们对于极左路线的声讨，僵化体制的批判，莫不众口一辞。人们对于当年某月某张大字报诬陷过自己，某日某个红卫兵伤害过自己，也都记忆犹新。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怨患，乃至在他的身后搭起一座恶的祭坛，也许还会成为一种时髦，反正他老人家已无言，再也走不

出那张汉白玉塑成的椅子……

却很少有人思忖：作为一段蒙昧的历史过程，民众与领袖、体制、路线，为什么会有如此完整的契合？更少有人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里寻找、并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比如，与曾××将一纸情书交给了部队，从而导致了李九莲、钟海源及赣州地区一批干部、群众罹难相同，1955年，也正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编辑”成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从而开始了几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雪崩和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

翻翻仅该报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就会发现有那么多名著名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去群起而攻击一个弱者，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弱者，而且这一攻击将会导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后他们自己也早晚给“黄雀”叼了去。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英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

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狼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狗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

三十年后，人们只记得“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遗忘了这一类“美蒋特务”，“九尾狐”，“狼种”，“狗种”，“灰色蛇”的语言。有论家指出：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同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上，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

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范畴，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暴露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他的兵和领导们时，他们应当多忏悔，甚至更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心和，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起良心的责任。”（朱学勤《我们需要一种灵魂拷问》）

然而，如果只有“野草般野蛮地生长”，却无“牛膝的黑玫瑰在开放。”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们都是如此，还怎样能对在那不但践踏了人类道德，而且还肢解了人类血缘关系的疯狂年代里曾××的所为，以及李九莲的家属不去探望、不回写信、不去收尸提出过份指责呢？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在李九莲、钟海源的案件里前前后后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她们命运的人们，去良心的法庭上拷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作出一点努力，为人间留下这两颗高昂、可贵的头颅呢？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们都是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对××医院L干部在家里彩电、冰箱齐全的今天，却依然抱着古老看客式的麻木而嗤之一鼻，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全体民众拥有一种高贵的正义之情，它决不是为着个人生存的一点可怜要求，而是关注别人不幸甚于自己不幸的博大人道主义胸怀，关注国家衰荣甚于自己衰荣的社会责任感。

正如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

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在今天，似乎中国人被唤醒的并不太多。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也并没有都遁入历史的陈迹……

遗传学家们认为，某种获得性行为，只要通过三代遗传，就可以对基因产生遗传影响。我怀疑，莫不是一代代人因为都面临环境选择的压力，一代代人却又未都敢正视这压力，从而使虚伪与麻木真被编进了遗传的密码，在我们众多民众的生命中，已经次生本体化了……

要不，就很难解释，十一年前犹如锋刃的历史已经挑落了一幅蒙满灰尘的现代神话之后，今天仍有人在不断地捡起它的破片碎屑，并不断地拼凑起乍看有了新色的神话；

要不，就很难解释，眼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短期化行为，即个人，或者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注重乃至殚精竭虑的总是如何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眼前的效益和一时的繁荣；而忘却乃至冷漠国家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久繁荣。

要不，就很难解释，在今天善谈“改革”的人并不少，期待改革能立即变成好烟，好酒的人也不少；若改革要他付出代价，哪怕是拔出一根毛的代价，转眼就能将改革变成玻璃柜台里假烟、假酒的人，更不少……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环境里所奋进，她的步履维艰，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正是被这样一个国民环境所包围，她前景的吉凶未卜，也就不是危言耸听之谈！

写到本节尾处，我的心不禁刀触般震颤了一下，我发现——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十几年前李九莲、钟海源的命运，颇有一点类似《药》的故事，那么，今天一些人们对于改革的虚伪作法与麻木态度，便是在剧烈地重复《药》的故事……

第五章 忠贞谁羁

思情沉重地流着
流着一个长长的世纪
大海还是那样遥远
您在哪里？哪里？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曾在海啸里相逢
又在海岸边相遇
珊瑚绽开了红色的爱恋
彩贝诉说您灵魂的圣洁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向海燕呼唤人生
乘海风伸扬正义
多么希望，潮止沙静的时候
聆听那柔波絮语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几被卷雪排空
一片忠贞谁藕
水天依旧天水依然
漫堤绿柳摇一湖湛蓝的回忆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湖鹭飞向海边
海鸥掠过湖堤
在天堂和大地之间
我的诗情浸透了血泪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朱毅《美人鱼——给天堂也给人间》

二十八

1978年元旦，在珠海农场服刑的朱毅，在中队迎新年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

笑看三尺雪
矗立九寒中
百溪千山香一簇
醉了竹和松
.....

这是九莲被杀后的第十天。他心里很乱，很苦。

对于自己，他作过种种准备，乃至作了舍弃头颅的准备，毕竟主要是自己，领导了调委会，在半年的时间里，使其成为了地区、省上乃至中央各级头头脑脑们的一块心病，但他从未想过李九莲仅因言论问题而被杀头，而且是在已经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后！

震惊之后，他一时理不清心里的头绪：

他觉得她有些轻率了，在小组年终总结的场合，而对几乎都想让别人倒下去、而使自己垫高来的犯人，还有那位大抵靠一身警服撑持门面的管教干部，你把话放在肚子里面，就会少掉什么？即使你对时局有很深刻的看法，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少，说出来有什么用呢？我们已是囹圄之人了！她这一去，问题更趋复杂了，人不死，就算历史打个盹儿人们就要耽误二十年，我们就在牢里坐上二十年吧，等着历史睁开眼睛，总有搞清楚的时候；人一死，一旦睁开眼睛，就要匆匆前行的历史，能回头顾盼到一个九泉之下的小人物的无言期冀吗？朱毅头一次有了寥廓长空里孤雁惊寒的感觉……

他又觉得按李九莲的全部禀性，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能长久地生存下去才是奇怪的；在卑鄙、刻薄的挑战面前，她若失去勇气，以高尚、磊落相匹敌才是奇怪的。当权力将她推上断头台，在断送生命的同时，断送了她一生孜孜不倦，虽有错误却一定能修正错误的思想探索，可她的人格力量因此获得了完美地呈露。也许，她将能昭告于世人的生命价值，正在于其人格力量的完美？朱毅又有了高山仰止的感觉……

他有很多话想对李九莲的在天之灵说，可在她刚刚离去的日子里，那份撕肝裂胆的悲恸又沉重地压着他，几乎提不起笔来，他只匆匆写了这么一首小词，未料，它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它的副标题是“怀念杨开慧烈士”。众多的犯人其实看出了在这犯人的黑板报上唯一能用的名义下，它是在悼念他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这个曾经传遍赣江两岸、匡庐上下的名字，他们大都在狱外有所耳闻，即使不知道的，到农场后，也从朱毅嘴里听说过。应该说，刑事犯平素在外面是难以理解别人痛苦的，盗窃犯若能体谅遭窃者破财的痛苦，他就不会去盗窃；强奸犯若能体谅被污者身心遭蹂躏的痛苦，他就不会去强奸……但此时，即使是刑事犯们都理解了朱毅的心里必须有所渲泄，有所寄托，没有谁去说三道四。

有一个文化水平颇高的犯人，理解力却在常常写一封信都困难的刑事犯之下。此人叫陈连山，高安县人，因为历史反革命入狱，已服刑多年。平时他和朱毅接触不少，人虽显得有些油滑，但言谈里不乏儒雅之风，两人常在一起谈诗，在精神生活异常贫脊的处所，这对朱毅也是一大乐趣。这首小词刊出后，陈连山趁身边没有人的那会儿，对朱毅说：

“你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毅苦笑了一下。这一苦笑，便算是默认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陈连山将自己的“发现”捅了上去。报告对象选择

得很准——中队指导员 K。此人以虐待犯人在农场著称。也许是为着朱毅在自己的案子里已经表现了他是一条汉子，也许是为着他在犯人中间的影响，K 对他倒是从来未曾体罚。可眼睛每当看到他时那份压抑不住的恼怒，与朱毅每当看到此人时脸上压抑不住的轻蔑一样，都是显然的……

当天晚上，K 突然集合全中队犯人开大会。犯人们一个个规规矩矩，木桩般坐好后，他黑脸秋风，来回踱步，颇象是一个手握利斧的伙夫，在众多的木桩间走动。既象是在打量要劈开哪根木桩，填进炉灶里烧饭；又象是要让所有的木桩无论是前胸，还是后背，在这一刻充分感受到一名伙夫生杀予夺的权力！

咚咚的脚步在朱毅身边停住了，立时，他明白了这个会的主旨。他几乎屏住呼吸，握紧了拳头，等待着风暴的袭击。瞬间，响起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陈连山，你站起来！”

说话的是 Z 管教，他刚刚进屋。陈连山一头雾水，茫然站了起来。

“你向指导员反映朱毅写的词别有用心，是他别有用心，还是你别有用心？”

陈连山吱吱唔唔，感不成声，一双豆羹眼投向了指导员 K……

“你知道不知道。每期黑板报上登什么，不登什么，都必须得到政府干部批准。不批准，擅自登出什么，谁有这般的胆子？朱毅写词，经我看过了，言

说他写这首词是为了悼念李九莲，你这是把矛头对着他，还是指向我呢？”

陈连山恍如一只啄米的鸡雏儿，连连低头，迭迭称道：

“卑人岂敢，岂敢……卑人该死，该死……”

Z管教又喝斥道：

“陈连山，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在旧社会当伪乡长，当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现在还不老实呀，处心积虑踩人家的肩膀，求得自己活得轻松，可你看错了地方，打错了算盘！就不提其他政府干部了，就说指导员，他什么样的乌龟、王八没有见识过，能识破不了你？我警告你，还有你们大家，今后，谁敢再施这样的故伎，谁就得罪加一等！”

Z管教让一个风暴已经陡立在朱毅头上的会，顷刻间，变得有惊无险。以后，朱毅还通过他寄出了一些申诉材料。一切都无需多说，听他的口音是赣南人，朱毅便知晓了，这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

年年清明前抄录，年年清明时都焚烧了的，是另一首诗。

那诗行是在初始撕肝裂胆的悲恸渐渐平歇，而冰清玉洁般的思念让心灵变得明彻，变得深沉时开始躁动的……

两簇硕白的桅子花，恰对着朱毅监舍的窗口，可以从5月一直开到炎夏。双抢时节，允许犯人去户外露宿，他便去它们脚下席地而眠。看着它们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的婆娑花影，吸吮它们那丝丝缕缕沁入肺脾的幽

香，朱毅便会想起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里写到的月光下的华沙美人鱼来，那银白色的花影不正似美人鱼窈窕身子的一片片鳞光吗？

李九莲对这本书爱不释手。1966年，他们在一起谈过它，次年春天，他们又在一起谈了它。他们深为这位出身波兰、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代的著名女革命家的品格与情操所感动，也被她火热、优美的文字所陶醉……稍有不同的是，罗莎·卢森堡在法西斯的监狱里，有感于平时一个个著谈革命的人，此时背叛了革命，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想华沙美人鱼是美，可就是不会开口说话，倘若它能开口说话，让人洞察到它的灵魂的话，说不定它就不美了……而李九莲多次这样说：

“我就希望这美人鱼不但外面美，而且灵魂也是美的。”

她第二次被捕后，唯一对朱毅提的要求，便是请他设法找来这本书，并托人送进监狱。他想：这本翻得卷毛了的《狱中书简》，还有这条华沙美人鱼，在近四年的狱中生活里，一定给了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以多少默默地抚慰呵……

朱毅写下了《美人鱼》这首诗，以此作为对李九莲的永久悼念。它又不是仅写给李九莲的，诗的副标题是“给天堂也给人间”，在人间指的是钟海源，她不同样是一条从外形到灵魂都美的美人鱼么！当时，他还不知道，她继李九莲之后也已上了“天堂”。他只清楚她以那样一种赴汤蹈火的方式，向他表白了一种极为崇高、

极为强烈的感情，尽管刀割般痛楚，他明白这感情对于自己已经是不可抗拒的了……

每年清明，当一蓬火苗将抄正的这首诗稿化为一蓬悠悠而去的黑色灰蝶之后，他都要在一个洁白的瓷瓶里插上一枝洁白的花。当他最终听说了钟海源已不在人间之后，犹如他得以双倍的力量支撑起这双倍的巨痛，他便在—对洁白的瓷瓶里，插上两枝洁白的花。在珠港，插的是梧桐花，以后在珠湖，插的是刺蔷薇。他出狱回到原单位茅山共大，茅山是九连第一峰，清明时开一种形似石竹的白色野花，有一年，此花竟和他相对了四十九天，学生们真好，他教的高中毕业班学习那样紧张，可每天都有人给他的斗室送来一束带露水的“白石竹”……

就是1982年，他再度去北京上访，他也找到“千楼一炬劫灰冷，留得萋萋苦杜鹃”的圆明园遗址处，凭借远瀛观附近藕池中的满池荷花，来寄托自己对她们的思念，北国的荷花会开得如此早，而且又如此茂硕、水灵，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仅是朱毅在悼念李九莲、钟海源。在起初的那几年里，在关押有因李九莲问题而被判刑人员的劳改农场，每到清明时节，都出现有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写的悼念这两位女性的诗。写诗的既有与本案有关的人，也有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政治犯”，倘若能将它们以及在这之前赣州人民关于她们的诗文搜集起来，大约也能编成类似《天安门诗抄》的那么厚厚一本……

“政治犯”敬重李九莲、钟海源，刑事犯们也敬重

她们。在朱毅所在的大队，为李九莲一案进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可在珠港农场期间，他频繁进行的申诉活动，始终得到了众多犯人的帮助。当时，他负责全大队犯人的文化教育，自己有一个备课的房间，比一般犯人行行动稍自由点，在备课之余写出了长达三、四万字的《还在流血的爱情——七十年代江西最大、全国罕见的政治冤狱》之后，油墨和纸张是各个中队的统计员陆续从围墙上偷偷丢进来的，刻写钢板是中队的卫生员担负的……待准备开印的那一天，上午九点多钟，一捆纸弄上围墙时被发现了，大队一位管教一下就清楚了这纸将派何用场，他找了朱毅谈话：

“朱毅，你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可有一条，你不能在这里印什么材料。监舍就得有个监舍的样子，你可不能搞得乱了监规……”

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好，你放心，我不印了。”

这天，几乎就在隔壁，在两间统计室里，十几名犯人分成三班，印的印，分的分，装的装，一共印了一百多本。到钉好最后一本时，天边已透出鱼肚白了……

出工哨子一响，又是二十多个以九江籍为主的刑事犯人，每人夹几本在棉袄里，将这一百多本全部带出了监房，带出来天地就广阔了，有放在茅草里的，有放在禾堆里的，有放在石板下的……它们将等着朱毅来决定各自的前程：或者呈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寄南昌，省委，省人大，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检察院，或者是寄国内有广泛影响的知名人士。作者曾听说，中国的报告文学界，第一次获悉“李九莲”这个名字，便是来自于这本《还在流血的爱情》……

要说从如此大规模地偷进、偷出，到几乎是明火执仗地私刻、私印，在劳改农场里，这都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了！若叫起真来，众多的参加者们面临的将是加刑，乃至得有冒死的风险……

但没有谁退缩。在陈连山之后，也没有谁告密。仿佛这是一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民族，可民族的旗帜尚没有倒，那旗帜上尽管有道道污痕，那两条美人鱼相交的族徽，却依旧鲜明……

对此，“政治犯”们会有头头是道的分析。而刑事犯们常常只有一句话：

“共产党象李九莲、钟海源这样讲真话，我们都拥护！”

二十九

从1979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接到了大量来自江西各地的为李九莲案件申诉的信件，这些信件的多数陆续转来江西，交有关部门处理。

1980年12月，新华社总社派出记者戴煌来江西调查李九莲案件。戴煌同志在南昌调看了李九莲的全部案卷，并走访了赣州。回到北京，他很快写出调查情况，刊发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14期上。

1981年1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该清样上批示，内称：“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2月15日，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彭冲同志转批了清样——

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

“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2月19日，江西省常委会议决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由省、赣州地区公、检、法三家抽调干部组成复查小组，立即对李九莲案件进行复查。

3月1日，复查小组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复查结论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前两次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误的，后一次判刑过重，属于错杀；一种意见认为三次对李九莲的处理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

3月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结果，同意复查小组的后一种意见。

3月18日下午，19日上午，召开了第21次省常委会。会议根据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对李九莲案件进行了反复地讨论研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常委会认为，从李九莲全部案卷来看，她在政治上、思想上、言论上是有错误的。她的错误，主要是集中在1977年元月在劳改农场犯人小组年终评审会上宣

读的《我的政治态度》里，有的话错误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就更加重了她的错误。说明她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完全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的东西。但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以法律观点来衡量，李的言行不属于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构不成反革命罪，也不能定为反革命煽动罪。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会议原则同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赣州地区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过去对李九莲的拘留、判刑、枪杀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

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在处理李九莲案件的同时，赣州地委要对“调委会”一案进行认真地复查，凡因此案受牵连、被判刑和受其他处理的，应一律予以平反纠正，至于这些人中有其他问题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应得的处理。

19日下午，省委召开会议，将以上决定向赣州地、市委和省、赣州地区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要求赣州地委一定要稳妥地处理好此案，以利于稳定赣州的局势。并要求赣州地、市委有关部门要做好李九莲的家属工作，给予必要的抚恤，同时要做好“调委会”成员及其家属的工作。

4月13日上午，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肖开彬、邓永相两同志，来到陈家巷七号，向李九莲的母亲送交了李九莲的改判决书。当问及家属有何要求时，她提出：

一、给李九莲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对李九莲问题作出明确的政治结论，并让家属看阅其案情材料。

三、为李九莲造坟。现在的平反布告应与当年的枪决告示在同样的范围内张贴。

四、释放为李九莲辩护而被治罪在押的干部、群众。

五、解决李九莲之妹李玉莲的受株连问题。

六、对年老的母亲给予抚恤，调回唯一的儿子李东林回赣工作。

4月14日上午，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为钟海源平反昭雪。

5月9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81）刑二监字第13号下达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和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被告人钟海源两次犯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和死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不当。宣告钟海源无罪。

6月23日，全南县人民法院以（81）全法刑监字第1号下达刑事判决书，内称：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毅目无国法，对抗中央指示，擅离职守，窜到赣州，拉帮结派，进行帮派活动，干扰党、政、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尚未构成反革命犯罪。原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不当，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75年12月12日（75）全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朱毅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予以释放。”

在此前后，原“调委会”被判人员，均得到“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的改判，并陆续予以释放。

三十

朱毅出狱后，在家里稍稍休整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好有关材料后，于1981年8月底，去了北京。

一住进清华大学的一位熟人处，他就给戴煌同志写信。未释放前，他就知道了这个名字，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期《国内动态清样》反映的情况，由贵州经广东传进了珠湖农场，自然是在事隔几个月后……

过了两天，他想戴煌应该收到信了，就去了宣武门附近的新华社，带上了材料，还带了一个暖瓶，他听李九莲讲过当年来北京上访的情况，估计新华社的大门也不是那么好进的。若不让进，自己就拿个暖瓶坐在门口，等也要等戴煌出来。果然，在门口碰到了周折，还好，虽不让进，但戴煌同志和新华社国内部负责编群众来信的何昆同志，一听传达室电话，立即就一起出来了。三人去了戴家，吃过午饭，朱毅向他们讲了江西方面的情况，听完后，戴煌先是在桌上画了一张图，这是一张怎样经南长街去中南海的路线图。又说：

“朱毅，这张图你拿着。我马上去联系，下午你去中央办公厅汇报！”

朱毅由宣武门乘车到天安门广场，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在苍郁、伟岸的古柏林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清风徐来，鸟啾蝉鸣，先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恬适包

围了他。继而，一股巨大的温暖，犹如强劲的海潮一样，漫上了他的身心……

中南海就在一箭之遥。他感觉自己触到了党中央那博大胸膛里所透射出来的阵阵热力，他似乎能听到党中央运筹帷幄时那深沉、有力地呼吸……

这几年，虽然人在鄱阳湖滨的劳改农场，可仅凭着每天必读的报纸：“天安门事件”平反。彭德怀元帅、刘少奇主席恢复名誉。“右派”改正。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朱毅愈来愈强烈地感到：祖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将“变革”两字写上自己旗帜的生气勃勃的时期里，不但将变革经济基础，变革上层建筑，而且还将变革人的生存状态，去实现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而洪水浊浪刚刚过去，为了在一片充斥小农经济观念和僵化教条的卵石的荒秃河滩上，扎下一排枝繁叶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树，党中央作出了何等艰苦卓绝的努力……

此刻，七年的监狱生活，二千五百多个白天黑夜的殷殷呼唤，苦苦寻觅，恍如做了一场梦似的，一醒来党中央就在身边，茫茫人海里，党中央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一下明白了，那温暖是幸福的骤雨，是欣慰的热

风，好似一个饿汉乍碰上一顿美餐，得细嚼慢咽一样，他想干点什么，来一点、一点地过滤、消耗这温暖，他给在赣州翘首北望的曾传华等人写了一封信，以至于忘记了在绿树环绕的金碧琉璃瓦上匆匆西斜的时间……

戴煌同志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好后，下午却不见人来，以至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到清华大学查询。亏得朱毅在戴煌处留了地址，他回到清华大学住处后，戴煌同志托人带给他一个纸条：“中央办公厅要你快去！”

9月5日，朱毅根据戴煌同志画的路线图，到了中央办公厅。在314号房间一位老同志W当即接待了他。

“戴煌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你要上访的大概缘由，小朱同志，你是不是先谈谈情况？”

因为李九莲的基本情况，那期《国内动态清样》上都有了，朱毅便着重向她汇报了钟海源和调委会的情况。当谈到钟海源在刑场上被取肾时，她将桌子猛地一拍，摘下眼镜，人站了起来，目光一下严峻得似乌云下的闪电：

“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早汇报？”

朱毅也激动了，几乎是喊道：

“凭什么叫我早汇报，当时我在什么地方？”

刚说完，似乎心里还堵得慌，又补充了一句：

“我何尝不想向中央早汇报！？”

她走过来，抚拍了一下朱毅的肩膀：

“小朱同志，请你原谅，我有点冲动。不过，我不是说你，而是说新华社，他们不知调查过这事没有，若

调查了，本来应该要汇报的……”

临走前，老同志建议道：

“你明天就从清华大学搬过来，住到我们中直机关的一个招待所去……”

朱毅一惊：

“我没有钱，来北京的路费都是大伙儿凑的……”

“钱就不要考虑了，你住过来就是，材料你也都带来。再有，你要找哪些部门上访，不要自己去找，通过我们去找，我们想一次给你都找来，听你全面汇报，你看好不好？”

对朱毅，这又是一次意料之外……

“当然好，当然好……”

当晚，朱毅去找了戴煌。当问及他为什么没有反映钟海源被取肾一节时，他沉吟良久后，说了一句：

“这事我听说了，但没有去专门调查……”

朱毅觉得难说清楚他此时在想什么，可以肯定的只是眼前的这位长者，决不是一位没有勇气的记者。也许是行程的确太匆忙了，几天之内，他跑了李九莲呆过的学校、工厂、监狱及其遇害刑场，还顾不上钟海源的案子，也许是李九莲被挖去乳房，阴部，已经够血淋淋了，若再提及钟海源的惨烈，会不会反映了，却让一些人吓得晕了过去？在面子上，我们总还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民族，常常面子比里子更为重要；也许是在自己也有过的坎坷遭际里，他早就风闻过此类事情，在中国，难说此类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不过是因为发生在钟海源如

此纯洁的一位女性身上，才显示了它的残酷……

9月11日下午二点，中央办公厅十一楼的一间会议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都到了。主持会议的，便是5日热情接待朱毅的那位老同志W，此时她是中央办公厅协调中央各有关部门处理全国重大冤假错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W向到会者介绍了朱毅之后，朱毅有点忐忑不安了：不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横跨了时空，没有了阴阳之界，李九莲坐在这里，钟海源坐在这里，“调委会”和赣州地区被卷进李九莲案件的成百上千干部、群众都坐在这里，他们都在静听他的讲话，都在审视在这极其难得的机会里，他将如何向来自中国诸多显赫部门的人们，呈现在遥远的赣南土地上发生的那一段风诡云谲、兔起鹘落的历史……

他问W同志：

“从哪开始说起？”

“就先从李九莲的那封信开始说起吧。”

朱毅念了李九莲写给曾××的第一封信，介绍了李九莲从“文革”前到被枪决的简历，念了若干段1974年地区法院、地区工代会、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编辑的《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材料》。随后，他回顾了“调委会”和赣州地区干部、群众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为李九莲冤狱仗义直言所作出的不屈努

力，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时，他汇报了钟海源的无畏与惨烈……

从念完那封信起，人们就被一个小女子的命运及其所波及的众多人物的命运给抓住了，人们关于他们命运因果之链上的每一环的思忖，也犹如飞机的螺旋桨一样，一下发动起来。这堆庞大、纷飞的思绪是那样沉重，除了压得会议室里的气氛始终显得沉滞，还压在了与会者们的神情上：皱纹拧紧的额头、眼角。鼻梁与嘴唇间顿显刚劲的两条曲线。睫毛扑簌簌地轻颤。咳嗽声也不自然了，沉闷而又短促。手上若不抓住什么，便好象一条没有上链子的猎犬会咬人似的，抓起香烟，抓起钢笔，压住茶杯盖，抑或干脆攥成一个拳头。泪光点点，流汁噙动。中宣部的一位女同志，终于压抑不住，哭出了声来……

朱毅一直汇报到下午五点半钟。

走出南长街，走上了宽广的长安街。已是夕阳西下，晚霞如泼了……

大道上车奔如水，亮着的一排排尾灯，闪烁闪烁，迷迷离离，开始有了五彩长河的诗意。

人行道上，人流如潮，除了往家里赶，往旅社里赶的人，多是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一对对挽腰搭背，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走去，一路款款细语，盈盈眼波……

公园门口，两顶有如硕大蘑菇般的白色篷伞下，正卖“可口可乐”和北冰洋牌汽水。

一个恶梦般的年代，早已被压在了那一堆堆空了的拉罐和瓶子下……

此刻，似乎唯有站在那里凝神默想的朱毅记得，他来自于哪里，中国来自于哪里……

次日，在刘复之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了会议，研究李九莲案件。

几天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全国平反冤案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到会讲了话。讲话里，他提到：

“江西有个同志来上访，谈到他们那里有个案子，死刑的有两个，被抓的有六十多个，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有六百多个，包括他们的家属有二千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解决好，应该解决好……”讲到这儿，耀邦同志大动感情。

朱毅离开北京前，W告诉朱毅，此次中央处理李九莲案件的速度是破例的，就是处理张志新的案件也没有这样快，当朱毅问她：

“与张志新比，你觉得李九莲怎样？”

她的回答是：

“李九莲当年是一个中学生，更加难能可贵，而且起点更远，终点更极……”

二个月过后，即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给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里提出——

“通过复查这一案件，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案件长期得不到复查纠正，应当从方针、政策上找原

因，要教育有关的部门和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要认真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拉的不正之风。”

“要解决李九莲、钟海源家属提出的合理要求。”

“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三十一

离李九莲、钟海源的逝去，迄今已是十一载春风秋雨了……

在江西南端的一个小县，在连结闽粤的九连第一峰的苍莽之中，朱毅当着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在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与痛苦之后，他的胸襟也是苍莽的；能为偏于一隅的童心催花引蝶，让孩子们能和祖国一道拥有美好的未来，此生足矣！

他忘却了人生的功名、利禄。他忘却了尘世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他却没有一天忘记她们。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月食》被改编成电影《蓝色的花》时，他给在南昌的哥哥、嫂嫂写信道：

《月食》终于选用毋忘我花来象征人物和主题，能不能深化主题我不敢臆断，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位年复一年缝制了二十二双布

鞋的太行山女性，在电影中一定会比小说中更美，更动人！信念是美，忠贞是美，牺牲是美，而甘和祖国与爱情一道受难则内涵着最深沉的美；两颗美丽的心在回春的太行山，在美丽的月夜，终于幸福地重逢了。可我们呢？我呢？她们呢？她呢？眼前，暮天骤来的急雨中，大朵、大朵蓝花的摇曳中，传来的却仿佛也是永远只是天外的呼唤：“毋忘我！毋忘我！”——就象少年时哥哥歌本里《梅娘》绝望的呼唤一样……

“毋忘我”呵，朱毅想郑重地安置她们的遗骨。钟海源的遗体在无数双手、无数把刀的解剖下，可能是无法找到了。李九莲的遗骸，要找，却并不会太难。当年在遭那只两脚兽的残忍褻渎之后，总算草草掩埋了尸体，虽风流云散，人事变迁，但寻迹觅踪，锲而不舍，总能打听到葬址。可她的家属还在，提出过如是的要求，并没有积极的行动。对此，他百般无奈，中国人是很讲究名份的，“名不正，言不顺”，当年他为李九莲冤狱申诉时，就有人审视他：“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毋忘我”呵，朱毅一直想收存她们的遗物。当他看到李九莲的那只破箱子时，已经空空如也，军帽被她的一位同学拿去，以作纪念。那包变质、变色了的烟丝，早不知被谁抛去了哪里。在她家总算找到一个她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时的工作证，它成了她在这个世

界上匆匆走过的唯一痕迹。似乎是唯恐这唯一的痕迹也将被岁月剥蚀掉，他十几次地复制，放大了工作证上的照片。钟海源的东西都不知去向了，没有人去监狱接回她的遗物。曾有人带信给朱毅，说钟海源在获悉自己的死讯后，在一条毛巾上给他写了什么，并将它托付给了一个家在九江的女犯。他一出狱，急如星火去了九江，踏破铁鞋，却没能找到这个已经刑满释放的女人……

“毋忘我”呵，朱毅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对钟海源的女儿徐小云的父亲般厚爱了。

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在赣州市朱毅的家里，见到了这个女孩子，她十六岁，正在市郊的赣州地区卫生学校读书。苹果形的脸庞，到脖子的短发未加任何修饰，一对黑如深潭、恬静也如深潭的眸子，一看那深潭里便溢满了纯洁。说起话来，红唇皓齿，音色朗朗，恍如脆润的天津鸭梨……

与她对坐，你会觉得生命之晨的徐风清新地吹来。可你再仔细注视，又会发现在那对明眸里，隐隐有某种被压抑了的什么，这生命之晨的风儿，吹荡在你的脸颊，也并不总是平和……

七、八年来，我跑过不少地方，采访过很多人，有名的。无名的。深沉的。轻薄的。老辣的。单纯的。强悍的。软弱的。壮怀激烈的。看破世事的……可还没有一次，象面对眼前的这位女孩子一样，使我感到难以启口，恍如语言成了一把刀子，要掏开她的心扉，将是件很残酷的事情。

我又不能不采访她。我只有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她听了，若有所思一会，便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我边听，边觉得：她能推开心里那扇沉重的大门，并不仅是因为出自对朱毅的信任也信任了我这个陌生人——

后母是我外婆的养女，我妈妈在世时帮我家做过家务事。小的时候，她对我还可以，自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总看我不顺眼，过去在家住时有时就挨打，现在住校了，偶尔回家，就常挨骂。我也弄不清她为什么要骂我，而且骂起来好难听，净挑这些东西骂：“反革命的女儿”，“打靶鬼的女儿”……现在还这样骂，一直骂到我不理她，或者我躲起来，不见面。她骂我还不要紧，我最怕的就是她骂街，邻居们听了，一定会在心里嘀咕我爸爸：他是个大学生，怎么会找了这么个女人？

即使后母不在身边，我和爸爸也无话可说。他有点“妻管严”的味道，我就尽量少麻烦他，不想使他多为难。他和后母生了两个女儿，我和妹妹们的关系挺好的，她们小时候是我带大的，我每次回去，她们都对我很亲热。可在爸爸和后母面前，我好象是个多余的人一样，所以我就想回去。虽然爸爸对我不怎么样，但他毕竟生我一场，和我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我还是要爱他的……

家里一个月给我十元到十五元钱，加上学校的十四元助学金，经济上我从不觉得怎么不够用。我很少买东西，衣服家里也不给我买，我能体谅他们，后母不工

作，一家五口人，都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在现在够难的了。我就拣妈妈剩下的衣服穿，过去妈妈的衣服还有几件，虽然式样旧了点，我又不在于穿着打扮。前些日子，朱叔叔看见我，说我身上穿的衣服，还是妈妈在井冈山“共大”读书时穿的工作服，屈指算算，该有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而我却没有，就觉得自己好可怜，邻居们也都说我好可怜，我有了自卑感。人大了，我尽力不去想妈妈，宁可自己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象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在卫校，有时候在晚上，大家都想家，谈论家里怎么好，妈妈怎么样，那么激动，而这一切在我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我妈妈的照片，我见过，我觉得我长得好象我妈妈，认识我妈妈的大人们也说我长得象。听了这话，我有一点好奇，大家都说妈妈会唱歌、会打扮、好漂亮，这些特长在我身上好象没有一样的。听了这话，有时我还有一点高兴，高兴的是我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妈妈的影子，又有一点不高兴，我妈妈都没有，我要象她干嘛？只会惹得自己苦恼……

虽然我的父爱和母爱确实少了点，我觉得生活还是很好的。小学的事情我不太记得，我觉得初中三年过得不错，进了卫校以后，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同学间的感情也更深了。我发现自己有了一种能力，这是过去没有发现的能力，即我能为大家服务。在班上，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常组织大家在一起玩，尽自己所能让同学

们开心。过中秋节那天，早上一起来，后母就骂我了，我当即出来了，到朱叔叔家里坐了坐，吃过午饭便赶回了学校，晚上是我主持班上的文艺晚会，将老师们都请来了，大家载歌载舞，前仰后合；开心极了……这时，我有了一种被大家承认的感觉，同学们不会想家，我也不会想哭。我平均每月回家一趟，另外三个星期天，便在学校里看看书，或是和老师一起玩。她们都把我看做是小妹妹，处处照顾我，跟她们在一起，除了玩得开心外，我也得到了好多做人的道理。

我老家的人对我很好。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是回老家过的。在老家，我感到平等，有什么好吃的，叔叔伯伯们总要我吃；可有了什么事情，他们也总让我做。日子虽然艰苦些，但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商有量，那气氛挺让人陶醉的。我在农村的姑姑对我也挺好，小时候，有一次我父母把我的腿打坏了，在他们眼里更是个包袱了，我不敢回家，就住到姑姑家，是她天天背着我上学、换药的……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去年考卫校，我正好达到分数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很担心自己会被刷了下来。我的哥哥，就是我二伯最小的儿子，特地跑来看我，“你考不上，明年就再考，家里有什么麻烦，你找我爸爸。千万不要一副垂头丧脑的样子，你后母看不起你，你可要看得起自己……”虽然后来考上了，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激他，他不过比我大一岁……

朱叔叔也关心我。他每年回赣州次数不多，回来了

就会来看我，要我去他家里玩。人在全南，也挂念我的生活，我的夏装差不多是他添置齐的，上个月，他们老师加工资10%，多几个钱，他又托一个女学生送了一百五十元钱来，要我置齐冬装。平时，他也会送点钱来。他一般不太允许我直接给他写信，倘若我有什么苦闷，或者想不明白的事情，他就要跟在他身边念书的外甥女，给我回信……朱叔叔对我好，爸爸大概知道吧，因为去年朱叔叔回来休假，来我家找过我，让我去他家玩，爸爸正好在，他没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除了朱叔叔外，关心我的人还有不少，有些我还不认识，哪怕就是说一、二句话吧，话也挺温暖的……

对这些关心、照顾我的人，我都很感激。虽然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我觉得他们都好伟大。具体的我也谈不出，有时候人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以后如果能够报答他们的话，我将非常非常地高兴。可我又觉得报答不了似的，好象这一辈子也很难还得清这一笔感情债……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足够了，有这么多人爱是一种幸福，如果一个人没人爱，就等于说是被人遗弃了一样。

是的，我是很想了解妈妈，可又觉得不太了解妈妈，仿佛妈妈是个谜。爸爸从来回避和我谈妈妈，如果我要他谈妈妈，说不定他会打我耳光。其他人，我也不大问，我不想让大家因为我而不开心。我总感觉“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伤疤，最好不要去揭人家的伤疤，更何况他们都比我大。在初一、初二时，我就有这样的感

觉的了……

现在，偶尔还会掉眼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学校团组织扫墓，同学们给我们已故的历史老师献花圈。我就在心里想：“有那么多人给他献花圈，为什么就没有人给我妈妈献花圈？她的坟前一定清冷冷的，可我妈妈的坟又在哪儿呢？”那天难过了好久，人恨得很疲劳。朱叔叔给了我一张妈妈放大的照片，我平时放在学校里，夹在日记本里，一般的时候不去看，避免引起心里难受。就是在每天晚上，写完日记的时候看一眼，一种本能似地会打开看，心里说一句：“妈妈，祝你晚安！”有这么一句话，就好象妈妈不是活在照片上，而是正站在房门口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我，而我也有个幸福的家庭一样，心里会涌起一股酥酥的暖流……

现在我只想一心把功课学好，虽然我并不想当护士，但既然考上了卫校，就要读好书，考试成绩如果比我同桌差，我就挺懊恼，这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将来着想。在学习上，朱叔叔与我谈的最多了，也总问我的成绩。成绩还过得去，每门八、九十分总能拿到。卫校学制三年，我是1987年进去的，1990年毕业，毕业了，我以后就可以自立了……

生活，欠这个少女的东西太多了。她却没有揣着把算盘四处讨债，相反，她觉得自己欠人家的太多，太多。

生活，使这个少女早熟了。早熟的果子并不酸涩，相反，浸透着充沛的汁水，她渴望幸福，也愿给他人以

幸福。

她真象她的妈妈：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她接纳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打扰，不仅仅是因为信任，还因为一种对磨难天地般的宽厚，一种对生活江河般的挚爱……

尾 声 她们注视

从我的微笑里
就该知道我并不忧伤
虽然是岁月坎坷
毕竟在我小小的记忆里
只存下了明朗的记忆

我绝不会埋怨人生
这一切只在人为
既然已无法挽回
虽说痛苦还会再来
可我的欢笑必将把它打败

青春的日子还不应当只想从前
她只领着我走向未来
踩出了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足迹
学会了面带微笑迎接明天
只把痛苦留给那个远远的世界

——徐小云《笑的记忆》

三十二

1988年夏天，我国又发射了一颗通讯卫星。它将同我国以前的五、六颗通讯卫星一道，环绕着地球运转。

这意味着，每过一百零四分钟，中国就以自己的眸子，在占茫的宇宙空间上审视自己一遍……

中国太需要明亮的眸子，去审视过去，去观照现在，去面向未来。

在本文所记述的这个无比悲壮、无比惨烈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认识的问题和吸取的教训，应该将是大量的，其中重要的问题和教训是什么呢？

作者不是思想家和理论家。犹如在繁星万点的夏夜，在这篇清明的长笺上，天文学家能读出天文，气象学家能读出气象，哲学家能读出人类亘古以来的主题——孤独，而诗人则能读出命运与爱情……我不行，我归纳不了、升华不了这满天星子，我只有零碎的片想——

民主究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的平等的前提下，以法律的形式，对自由的自觉界定，是要使全体公民享有越来越充分的自由和平等，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的解放。纵观古往今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解放——

“第一次是从猿到人的转变。这时，人解放了双手，获得了直立行动的权利。随着人的这种自由，才有可能出现狩猎向耕作、采集向种植的转变，才有可能磨

制工具等等。

第二次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这是人格的解放，奴隶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不再仅仅是工具，这便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生活热情。

第三次是从文艺复兴到资本主义。这一时期，人获得了三重解放：一是头脑的解放，从神学愚昧中走向了理性，享有了个性的权利；二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再固定在土地上，有了选择的权利；三是社会的解放，人民有了参与政治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历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政治权力受到制约。英、美、法、日等国的工业起飞均是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实现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文献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起飞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密切联系。”（远志明《解放生产力，也要解放人》）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人的每一次解放，人身上的各种锁链每一次哗哗地解脱，都是历史之翼躁动的必然，同时又极有力地弘扬了历史之翼的前进。

在开国大典上，风采照人的毛泽东主席，面对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果这“站起来了”四个字里内涵有中国人民在思想、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同时解放，新中国将会避免一段不算太短的苦难历程。

思想跪伏着，有人就升天成了神，某种学说，某些教条，便成了圣经。在烛香高烧、青烟缭绕的神的殿堂里，思想稍稍睁开眼睛，人便有了罪恶。在理性冬眠的

状态下，如果说人的能力的发挥还有可能，甚至在神的感召下，迸射出某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可人的价值的解放，便只能永远是海市蜃楼。

跛了腿的马可以走上一阵，三条腿的桌子可以放上一阵。扼杀人的思想、漠视人的价值，仅在第二个层面上理解人的解放，那局面也可以维持一阵。但跛了腿的马，不如好马。三条腿的桌子，承受不了轰隆隆澎湃而至的电闪雷鸣。那安营在蒙昧之上的局面，也不会光景太长……

人的全面解放的首要前提，是思想层面的解放。它反映在政治上，是人民必须拥有知情权、议政权、监督权。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将政治交给人民，并从人民那里获取克服惰性、抵制陈旧势力和摧毁停滞机制的强大力量！

思想，只有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之分。对于它们的裁决，只能是活生生的实践。对于后者导向前者的修正，只能是如迪斯科一般舒展的思维过程。

而且，正确的思想正是从子宫的黑暗中来，从一个个失败了的命题、一张张作废的稿纸中来。错误的思想也难说总是错误，世有沧海桑田，人有衰顶盛极，思想也会有自己的气数和劫运，即使它被裁决为上一个世纪最后的孑遗，但谁又能断定它不会是个世纪的 第一位先知？

思想，决没有有罪和无罪之分。对于思想的审判，犹如对天空的分割、对玫瑰花颜色的界定一样荒唐。

在人民内部，企冀用“权威”、行政干预，乃至动用司法的力量，来保证某种思想的通行无阻，而将某种思想打进地狱，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径。

如果承认因为肤色而遭压迫、甚至判罪，是全人类必须唾弃的行为；那么，因为思想而遭压迫、甚至判罪，也是全人类必须唾弃的行为。那么思想对思想的压迫——这一中世纪的黑暗、愚昧现象，也必须受到全人类的强烈谴责，并被视为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

在当今被称为“地球村”的这颗小小星球上，犹如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挡现代文明一样，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挡思想自由的大潮。

由此，可以理解“铁腕人物”马科斯的逃亡，文温尔雅的科拉松·阿基诺的上台……

由此，可以理解蒋经国先生何以在垂暮之年，不惜冒犯国民党元老重臣，而不遗余力革故鼎新……

由此，可以理解由全斗焕扶植的卢泰愚总统一旦上台，却不能不听凭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将昔日的恩人逼上了深山古刹，在黄卷青灯里苟且偷生……

由此，也可以理解斯大林、勃烈日涅夫今日在苏联的命运。即使是沙漠广袤、难度春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高傲地屹立乌兰巴托市中心的乔巴山铜象，露出了怀疑之色……

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才智喷射如春日花雨般地

五彩缤纷。这块土地将不但盛产粮棉、鲜花、火焰、电弧，也盛产歌声、史诗、巨匠、天才……

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一片明亮的眸子灿若星河。它们对社会能形成有效的制约系统和保障系统。不存在缄默，也就难存在虚伪和腐败；不存在堵塞，也就难有一朝的突然溃决……

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科学的，谁就得要有勇气走上思想车水马龙的大街。

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强大的，谁就会对非己的思想表现得落落大度，彬彬有礼。

离开了法制的保护，思想自由便是筑在沙海上的房子，写在流水上的誓言。法制唯一忠实的只是人民权利的基本原则。

李九莲、钟海源冤案的确立与平反，都是当权者干预司法的结果。两者之间，在体制上没有根本差别。差别在于路线上和党的干部的素质上；前者的路线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后者的路线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前者是昏庸的、僵化的，后者是清醒的，正直的。

也许，若不从体制上进行变革，仅将司法的命运，寄托于领导者的从此永远正确、开明上，仍不能有效地避免李九莲、钟海源悲剧的重演……

犹如不能将冬天仅仅理解为严酷，它让无边的大地在皑皑白雪之下，静静地，全心全意地，孕育出一个有着桃花般酡红笑靥、有着柳丝般纷扬手臂的、活蹦乱跳的春天。

司法工作的立足点也不仅仅是打击，没有有效的保护，便没有有效的打击。它的对象是人，其次才是犯人，即使是后者，也还是人。与救死扶伤的医院相比，这是一座宏伟的、社会病理学意义上除旧布新的医院，因此，它的工作人员，与医生、护士一样，极需要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践踏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果，使得李九莲、钟海源案件，业已成为中国司法史上大概能永远昭警后人的一个耻辱……

漠视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果，也许使得冤狱并没有随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而从此绝迹……

让我们还是回到人的解放上来——

人的解放，是人的思想、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全面解放。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封闭的超稳定结构里，作为对于过去深重压抑的惩罚，今天的解放将不会是一个椰风习习的蔚蓝色海湾，会有风涛，会有旋流，会有泛起的沉渣和肮脏的泡沫……

此时，每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既要防止一部分不负责任的人掀起非理性的海啸，以引起社会的震荡和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担忧，也要防止一些留恋特权犹如留恋生命的人，借口出现沉渣和泡沫，而停滞人的全面解放的过程。

要相信，一定程度的无序之后，将会形成整个社会思潮合力的有序，如同风暴波洗过的大海，将会更壮

阔，更明静，明静中蕴透着力量的标识……

让我们还是回到民主上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指出：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观照十一年改革进程，这一苦果般埋在胸膛里的教训，还没有足以在我们的胸膛上长出一棵伞叶虬枝的伟树。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经济改革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对权力的制约上，在人民必须拥有的知情权、议政权和监督权上，虽作了某些努力，但还没有经济改革那般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我常常想，若不把民主动辄变为“全盘西化”、“轮流执政”一类的空谈玄说，而把民主务实地理解为眼前：扩大公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保障公民对权力的监督，让改革得到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从而表现为一片无边流动、蒸腾的阳光，那么，驱逐当今中国大地上尚存的阴影，将不会是很难的了……

三十三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并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那么，死于现代迷信祭坛之上的李九莲、钟海源，不正是与张志新、遇罗克一

起，在中国昏暝的长夜里向着今天苦苦遥望的一对对眸子吗？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今天，九泉之下，冥河之畔，她们会有遗憾。

我相信这遗憾不是关于她们自己没有活到今天的，或者是她们今天没有张志新、遭罗克那般地显赫……

在那封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的信里，李九莲已经引用、此后并以全副生命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历史的艰难嬗变，总是要一些人乃至一批人、一代人，付出种种的牺牲以作为代价；而一旦蜕壳了，朝着新的目标匆匆前行的历史，又总是难以及时对作了牺牲的人们都一一梳理，抚慰有嘉……

犹如历史总是跟着冤屈，历史也总是有先驱者开路。

她们的遗憾，我想更多的是对着那股好似冷风般嗖嗖扑面的怀旧情绪……

九泉之下，冥河之畔，李九莲、钟海源也会有由衷地欣慰——

不再有“何其多”的“血泪”，

不再是“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

不再见“即使穿着棉袄也发抖的人们”在赞叹“残

冬的太阳”……

共和国的列车，终于穿越了历史最黑暗的隧道！

列车，因为拖载的忧患与焦灼太多、太重，炉火很旺，煤水很足。以致传统体制被震颤得摇摇晃动，不时有泥石流哗哗地滚下来，一片片的朽干枯枝在“叭叭”地断裂……

国家开放的程度，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已享有的自由程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企业的自主程度，犹如一块块里程碑，无不在标志列车已势若狂飙，一泻神州，决无逆转的可能！

人们业已认识中国昔日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有眼无神，有目无光……

人们一再呼唤不能再摧残那些明亮的眸子了！

人们开始珍惜生命般珍惜那些明亮的眸子！

如果说，启程之初，由于云遮雾罩，她的目标还不甚明晰，那么阳光明媚的今天，那成排钢轮的铿锵声，汽笛的长鸣声，正在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写上中国的大地和天空……

就看看李九莲、钟海源的故土吧：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这是一块曾有着辉煌农业文明的故土；

人民军队诞生于江西，共和国的雏型萌生于江西。这是一块最早接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洗礼的故土；

从清查“AB团”，红军的马头刀刈韭菜一般疯刈

着红军的脑袋，到“文化大革命”，林林总总的群众组织，好以“井冈山”命名，局势发展也似乎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在相同的“誓死捍卫”下，双方打的一场场盲目的战斗，在全国也堪称是持久、激烈与悲壮……这是一块翻来覆去在阶级斗争理论的铁砧上被锻打的故土……

一位当代著名作家五年前如是说过：

“不知为什么，‘江西’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唤起的，都是同历史有关的记忆，南昌起义，进军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对于现实的江西，我却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井冈山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秘密——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早已昭示于天下的秘密，似乎还总让江西沉醉不已。多少年里，尽管早就敌军消遁，烟消云散了；可至少在心态上，多少人仍未走出井冈山那庞大的身影……

将过去的故事整日放在嘴上，那是博物馆里讲解员的工作。而江西不是一座博物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不是讲解员。得承认，当年革命选择江西的优越条件，成了今天建设江西的障碍条件，地理封闭极易造成观念、心态的封闭，自然经济的“大山”，一定连接着商品经济的“盆地”。将昨天的光荣还给昨天，也将昨天的观念还给昨天，在今天，江西必须走出井冈山！

也许，承认它对很多人是痛苦的，可不承认它并改

造它，那光荣感便会愈加斑斑驳驳下去，最后显出某种苍凉的滑稽来……

犹如“文革”中那些充满火药味、乃至血腥气的领导者讲话，只能去档案馆里找了；今天在赣南主政的大都是新的、年轻的面孔。行署专员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地委书记是江西冶金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他们是幸运的，不会象他们的几位前任一样，在抓“阶级斗争”上突出表现出自己的“政绩”……他们又是艰难的，当年蒋经国先生在此任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时，不可谓不勤于职守，殚精竭虑，可到头来，他不过是枕着三民主义，在一片依旧“风气闭塞，文化落后，经济残破，社会保守”的红土壤上做了一个梦。可他们，面对如火如荼的南方，背靠春潮乍卷的北方，今天已经没有了做梦的时间……

也许，他们忙碌得还不曾听说李九莲、钟海源，他们却以一个事实结束了李九莲二十年前的怀疑：难道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落后、贫困——

所谓赣南经济改革试验区，国家并未多给一分钱，给的只是一个放权、扩权的政策。然而致力于改革开放一年，建国四十年来一直忝附于江西十一个地、市骥尾的赣南，发展速度一下跃居全省前列！

而江西，四年来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年年达到两位数，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再是负效益的增长了，反映在财政收入上，连续四年以15%—20%的幅度增加。1987、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比1980年翻了一番以上。

犹如六十二年前，革命在井冈山找到了成功的秘密，今天现代化在中国的沿海发现了成功的秘密，江西人民正不失时机地学会这一秘密，下大气力优化商品经济发展环境，使之同自身丰富的农业资源、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转化为商品经济优势，从而四面出击，全方位开放和引进，使江西经济日渐在东南半壁江山上鼓荡起飓风般的恢宏活力！

李九莲、钟海源羡慕着我们——当代的江西人，中国人，生活在前人从未有过的温饱与安宁之中。

每一个人不妨去想想，十一年前，你还是一只被扎得牢牢的粽子，你能干什么，你能想什么呢？

每个家庭不妨想想看，十一年前，何曾敢想彩电、冰箱、洗衣机？今天，它们不声不响地涌进了我们的生活，如同秋风悄悄镀亮了枝头累累硕硕的凤梨……

无需喝了一口咸涩的海水，就满街凄惶，满街叫唤，犹如这一口吞进了全世界上百年的苦难。

当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剧烈更替时，无序、紊乱便出现了，

当单一、完整的价值体系，被多元、尚未成形的价值体系猛烈冲撞时，困惑、失落便出现了，乃至到过去的岁月里去寻找“美好时光”……

似乎大厦将倾，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其实重蹈的不过是尼采当年的那个命题——“上帝死了！”

再也没有了“上帝”，中华民族得自己踏上艰难的寻觅之途。

历史决定了当代的中国人又必须表现出前人未曾有过的大智大勇！

既然两个弱女子在蒙昧的长夜里，能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漂泊，希冀建起一个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坐下来，去等待有谁给我们描绘社会前景会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呢？

既然一名十六岁少女，在心灵饱受重创之后，能“把痛苦留给那个远远的世界”，“学会了面带微笑迎接明天”，我们有什么理由顾盼左右，停滞不前，不去加快步伐拥抱那正朝 21 世纪走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丰碑呢？

李九莲那黑莓子般善良、明亮的大眼睛……

钟海源那马奶子葡萄般美丽、明亮的大眼睛……

九泉之下，冥河之畔，她们正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走向未来……

1989.1.1.——3.5

于南昌青山湖畔

1989.3.19——3.26

于北京景山后街改定

后 记

经过蔚为壮观的1987、1988年，中国的报告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境地。

一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对当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空前规模的鸟瞰和多方位的考察，作品中的时空变得阔大、广袤；个体为群体所代，局部为整体所代，一般生活事件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代——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教育的，人口爆炸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党风不正问题，人才外流问题，物价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婚恋问题，黑社会问题，弥漫于神话之中的体育界问题……

不少小说作家有意无意地退出文学的社会作用圈之后，或回归“五四”以后曾被中断了的小说自身形式的探索，以求向民族文化心理更深沉的拓展，或走向同我们国民性中“看客心理”颇为一致的“玩儿文学”，尽管它常常自命高雅为象牙雕般精致的“纯文学”，从而使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当代现实的疏远，乃至冷漠。而几乎与此同时，报告文学则迅速填补了文学社会作用圈中的空白，以越来越大的体积和质量涉猎当代重大社会问题，而且越来越富有激情式的，甚至是煽情式的剖析与议论。报告文学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们信奉的格言：“敢于认知”。它似乎

铁了心地认为，在眼前这样一个由封建专制的蒙昧社会向崇尚科学与民主的文明社会过渡的时代，文学不是花瓶，更不是看客，而应该是负重的纤夫，呼啸前行的战士！文学的首要之义，是必须给当代中国人提供认识周围世界和自身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一价值判断不该等同于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还必须具有审美的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所涉猎的大抵是同一个思想层面；越来越大的体积和质量，所揽起的大抵上也只是同一个命题——当代犹如一个巨大的产房，中国则以一住早已过了最佳育龄期的产妇。说她不会生吧，腹中的胎儿躁动多时，而且血水、羊水小溪般汨汨流出，她因剧痛喊得呼天恸地，几乎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说她一定要生了吧，光阴已经在产房外窜走了几天几夜，产床上的她心力交瘁，惨白如纸的额头布满了串串豆大的汗珠，惊悸不止的嘴唇皮上是一排排痛苦的齿印，可那胎儿就是不肯走出黑暗的子宫。

换言之：说眼下的中国没有了希望，可希望分明像天边从未有过的曙色在秾丽地燃烧；说眼下的中国到处“莺歌燕舞”，“流水潺潺”，可只要你走出门去，不昧着良心，不麻木神经，你就能伸手可触如山的矛盾，如流的怨言，你就能举目可见鬼火般的车辙，泥沼般的腐败……

于是，这同一个命题便是“中国大难产”，而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过是在各个领域、各条分支上分头铺陈、剖析这一“难产”。这同一个思想层面便是：当代

中国是一个新旧搏斗、方生未死的中国，是一个良莠叠结、明昧难分的中国，是一个各种口号各色思潮潮水般涌来而河床深处几千年铸就的块块暗礁正虎视眈眈的中国，是一个“既有导向天下大治的可能，又似乎处在动乱未乱之际”（何新《东方的复兴》导言）的中国。一句话，尽管翻腾有越来越大的体积和质量，可报告文学大抵驻足的只是当代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报告文学的“敢于认知”的旗帜与报告文学浅尝辄止的现状之二律背反。

当今报告文学的宏观式、综合式构架与报告文学密集于同一思想层次的内容之二律背反。

几年来，大概要说而又能说的话都说尽了，可对于读者，也大概在这一怪圈里往复：矛盾——不可知——矛盾。而对于作者，如果说“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昔日在批判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些曾使作家们徘徊于敏感现实社会问题的笔端一下脱散倒地了，作家们的笔下，一度难有过不去的问题；那么现在作家们又隐隐感到，面对敏感现实社会问题，不是剪不断，理还乱，便是只能陷于缄默……

当今的中国，脱胎于过去的中国。试想想，一个不了解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人，怎么能了解今日这场改革对于中华民族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一个不了解反“胡风集团”斗争、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怎么能了解今日这场改革必然引起旧体制、旧文化心理、旧思维定势的

巨大阻抗，而一旦阻抗被彻底摧毁，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的解放，才能在这块古老的、饱经忧患的土地上得以真正实现。

现实生活里，偏偏了解这一切的中国人还不多——

二位诗人去老山前线体验生活，他震惊地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战士竟不知林彪为何人。一个颇有意味的反差：年轻的脸上布满黧黑的烟尘与亚热带阳光，心灵却几乎没有让沉重的历史踩出半点皱褶……

一名小学生问她的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道：“‘文化大革命’就是学生斗老师，坏人打好人。”一次回答，将足以让中华民族千秋百代伫立秋野之上感喟不已的一场浩劫，给轻轻松松地打发了……

犹如中国的改革之舟若不脱自于一个真相明朗的蔚蓝历史苍穹之下，它倾覆于风狂雨骤之中便确有可能；报告文学若不将今日之中国放在几千年来尤其是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加以审视，报告文学若依据于眼前的某种功利、某种时尚，而不能依据民族变革进程的自觉需要，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延揽进自己的视野，它的深刻性将难以为继，它的认知性将难以为继。报告文学近几年来引以为自豪、并为世人所瞩目的那面旗帜，终有一日要砰然墜落……

这只是报告文学向历史深处拓展的一翼。报告文学要走出目前的二律背反境地，还有向世界伸展的一翼，即将今日之中国放到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格局

上加以观照。

本世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没有比二十世纪给人类的馈赠更壮丽多姿、更惊心动魄、也更丰厚凝重的了。浩如烟海的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是散乱的，随意性的，可只要稍加梳理与考察，你就能发现若干条人类历史清晰的走向，从而勾勒出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从“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的“圆桌会议”，直至戈尔巴乔夫对于庞大而又僵死的斯大林体制发动最具胆魄的挑战，蒙古开始清算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由此便知中国的改革是如何不可避免的了，

从台湾解除报禁、党禁、商禁，马科斯流亡美国，全斗焕隐居古刹，直到缅甸学生与市民怒潮般的示威，伊斯兰教世界诞生了第一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女总理……由此便知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虽有曲折，但终究不可逆转，

从“南南合作”，美苏谈判，中苏解冻，两伊言和，直到美国“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升空失事和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境内强烈地震，牵动了全世界男女老少的同情与关注……昔日那些将地球变成一个巨大、激烈的古罗马斗牛场的意识形态，正在纷纷剥落，而今天地球则被视为一个小小的村庄。面对浩茫、神秘难测的外星球，孤独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村庄里暂住的居民，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远比分歧的问题更为重要。由此便知今天的中国人何以会对“文化革

命”如此厌恶，对清平、安宁的生活如此向往……

如果说报告文学向历史深处拓展的一翼，将有可能使作品浸染有浓重的文化意味；那么报告文学向世界伸展的一翼，将有可能使作品蕴含有隽永的哲学意味。

于是，报告文学的认识功能将超拔起来。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问题，将清晰起来。中国现实社会的敏感问题，将渺小起来。作家在题材、内容的开掘上有了较大自由度的同时，当今报告文学鲜明的综合化倾向——生活的综合，知识的综合，表现手段的综合，也将在纵论古今、横比中外的过程中，体现得更加自如，更加潇洒……

由于空间的广大和时间的绵长，也由于理性目光恢宏地把握及其相应综合手段的运用，必然充满了作家各自人生体验、理论参照系及艺术修养的强烈印记，于是近年来囿于一点、挤于一宗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模式将会被打破，题材的雷同，构架的雷同，手法的大同小异，将会日趋鲜见。

经过蔚为壮观的1987、1988年，中国的报告文学走到今天，它的又一次嬗变似乎是必然的了。

这不仅仅在于新时期文学十一年来享有盛誉而又屡经挫折的报告文学有着活跃、顽强的自我调节机制；也不仅仅在于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现了足够的人格力量和进取精神……

更在于这是沸腾世界的呼唤，这是苍茫历史的呼唤，这是当今不能后退只有前行的中国改革的呼唤！

有理由希冀：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一年里，中国的报告文学将会毫不迟疑地伸出两翼，以拥抱世界与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万般体验，从而推出一个气派洋洋的“盛唐气象”。这一气象的重要标志便是一位位大手笔脱颖而出，史诗般的宏篇巨制接踵问世。